

顾问委员会

总顾问 曾培炎
顾 问 董建华 蒋正华 唐家璇 徐匡迪

资深专家委员会

中国专家（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春正	王伟光	王洛林	厉以宁	宁吉喆	冯国经	卢中原
许宪春	刘遵义	刘世锦	刘克崮	刘 伟	朱 民	李毅中
李德水	李若谷	吴敬琏	张大卫	张国宝	张晓强	张 祥
张卓元	陈 元	林兆木	林毅夫	周文重	高尚全	海 闻
钱颖一	郭树清	辜胜阻	聂振邦	楼继伟	樊 纲	魏建国
戴相龙						

国际专家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康睿哲/Richard Constant
傅强恩/John Frisbie	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
欧伦斯/Stephen A. Orlins	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
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	马克·乌赞/Marc Uzan
郑永年	

编委会

主 任 魏礼群
副主任 郑新立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一鸣	王晓红	吕 政	谷源洋	朱晓明	李晓西	李向阳
张宇燕	张燕生	张蕴岭	杨圣明	冼国明	施子海	隆国强
常修泽	徐洪才	裴长洪	霍建国			

主 编 郑新立
副主编 王晓红
编辑部主任 沈家文

• 本刊专论 •

“十二五”工业通信业发展成就及“十三五”展望 苗 圩 (005)

深刻理解中国房地产问题的实质 黄志凌 (014)

• 宏观经济 •

绿色发展的三大动力 夏 光 (029)

• 国际经济 •

国际原油价格影响因素分析及对策研究 何晓伟 郭 红 (039)

2015 年全球金融市场焦点回顾 陈 超 (051)

中国对美国证券投资现状及外汇储备投资策略的调整 徐长春 (060)

• 区域经济 •

创新引领转型 改革促进转型
——浙江省“十三五”规划基本思路 黄 勇等 (078)

• 产业发展 •

加快大数据发展是大势所趋 武 锋 (091)

• 名人观察 •

“中国经济年会 (2015 - 2016)” 专题 宁吉喆 金壮龙 李晓西 (103)

“十三五”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霍建国 (112)

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心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收录期刊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 博看期刊网收录期刊 中文知识网

• 新书推介 •

勾勒发展中的丝路蓝图

——评《中国丝绸之路城市群叙事》

孔 铎 (116)

• 权威观点 •

国际权威机构观点综述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118)

• 国际统计数据 •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123)



CONTENTS

The achievements during the “12th Five – Year” and the outlook during the
“13th Five – Year” of industries and communications industry *Miao Wei* (005)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China’ s real estate issues *Huang Zhiling* (014)

Three drivers of green development *Xia Guang* (029)

Analysis and countermeasures research on what affects the international price of crude oil
He Xiaowei and Guo Hong (039)

Focus review of global financial market *Chen Chao* (051)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a’ s securities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djustment of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 investment strategies *Xu Changchun* (060)

Innovation to lead transformation, reform to spur transformation *Huang Yong* (078)

Speeding up the development of big data is the trend of the times *Wu Feng* (091)

Special Topic of China Economic Annual Meeting 2015 – 2016
Ning Jizhe , Jin Zhuanglong , Li Xiaoxi (103)

The new momentum of Chinese economic growth during the “13th Five – Year” period
Huo Jianguo (112)

To outline the blueprint for the on – going Silk Road *Kong Duo* (116)

Opinions of International Authoritative Institutes (118)

Main Indicators of World Economy (123)

“十二五”工业通信业发展成就 及“十三五”展望

苗 圩

摘要：“十二五”时期，我国工业通信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综合实力再上新台阶，结构和质量出现了许多具有转折意义的新变化。“十三五”时期，工业通信业发展仍处于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但也面临一系列新的风险与挑战。工业和信息化部将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理念，立足制造强国、网络强国战略全局，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实施中国制造 2025，培育壮大高端制造业，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推进两化深度融合、军民深度融合和信息通信业转型发展，不断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加快培育优势企业集群，务实推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实现工业通信业平稳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

关键词：制造强国 网络强国 稳增长调结构

作者简介：苗圩，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

“十二五”时期，工业和信息化部积极贯彻落实中央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和信息化道路，积极应对国内外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推动我国工业通信业发展取得了新的成就，综合实力再上新台阶，结构和质量出现了许多具有转折意义的新变化。未来五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围绕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目标，着力在优化结构、增强动力、化解矛盾、补齐短板上取得突破性进展，推动工业通信业实现

平稳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

一、“十二五”时期工业通信业发展成就

（一）产业规模和质量效益明显提升，为基本实现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工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是创新驱动的主战场。“十二五”时期，在全球经济下行调整逐步加深的背景下，我国工业通信业继续保持平稳增长势头，重点指标均达到了规划目标。2011 年至 2014 年，我国全部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长约为 8.3%，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长 11.9%。2015 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为 6.1%，虽然有所放缓，但工业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仍接近 40%，对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依然明显。在 500 余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我国有 220 多种产量位居世界第一，稳居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和制造大国地位。电信业务收入规模突破万亿元，移动互联网成为驱动信息通信业增长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我国工业通信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形成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产业和骨干企业。56 家制造企业进入世界 500 强，11 家工程机械企业进入全球 50 强，四家互联网企业和两家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进入全球十强，通信设备制造商跻身世界第一阵营。“十二五”末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和用水量较“十一五”末分别降低 25%、35%，主要污染物排放等约束性指标超额完成。我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一二三产业结构日趋合理，有力推动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二）结构优化升级加快，产业向中高端迈进日益显现

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十二五”时期，工业和信息化部认真落实中央决策部署，迎难而上，加快传统产业技术改造，统筹做好淘汰落后产能和化解过剩产能，大力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通过财政贴息等方式不断加强对技术改造的支持力度，突破了一批制约行业发展的重大关键技术和重大装备的自主创新，有力地推动了钢铁、纺织、轨道交通、医药等行业的改造升级，重点行业竞争力明显提升。据初步测算，2011 年至 2015 年，工业领域累计淘汰炼铁 9000 万吨、炼钢 9400 万吨、水泥 6.4 亿吨、电解铝 196 万吨、平板玻璃 1.6 亿重量箱，提前一年完成了原定的“十二五”目标和追加任务。高技术产业增速一直保持在 10%以上，明显快于工业整体水平。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重点领域的研发和产业化取得新进展。2015 年，我国生产新能源汽车 37.9 万辆，同比增长超过四倍，智能手机出货量为 4.75 亿部，同比增长 17.7%，国产品牌智能手机的市场占有率超过 70%。区域空

间布局不断优化，产业转移不断加快，产业集聚发展取得明显成效，截至 2014 年末，全国共创建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300 家，示范基地实现工业增加值 68583 亿元，同比增长 9.9%，占全国工业增加值比重近三成，示范基地总数在 2015 年继续增加到 334 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带动作用进一步增强。

（三）自主创新能力持续增强，产业技术创新体系不断完善

“十二五”时期，我国创新驱动发展不断加快，“大国重器”取得新的突破，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创新体系不断完善。2014 年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占 GDP 比重达 2.09%，其中，工业企业研发经费占比超过 76%。新一代信息技术、高档数控机床等十大重点领域发明专利年均增长率超过 23%。载人航天与探月工程、载人深潜、北斗导航、高性能计算、新型显示、新一代移动通信等领域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性进展。我国提出的 TD-LTE 形成完整产业链并实现商用，成为 4G 国际标准之一。特高压输变电设备、百万吨乙烯成套装备、风力发电设备、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等装备产品技术水平已跃居世界前列。高铁、海洋工程装备、核电装备、卫星成体系走出国门，装备制造业成为新的出口优势产业。大型立式五轴联动加工中心研制成功，6400 吨大型快速高效全自动冲压生产线已实现向发达国家出口。C919 大型客机首架机总装下线，ARJ21-700 新型涡扇支线飞机交付商用。军民科技协调创新和共享共用水平明显提升，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科技创新步入跟踪、并跑和领跑并存的新阶段。

（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发展，新模式新业态加速形成

我们坚持把推动两化深度融合作为立部之本、全系统的共同责任，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推进。重大产品和成套装备智能化水平明显提升，航空、航天、机械、船舶、汽车、轨道交通装备等行业数字化设计工具普及率超过 85%，钢铁、石化、有色、煤炭、纺织、医药等行业关键工艺流程数控化率超过 65%。以互联网为载体的新兴业态异军突起，释放出巨大的发展动力和创新潜能。互联网与制造业的融合创新，催生出个性化定制、众包设计、工业互联网等新模式新业态，驱动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服务化发展，引发制造业生产方式、组织形式和商业模式变革。互联网开放平台成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空间和关键载体。网络零售、互联网金融等融合应用发展呈现指数型增长。全国电子商务交易额年均增长超过 35%，预计 2015 年达到 20.8 万亿元。网络零售额年均增长超过 50%，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网络零售市场。互联网与各行业的深度融合、跨界应用和集成创新，为我国抢占新一轮产业竞争制高点奠定了重要基础。

（五）网络基础设施加速升级，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十二五”时期，我国加快推进宽带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统筹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和标准制定，建成全球最大规模的宽带通信网络。截至 2015 年第三季度末，我国光纤直接入户（FTTH）端口数达 2.4 亿个，在固定宽带接入端口总数的占比超过 50%，比 2010 年提升 44.1 个百分点，城市地区光纤入户网络覆盖了 90% 以上的家庭。光缆线路总长度达 2355 万公里，是 2010 年光缆线路长度的 2.3 倍。全国固定宽带用户平均接入速率已达到 19.4Mbps（兆位/秒）。4G 网络建设快速推进，已覆盖全国城市，4G 用户突破 3.8 亿户，跃居世界首位。国家互联网“西增东扩、多层次、立体化”架构初步形成，七个新增国家级骨干直联点建成开通，十个直连点的骨干层架构搭建完成，网间互通效率大幅提升。国际通信业务带宽达到 3563G，年均增长 17.3%。积极推动三网融合试点，推进广电、电信双向进入。开展移动转售、宽带接入网业务开放试点，鼓励民间资本以多种模式进入行业，推动自贸区进一步放开外资在增值电信业务领域的准入和持股限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互联网行业管理格局，基础资源、网站备案、用户个人信息保护等方面管理进一步加强。电话用户实名制、打击治理“黑卡”、垃圾短信、“伪基站”等系列专项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电信服务质量稳步提升，网络信息安全管理持续强化。网络建设和安全保障在支持经济社会信息化发展、维护国家安全、促进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六）国家重大战略相继出台，改革开放深入推进

“十二五”时期，国际环境错综复杂，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面对严峻发展形势，工业和信息化部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进一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把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结合起来，产业自主发展与对外开放合作相互促进，法律法规不断健全，依法行政力度持续加大，大部门制带来的融合优势、产业链优势、政策协调优势进一步显现。特别是中国制造 2025、“互联网+”行动计划、网络提速降费、工业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政策措施等一系列国家重大战略文件的出台实施，推动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步伐不断加快。积极落实“一带一路”战略部署，推动国际产能合作和装备制造“走出去”，加快重大项目实施，推动与周边国家信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2014 年我国在境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接近 1200 亿美元，比 2011 年增长了近 50%。优势产业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轨道交通、通信、电力装备等领域已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群体。

二、“十三五”时期工业通信业发展面临的形势

“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也是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窗口期。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同时，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仍然突出。我国工业通信业发展既面临着转型升级、跨越发展的重大历史契机，也面临结构性矛盾突显、竞争压力加大等风险和挑战，要认识 and 适应新常态，把握新趋势、新特点，大力推动发展方式转变，实现工业通信业的平稳增长和提质增效。

从国际看，全球经济仍处于深度调整期，产业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一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特别是信息通信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正在对生产方式、发展模式和产业生态等方面都带来革命性影响。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应用正在催生新的发展空间，云计算、大数据、智能机器人、3D 打印等新兴产业加速发展，为我国实现“弯道超车”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另一方面，全球产业分工格局正在深刻调整。发达国家纷纷制定“再工业化”战略，以德国实施工业 4.0 战略、美国发展工业互联网为代表，谋求在新一轮产业变革中继续占据领先优势。越南、印度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利用低成本竞争优势，积极吸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附加值环节转移。发达国家高端制造回流与中低收入国家争夺中低端制造转移同时发生，对我国形成“双向挤压”的严峻挑战。同时，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结束，产生的影响不可低估，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等区域贸易谈判可能加速。发达国家正试图通过重塑全球贸易规划，进一步挤压我国的发展空间。

从国内看，“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仍处于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在深入推进，经济发展有很大的潜力、韧性和回旋余地。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实施中国制造 2025，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加快构建高速、移动、安全、泛在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格局等等。这些重大决策部署和要求，体现了中央重视实体经济、培育发展新动力的坚定决心，为工业通信业加快转型升级步伐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经济发展仍然处于新旧增长动能转换的调整期，面临经济下行和转型升级双重压力，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将进一步显现，我国工业和通信业发展还面临着诸多挑战。一是传统比较优势逐步减弱。随着我国劳动力、土地、

物流等要素成本不断上升，企业税费负担重、生产成本低、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十分突出，社会资本出现避实就虚的倾向，过去依赖低成本要素大规模投入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据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研究报告，中国制造业对美国的成本优势已经由 2004 年的 14% 下降到 2014 年的 4%。“十三五”时期，随着要素成本不断上涨，我国低成本国际比较优势将逐渐丧失。二是结构性矛盾更加凸显。长期以来，我国产业结构不够合理，特别是以资源能源为代表的重化工业比重较大，高技术制造业占比仅为 10% 左右。随着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钢铁、水泥、电解铝等传统产业面临着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在今后一个时期，传统产业还是工业的主体，新的增长动力还难以弥补传统动力减弱带来的缺口，新旧增长动力的接续转换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此外，我国的生产性服务业仍处于起步阶段，还难以满足产品和服务增值升级的需求。三是创新能力有待提升。近年来，我国创新能力明显提升，但同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较大差距。目前，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创新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大量的关键零部件、系统软件和高端装备基本都依赖进口，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短期内还无法根本改变。工业基础能力薄弱，产品质量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关键共性技术缺乏，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还面临诸多困境。在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情况下，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还有待加强。四是资源环境约束趋紧。我国资源相对不足，环境承载能力较弱，主要能源和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持续提高，水资源等短缺问题不断显现。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没有得到根本扭转，城市空气质量不达标，水和土壤污染加剧，重大环境事件时有发生。我国作为制造大国，尚未摆脱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发展方式，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加快推进制造业绿色发展刻不容缓。五是网络安全与管理形势严峻。宽带网络是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公共基础设施。然而，目前我国宽带网络建设仍然滞后，宽带普及率不高，宽带资费水平还有进一步下降空间，区域和城乡发展还不平衡。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应用，网络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立法和标准制定滞后，市场监管手段跟不上，数据和用户信息安全问题时有发生，网络技术防护能力不完备，我国已经成为全球遭受网络攻击最严重的国家。今后一个时期，进一步加强和改善互联网行业管理仍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三、“十三五”时期工业通信业发展的重点任务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确定了“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将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理念，适

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立足制造强国、网络强国战略全局，坚持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实施中国制造 2025，推进两化深度融合、军民深度融合和信息通信业转型发展。

“十三五”时期有以下重点任务。

一是加快创新驱动发展，培育壮大高端制造业。“十三五”时期，要把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全面实施中国制造 2025。以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为载体，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国家制造业创新体系。大力实施工业强基工程，攻克一批关键共性技术和先进基础工艺，有效破解制约产业发展的瓶颈。组织抓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大力实施高端装备创新工程，开展智能制造和机器人、大数据、重型运载火箭、重点新材料研发及应用等重大科技项目工程，建设一批公共服务平台和产业创新联盟，强化标准制定和知识产权保护，加快形成高端引领的发展格局。

二是提升供给质量和效率，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在可预见的未来仍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要实施新一轮重大技术改造，支持高端产品、关键环节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实施绿色制造工程，支持绿色清洁生产，推动传统制造业绿色化改造。多措并举化解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重点行业产能过剩，加快推动产业重组，有序处置“僵尸企业”，分业施策推动困难行业转型升级，不断激发传统产业的发展活力。实施质量品牌战略，支持新技术、新产品推广应用，不断改善消费品供给能力。加快发展服务型制造和生产性服务业，提高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支撑能力。

三是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推动两化深度融合发展。要着眼于构建新型制造业体系，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继续做好两化融合这篇大文章，不断推进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实施智能制造工程，支持关键装备创新应用，搭建智能制造综合标准化技术体系。启动一批智能化改造项目，推进机器人和智能成套装备在机械、钢铁、危险化学品、民爆、电子、医药等领域应用，发展智能车间和智能工厂。深化“互联网+”制造业创新发展，编制实施互联网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路线图，以工业云、工业大数据、工业电子商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为重点，培育制造业新模式、新业态、新产品。积极落实国家大数据战略，建设一批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和产业集聚区。

四是加快信息通信业转型发展，支撑网络强国建设。要按照实施网络强国战略的总体部署，加快推动信息通信业转型发展，从更高层次、在更宽领域，履行支撑服务网络强国建设的新使命。加快建设高速、移动、安全、泛在的下一代宽带网络基础设施。推进“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创建，实施电信普遍服务补偿机制。继续促进有效竞争，提升

开放水平和服务能力。加强 5G 研发和前瞻部署。有序推进工业互联网发展，加快工业互联网核心技术研发及产业化，支持企业开展创新应用示范。以提升互联网行业管理能力为主线，坚持发展、管理和安全并重，打造现代互联网产业体系。

五是建设先进国防科技工业体系，深入推动军民融合。“十三五”时期，要按照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要求，加快国防科技工业改革发展，破除军民融合发展的技术、体制机制和政策障碍，努力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格局。坚决贯彻中央关于深化国防科技工业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抓好推进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落实，进一步提高军品科研生产能力水平，积极稳妥推进军工科研院所分类改革。完善军民融合公共服务平台，促进军民资源互动共享，组织军民两用技术联合攻关，在核能、航天、航空、船舶、电子信息等领域实施一批军民融合重大项目，推进创建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

六是落实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部署，不断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协调发展是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要综合考虑产业发展基础和资源、市场和环境承载力，优化产业空间布局、补齐区域发展短板。发布实施长江经济带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方案，制定重点区域产业转移指南，促进产业有序转移和分工协作。推动京津冀产业协同转型升级，启动一批重大搬迁改造项目。推动产业集群集约发展，在东部地区建设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先进制造基地，鼓励中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建设产业转移合作示范区，推动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加强对民族地区、贫困地区的产业援助，推动西部、东北、中部、东部“四大板块”协调发展。

七是加快培育优势企业集群，推动企业提质增效升级。实体经济是国家的根本所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必须继续优化外部环境，帮助企业苦练内功、降本增效、渡过难关。继续扶持龙头企业和骨干企业发展，加快培育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跨国公司。着力改善政策环境，支持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培育一批隐形科技冠军和“小巨人”企业。发挥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引导作用，支持种子期、初创期成长型中小企业加快发展。实施大企业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推广工程，建设一批工业创新平台。推广先进管理模式，开展对标挖潜、降本增效，推进非公有制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

八是提高产业发展国际化水平，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开放合作是产业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要深化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放开一般制造业，促进引资、引技、引智相结合。提升传统优势产品竞争力，壮大装备制造等新的出口主导产业。发

挥企业主体作用，支持企业研发、营销和供应链全球化，提升全球资源整合能力，构建新的国际竞争优势。支持企业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境外产业园区为重点，有序参与钢铁、汽车、工程机械等领域投资合作。鼓励产融结合，携手拓展国际市场。建立“走出去”重点项目库，做好有关服务支撑。充分发挥多边双边交流合作机制作用，深化5G、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中小企业、核与航天等领域合作，更好地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提高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话语权。

总体而言，“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工业通信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关键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坚决贯彻落实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坚定信心，锐意改革，勇闯关口，努力实现工业通信业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力争到2020年，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工业通信业供给质量和效率大幅提升，供给体系基本适应消费需求结构升级，现代产业体系日益完善，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基地初步建成，创新创业推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加速涌现，宽带网络接入能力和覆盖面明显提升，网络共享经济不断发展壮大，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目标提供更加坚实的产业、技术和物质保障。

责任编辑：艾 冰

深刻理解中国房地产问题的实质

黄志凌

摘要：由于房地产商品的异质性，大型房地产市场不易发生系统性风险，并未发生真正意义上的系统性崩盘，“次贷危机”不是房地产市场自身逻辑发生变化，而是美国独特的财政、金融政策及独特的金融体系使然。中国房地产发生全国性崩盘的风险概率很低，但发生局部地区房地产市场崩盘的风险仍然存在，需要重点警惕房地产功能失调风险、“土地财政”内生性引致房地产市场次生风险、过度杠杆化引致的风险。未来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既要“正本清源”又要“清热解毒”，尤其是建立长效机制，确保房地产居住的核心功能，同时按需求抓紧构筑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

关键词：房地产 系统性风险 长效机制

作者简介：黄志凌，中国建设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博士。

2014 年上半年，中国 70 个大中城市商品房的销售面积下降 6%，销售额下降 6.7%，特别是一些热点城市房价下降突出，一些地方政府救市的新闻充斥各类媒体，以至于一些专家判断，中国经济下行与房地产价格下跌叠加，市场可能要崩溃。2015 年下半年以来，有关房地产危机问题再次成为热点话题，各种观点和政策主张很多，但分歧很大。本文针对上述问题展开讨论。

一、大型经济体房地产市场不易发生系统性风险

观察房地产市场风险不能就事论事，更不能简单套用其他市场分析方法，而应该深

刻理解房地产市场的本质特性，把握其特有的规律。

（一）房地产商品的异质性决定了大型经济体房地产市场不易发生系统性风险

所谓房地产商品的异质性是指由于土地的不可移动造成了每个房地产商品具有唯一性、不可复制性。实际生活中，除了土地这一基本决定因素外，社会、文化等多个层面的因素进一步固化了房地产商品的异质性。例如，房屋所处不同区位的自然、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以及建筑功能与风格、朝向、层次、规格、装饰、设备等方面的千差万别，更加强了房地产的异质性，我们甚至可以说，房地产商品可以认为是经济学意义上接近于完全差别化的产品。

房地产与小麦和大豆等农产品、石油或矿产等大宗商品具有明显的区别。对于大宗商品来说，同一类商品的个体之间基本上是同质的，因而在市场完全开放的条件下商品价格具有同一性，各个区域之间的价格差异主要体现为运输成本差异。同时，由于这种近似同质的商品可以在全国市场、甚至全球市场批量流动，一旦发生足以影响供给和需求的重大事件，价格波动就会迅速传导到全国市场乃至全球市场，形成系统性风险。而对于房地产市场，几乎没有任何两宗物业是完全相同的，一栋楼里不同户型的价格也有差异，不同楼盘的价格差异更大，不同城市或者区域的价格差异性会更加显著。因此，一个物业的价格变化，并不必然会引起其他物业价格等比例变化，尤其是不同区位、不同功能的房地产价格的相关性更低。

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大型经济体而言，房地产市场的区域性差异会非常明显，尽管各区域房地产市场都受到宏观经济大环境影响，但是相互之间的联动性是非常有限的；房地产商品的异质性造成了不同区域的房地产市场天然分割的，甚至可以近似看作为不同的商品。诚然，对于小型经济体，房地产的区域性特点不明显、甚至只有一个区域（如香港等城市经济体），往往出现同一时间点上的房地产崩盘，进而引发经济危机。但是如果深入观察房地产商品特殊的价格传导机制，并从大型经济体的角度来分析，各个区域间的房地产市场价格波动不会出现严格意义上的多米诺效应，更不会出现短时期发生全面或集中崩盘的系统性风险。

（二）大型经济体房地产并未发生真正意义上的系统性崩盘

一般认为，所谓楼市崩盘，是指房产市场价格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持续上涨后，短时间内房价出现超过 30% 以上的急剧下跌现象。“崩盘”的概念源于股市，华尔街通常将股市崩盘定义为单日或数日累计跌幅超过 20%。从世界历史看，目前为止，还没有大型经济体短时间内出现全局性的房地产崩盘的先例。尽管美国、日本等大型经济体在历史上都

曾经出现过房地产危机，但这些危机主要是局部的、区域性的，并没有直接引起全国性的房地产崩盘。例如，美国历史上著名的 1926 年佛罗里达州房地产危机，虽然危机造成了佛罗里达州经济萧条，但是并未引发美国全国性的房地产崩溃。再如，美国的“次贷危机”，这场源于房地产泡沫破灭的危机，从表面看似乎是席卷了美国全国、甚至全球，但是我们看一下美国这段期间的房地产价格数据会发现，美国住房价格指数（HPI）从 2007 年初的最高点 192 下降到 2011 年二季度最低点 157，跌幅仅为 18% 左右，并未达到下跌 30% 的崩盘标准（仅有少部分地区跌幅超过 30%）。之所以人们感觉这场危机影响如此之大，主要是由于美国独特的财税、货币政策和金融系统问题导致的全国性金融危机，而非房地产价格猛烈下跌导致的经济崩溃。

但是对于一些小型经济体或地区，房地产泡沫破灭往往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例如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性政策，把房地产作为优先投资的领域，促进了房地产市场的过度繁荣，最终形成了房地产泡沫，在危机爆发后，随即演变为全国性的经济危机。再如，上世纪 90 年代香港地区房地产泡沫破灭后，房价从 1999 年最高峰开始持续下跌，六年跌幅累计达 65%，导致香港经济陷入萧条。

（三）美国“次贷危机”也不是一个例外

既然大型经济体房地产危机很难引起全国性经济危机，那么为什么“次贷危机”后，出现了美国全国性的金融危机、甚至席卷了全球？这是“大型经济体房地产不易发生系统性风险”这一基本结论的例外案例吗？实际上，我们深入分析一下就会发现，“次贷危机”是美国独特的财政、金融政策以及独特的金融体系使然，而不是房地产市场自身风险逻辑发生了变化。

从财政政策看，新世纪之初网络经济泡沫破灭后，美国政府为了刺激实体经济发展，财政政策采取购房贷款利息允许个税前扣除等鼓励性措施，提振居民消费。这项财政性刺激措施，客观上鼓励了房产投资需求，推动了房价的上涨。

从货币政策看，利率前降后升的反转走势埋下了房地产泡沫形成和破灭的种子。2000 年 7 月至 2004 年 6 月，为应对信息技术（IT）经济泡沫破灭导致的经济疲弱，美联储将利率从 6.5% 左右经过十多次下调降到 1.0%。但是 2004 年 6 月至 2006 年 7 月，美联储又通过 20 多次升息把利率提升到 5.25%，成为刺破房地产泡沫的重要导因。实际上，2000 年至 2004 年，货币政策过于宽松导致严重负利率时，融资成本下降和流动性过剩刺激房屋需求增长。受到短期供给缺乏弹性因素制约，房屋市场供求关系失衡推动房价上

涨。房价飙升影响了人们的预期，激发了人们投资房地产博取资产升值利益的投机需求，进一步推动需求上升和新一轮价格上涨，从而不断吹大了房地产泡沫。当然，银行放松风险底线为房地产泡沫的形成和破灭起到了“煽风点火”的作用。美联储的低利率引起房价持续上涨，为了充分享有房价上涨所带来的高收益，银行有内在动力向信用评级较低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提供信贷支持，而极低的信贷成本和持续上涨的房价让不具备还款能力的借款人也产生了内在的投机需求，因此，次贷市场蓬勃发展。然而，美联储加息导致借贷成本急剧上升、房价却开始下滑，双重压力导致还款能力不足的借款人出现大规模违约，引发“次贷危机”。

从金融体系看，美国发达但风险评估、管控缺位的衍生品市场是房地产泡沫形成和破灭的“鼓风机”。银行通过资产支持证券（ABS）、抵押担保债券（CDO）等资产证券化工具将“次贷”重新包装、在金融市场上出售，这样银行不仅能够快速回笼资金、获取收益、减少资本占用，而且不用承担“次贷”的违约风险。而本应该对衍生品风险状况做出客观评估的评级机构，出于利益考量，对次贷衍生品风险状况“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给予了高评级。于是我们惊奇地发现，经过这样一个发达但风险评估、管控缺位的衍生品市场的包装，“次贷”这个“矮穷丑”摇身一变成了“高富帅”。这无疑激发了购买者对次贷衍生品的青睐，房利美、房地美等机构大量买进次贷衍生品等有毒资产，甚至连银行、保险公司也购买了不少的次贷衍生品。

因此，“次贷”的资产证券化并没有像人们设计时所希望的那样分散风险，反而是将风险重新集中到金融市场，并且通过衍生品的放大作用，将风险放大了若干倍。这种恶性循环使得金融体系的风险不断放大、不断衍生，从而造成了如此大面积的金融危机。

由此可见，不恰当的财政、金融政策使得房地产市场背离正常轨道，导致了房地产市场出现周期性的波动。统计数据也验证了这一观点，从 1963 年至今，美国共有四次大的房地产危机，每一次的市场调整期都与美国经济周期密切相关，大约相隔 12 年左右会有一次大的市场调整期，时间持续大约三年，调整期间美国房价会有较大的波动、下滑。

（四）中国房地产市场会发生系统性风险吗

对于中国而言，无论是从经济规模上，还是国土面积上，都是一个大型经济体，并且由于历史上行政计划的延续，事实上中国不同区域的房地产市场的联动性远远小于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因而各个区域房价在上涨一段时间后，往往会呈现区域分化的特点，因此中国出现全国性的房地产崩盘的概率非常之小。

除此之外，中国房地产市场特殊性使其出现系统性“崩盘”的可能性很小。一是中

国房地产市场仍然有着较强的刚性需求，难以出现全国性房地产价格大幅下跌。中国目前具有稳定而高速的经济增长、较低的通胀和及时的政策调控，居民收入持续增长，自主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还较为旺盛。并且，中国城镇化率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随着中国城镇化的稳步推进，城镇化引致的住房需求也将保持稳定增长。二是个人购房贷款占比大、质量高，不会爆发“次贷式”的危机。目前中国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房地产领域贷款的 2/3，因此个贷资产质量直接决定了房地产领域的贷款质量和金融风险。事实上，中国个贷资产质量很高，不良率不到 1%。高质量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层次的原因。一方面，中国的个人按揭贷款市场特点与美国有着明显的区别，“次贷式”危机的根源在于美国的银行为了增加收益，拓展了一些低信用评级、还款能力不足的借款客户，而在中国，贷款属于稀缺资源，大量的高质量个贷客户可供银行选择，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中国按揭贷款质量，不会爆发“次贷式”的危机。另一方面，2010 年以来，中国住房贷款政策侧重于支持首套住房，满足自住需求，并大幅度提升投资型房地产客户的成本，挤压投资需求。首付比例较高、举债杠杆率、传统守信观念、国民收入稳步增长等因素促成了个贷风险较小，这一点从前期温州等房价下降较多区域的个人住房贷款违约仍然较少的情况中可以得到直接印证。三是中国财税和货币政策较为稳健，不存在“次贷式”的不当政策诱因和金融体系缺陷。从过去十余年的中国货币政策与房贷政策看，并未出现如 2001 年—2005 年的美国过度宽松货币政策和房贷政策，总体上仍属于谨慎状态。从货币政策看，除了 2008 年四季度至 2010 年上半年出现明显的宽松政策外，其他时间以稳健为主，尤其是利率水平较为稳定；从房贷政策看，中国对个人住房贷款首付比例一直实行较为严格的管制；从金融体系看，目前中国商业银行尚未大面积创新个人房贷金融衍生品，风险集中和风险杠杆比例较小。因此，中国目前不具备爆发“次贷式”危机的基本条件。四是大型房地产开发企业占比大，抗风险能力强。2013 年底，中国上市的房地产企业资产负债率已降至 50% 左右，远远低于金融危机期间 90% 的水平。过去几年，前十大房企的市场份额上升了三个百分点到 13.3%，前 50 大房企的市场份额则上升了五个百分点至 25.4%，行业集中度提高带来更强的抗风险能力。大型房地产企业不仅自身资金实力强，而且其开发的项目所在区域地理位置较为核心，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从国外房地产危机看，各核心区域、资源稀缺地域的房地产项目较为抗跌，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当然，我们不排除局部地区的小房地产开发企业爆发个案风险的可能性，但从目前看，多数爆发风险的房地产开发企业都是源于民间借贷、高风险投资、不规范、高杠杆等问题，而真正由于房地产价格下跌、销售困难爆发风险的企业是非常少的个案。

二、中国房地产市场要警惕三大风险

由于房地产商品的异质性，中国房地产发生全国性崩盘的风险概率很低，但 20 多年来中国房地产发展过程中积累的问题始终未得到有效解决，因而发生局部地区房地产市场崩盘的风险还是极有可能的。具体而言，当前中国房地产要重点警惕三大风险。

（一）警惕房地产功能失调风险

作为一种商品，房地产的核心功能是居住，但是房地产商品的特殊之处在于其与土地的不可分割性，而土地的稀缺性赋予了房地产保值增值的派生属性，由此衍生出了房地产的投资功能。因而，房地产具有消费和投资的双重功能，这两种属性和功能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其中，居住功能是房地产的核心功能，投资功能是派生功能，因为投资房产的目的是用于出租或者出售，总之最终都将用于居住，如果没有了居住属性，投资属性也将随之消失。

从理论上讲，任何地方的房地产都具备居住和投资这两种属性，但是房地产的异质性决定了不同区域的房地产的两种属性具有不同的表现。而且，即使处于同一区域、同一时期，不同楼盘的居住和投资两种属性也会因房屋具体所处的地段、环境等因素而不尽相同。对于土地资源更为稀缺的大城市、超大城市，房地产的投资功能要明显高于一般城市或者农村，投资功能也更容易被发现和挖掘，当然也更容易被过度放大。

这里，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如果一个较大区域房地产商品的居住功能和投资功能发生次序逆转，必将产生较大泡沫并引发区域性市场危机。实际上，多个国家的真实案例已经不止一次地验证了这一结论。历史上，日本和中国香港都曾经一度错误地推行重投资轻居住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基本上是将房地产作为一种金融资产来进行投资，而且是政府出台相应的政策支持民众开展这种投资。于是，大量的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造成房价长期持续走高，远远脱离了居民实际收入增长速度，也远远脱离了房屋实际居住功能可提供的使用价值，这时就形成了投机炒作。在没有实际价值支撑的情形下，无论是股票还是房地产都难以避免最终的价值回归过程。这种畸形的功能紊乱导致房地产价格暴涨暴跌，并且严重影响了居民的居住需求和居住质量，对一个国家的民生和经济都造成恶劣的影响。

（二）警惕“土地财政”内生性引致房地产市场次生风险

所谓“土地财政”是指地方政府对于从土地开发及相关领域所获得的税收和公共产权收入产生严重依赖。“土地财政”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依靠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收入来维

持地方财政支出，由于这些收入属于预算外收入，所以又叫第二财政。据统计，2013 年此预算外收入高达地方政府预算收入的 60%，可见“土地财政”名副其实。

“土地财政”导致本应当作为公正性代表的政府具有内在的利益相关性，这种利益倾向性必然反映在地方政府的各项房地产相关的政策和管理行为中，导致相关政策和政府行为发生扭曲，这种扭曲的目的是保护“土地财政”，因而某种程度上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企业成为了利益共同体。

“土地财政”不仅通过扭曲政府行为来影响房地产市场走势，而且可以直接对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产生扭曲效应。“土地财政”使地方政府的“经济人”角色不断强化。地方政府在房地产市场中的土地垄断地位和其追求预算最大化、增加可支配财力以发展经济的行为动机，使其在不公平的土地交易中成为最大的获利者，且对土地财政形成极强的依赖性。因此在房价出现波动时，地方政府会存在“救市”冲动。通常而言，房地产市场滑坡开始之后大约六个月到一年，开发商的现金流就会有麻烦。由于转让土地收入已成为各级地方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房地产销售放缓意味着开发商没有钱向地方政府买地了，这就会影响“土地财政”的来源，因此地方政府必将通过政府行为来进行房地产市场干预，从而破坏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客观规律，引致房地产的风险积聚。近期各地方政府纷纷松绑房地产限购政策的行为，已经充分地验证了“土地财政”与房地产的这种密切关系。

实际上，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来看，“土地财政”带来的风险已经超出了房地产的领域，其本质上带来的是资源配置的扭曲，这将引起一个地区的经济结构扭曲，进而反过来对房地产产生不可估量的深刻影响。一方面，政府将大量的土地出让金用于为房地产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地价的过快上涨也加速了去“工业化”的进程，在投资渠道缺乏的中国，淘汰的企业主将过剩的资金投向房地产开发，进一步加速了房价的上涨；另一方面，房地产的蓬勃发展也带动了与之相关的产业发展，但是却相对挤压了其他产业的资源获取空间，导致资源的错配和人群之间的财富分配失衡问题，影响了其他行业人们的收入，降低了对房地产的需求。

（三）警惕过度杠杆化引致的风险

房地产行业是个资金密集型行业，房地产的开发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这就使得金融在房地产的行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回顾美国、日本、东南亚等的房地产危机，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房地产金融过度杠杆化。以美国为例，爆发“次贷”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便是向信用评级较低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提供信贷支持，甚至发放大量低首付

甚至零首付的个人住房贷款，这实际上是提供了非常大的金融杠杆，借款人甚至不用自有资金就可以借助银行信贷资金来买房子。然而这还只是“次贷”的第一层杠杆；在此之后，金融机构将次级按揭贷款进行了证券化，并且基于“次贷”这个基础资产又开发出了很多虚拟的衍生资产，以至于次贷衍生品的规模达到了次贷本身规模的几十倍，因此风险也随之被放大了几十倍，一旦泡沫破灭，所造成的影响也是次贷本身规模的几十倍资产缩水。

对于中国房地产而言，过度杠杆的风险可能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房地产市场萧条期，政府部门往往在政策上引导、鼓励商业银行降低个人购房的首付比例，并给予首套房贷利息补贴或直接要求商业银行实行优惠利率政策，不仅直接放大了杠杆率，还间接刺激了不具备借贷能力的人的负债欲望。二是在房地产市场上行期，房地产价格处于上涨趋势中，有些商业银行主动降低首付比例，甚至还会推出所谓的基于房地产价格上涨的“加按揭”业务，实际上是对个人贷款投资购房行为的变相鼓励。虽然政府部门房地产调控政策明确要求个人购房首付比例不低于三成，但是在房价加速上涨的背景下，仍然难以抵挡银行的变通和一些投机者贷款购房的热情。三是对房地产开发项目自有资本金比例要求过低。在中国房地产市场起步的一段时间内，多数房地产开发商都是采用抵押土地贷款等“空手套白狼”的方式利用银行的信贷资金进行开发，然后通过卖期房的方式直接获得售楼收入，由此形成巨大的金融杠杆。尽管后来监管部门对房地产开发项目自有资本金比例和房屋销售提出了强制性规范，但是房地产企业往往有各种各样的手段来规避这些要求，例如通过关联企业借款来充当自有资本金等，实际上仍然维持了很高的金融杠杆。

三、房地产行业发展既要“正本清源”又要“清热解毒”

随着房地产行业风险的凸显，如何治理当前房地产的风险，房地产行业在未来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是否会急剧下降，这些都成为当前大家热议的问题。我认为，行业的特性决定了房地产始终是一个国家重要的战略产业，但是要担当好这个重要角色，中国房地产业必须“正本清源”“清热解毒”，理性发展。

（一）“清热解毒”是中国房地产市场回归理性发展的当务之急

当前房地产市场既存在“局部虚热”（个别地区供过于求），也存在个案“病毒感染”（利用房地产进行投机与欺诈），甚至还出现“吸毒上瘾”（土地财政与开发商的高负债运营）的问题。如果解决不好这些问题，中国房地产就无法成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助推

力，也无法担当未来战略产业的角色。因此，当前必须对中国房地产“清热解毒”，促使房地产尽快回到理性发展、良性发展的轨道上。

所谓“清热”主要是从解决土地财政等角度消除房地产非理性发展的内在动因；而“解毒”主要是防范过度杠杆化形成“毒瘾”。中国房地产的诸多问题实质上是地方财权与事权不协调造成的，治理房地产行业的风险必须先推进财税体制改革，促进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的匹配，降低其对土地出让金的过度依赖，纠正政府的行为和政策扭曲，从体制上解决中国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问题，使地方政府通过正常的财政体系就能够解决其财政收入问题，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提供基础保障。

一是合理界定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事权和支出责任。1994 年的分税制改革，结束了之前财政体制摇摆不定的局面，有效解决了中央财政虚空的问题。但是也遗留了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的问题。由此而带来的地方政府不得不自行增加收入来源，催生了乱收费、土地出让金持续上涨等问题。财税体制改革需要重新合理界定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和支出责任，实现财政收入和支出责任相匹配，并逐步通过法律形式予以明确，尤其要增加地方政府稳定的、可持续的资源性、财产性收入来源，逐步改变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出让金的财政收入现状。

二是加快房地产税的立法和改革。除了简单的调整中央和地方“蛋糕切分”比例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做大“蛋糕”、保证税收来源的持续性，纠正地方政府行为偏差。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加快房地产税的立法和改革。开征房地产税将为地方政府在城市、环境等方面的支出找到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有助于引导和完善地方政府的行为，保障房地产政策的公正性，使其更加关注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改善。房产税的征收可以起到健全地方税收体系、调整地方财政收入结构、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和遏制投资性购房四重效果。

三是促进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均衡发展。长期以来，经济发展重心和资源分配向大城市倾斜，导致住房需求过度集中在大城市，并导致中小城市发展动力不足。如果不能实现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就很难解决“北、上、广、深”等大城市的房价高企问题。未来需要大力发展城市群内的中小城市和具有产业优势的其他中小城市，促进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

四是避免房地产金融的过度杠杆化。在购房者方面，首付比率越低，则资金杠杆越高，越容易发生放大投机风险，因此提高首付率有助于通过资金限制抑制过度的需求涌进市场，从而平抑房价。对于房地产开发企业，要提高自有资本金比例要求，降低开发杠杆率，减少信贷资金的杠杆作用，防范房地产过度开发。在金融创新方面，要吸取美

国“次贷危机”前房地产金融染上证券化、抵押担保债券等“毒瘾”的教训，审慎发展房地产金融的创新产品，尤其要避免设计高杠杆的金融产品，要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要求。

五是要完善房地产金融体系，明确政策性房地产融资、准政策性房地产融资、商业性房地产融资之间的分工与合作，使各种房地产政策有金融体系相配套。具体来说，对政策性房地产融资，尤其是保障房建设的融资，应主要突出财政的支点作用，用财政担保的办法，寻求金融的支持；准政策性融资，只要是资助中端住房建设，应主要突出公积金体系的支点作用，要改变目前公积金完全个人所有的性质，突出其公共性和互助性，维护其商业性，使之与财政资金形成区别；商业性房地产金融则完全由商业银行自主决定，按商业原则开展业务。

六是银行、信托等金融机构要加大对房地产开发商的资本金、现金流和财务等状况的监控，关注房地产开发商的资金链断裂给金融带来的风险。加强对表外理财、信托等“影子银行”金融活动的监管，促使其规范化和透明化，有效化解存量资金风险。鼓励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发行或然可转换债券，并通过创新资本金补充方式，提高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的资本金，消除影响金融体系稳定的许多威胁。

这些监管措施将使得未来即使房地产等领域或环节发生大规模的坏账损失，也不会造成连锁式违约，动摇整个金融体系。反过来，金融体系的稳定，将为房地产业的风险化解及可持续发展提供安全保障和强力支持！

（二）建立长效机制，确保房地产居住的核心功能

房地产的基本功能是居住，由于土地资源的稀缺属性，居住功能进一步衍生出了房地产的投资属性。然而，作为一种商品，如果居住的主要功能被投资的衍生功能所超越，就意味着价格会被脱离居住基础的投资需求不断抬高，必然出现价格严重偏离价值，导致资产泡沫。泡沫的形成实际上是价格机制错乱的过程，这不仅使房地产行业集聚了风险，而且也影响了各类资源的配置效率，导致过多的资源配置到了房地产行业，挤压了其他行业的发展空间，而一旦泡沫破灭，这些资源可能随之化为乌有。因此，要控制房地产风险，必须建立长效机制，确保房地产的居住功能始终处于核心地位，而投资功能仅作为一定的补充。长远来看，中国需要建立和不断完善市场配置和政府保障相结合的住房制度，推动形成总量平衡、结构合理、房价与消费能力相适应的住房供需格局，有效保障城镇常住人口的合理住房需求。政府托底保障中低层次需求，发挥市场重要作用满足多元化需求。具体而言，中国应当建立健全四项保障机制：一是加强住房保障体系

建设的立法，强化居住的核心功能，保障中低收入群体的居住需求，有效抑制住房的市场投资、投机需求。在保障中低收入群体居住需求的基础上，有效地分流市场需求，降低人们对住房价格持续上涨的预期，抑制对住房的过度投资和投机的需求。二是深入推进土地供应和住房市场化改革，让市场真正发挥价格调节和竞争提效的作用。首先要推动土地供应的市场化改革。当前的土地供给取决于地方政府，土地供给的不确定性预期使得开发商尽可能多拿地，因此供给的有限性及开发商的“囤地”行为不断推升地价和房价。要改变这一行为模式，必须加快推动土地的产权制度改革，允许农村宅基地进行抵押、担保、转让，使之具有商品属性和交换价值，增加土地供给主体，形成真正的土地市场。其次，深化住房市场化改革。当前部分住房并没有市场化，一些政府机关仍然存在以保障房的名义推出名目繁多的住房实物分配政策，并从土地供应、融资安排、项目上市等各方面进行优先支持。这不仅阻碍了房地产市场改革的深化，而且制造了新的社会不公与寻租空间，因此应当逐步取消各种形式的实物分配政策。同时，要逐步将一刀切的“限购、限贷”行政政策转变为更具针对性的分类治理的经济调控政策。三是房地产行业调控政策要根据区域异质性特点进行差异化调整。房地产调控政策需要体现差异化，未来房地产政策调控方向应当突出“宏观稳、微观活”。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立长效机制的同时，坚持“分类施策、分城施策”的调控导向。一线城市和热点二线城市应当从严控制城市规模和抑制投资需求两方面入手控制房地产风险。例如，2013年北京、上海商品房分别销售了大约19万套和23万套，而当年两市分别新增人口46万和35万人，随着大量人口进入，住房需求仍将长期存在。而多数二线、三线城市需要重点进行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的双重结构调整。在供给结构方面，重点支持140平米以下的中低价位普通商品房销售，抑制高档、大户型楼盘的投资和开发；在需求结构方面，重点满足中低收入者的自主性购房需求，抑制炒房者的投机需求。对大多数三四线城市，供应相对充足，重点是去库存化。四是加强住房信息的统计信息披露，避免投资者因信息不对称而走向过度投资。众多的理论研究和国外的实践表明，增加市场上住房供求信息的披露和房产交易的透明度有利于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因为住房供求信息的披露越多，交易者就越容易将这些信息纳入自己的参考范围，从而制定合理的购买和投资计划，减少因信息不足造成的盲目跟风，减少了噪音交易者的数量和比例，使房价回归基本面主导模式。美国、加拿大和欧洲各国通过定期编制房地产市场价格指数发布市场信息的做法值得我们学习。中国需要加快推动住房信息联网和不动产信息登记制度落地，定期发布各区域房屋出售情况、住房租金价格指数信息，提高信息透明度，为购买者和投资者决策提供充足的信息保障，避免盲目跟风、追涨杀跌，稳定房地产价格。

（三）按需求构筑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

住房保障是人权保障，要“居者有其屋”，但“有”的含义并非特指物权上的拥有，而是多种形式的“居住”，而且居住的标准和条件也存在差异。通过对不同国家各类人群的收入和居住消费分析，不难发现各类人群住房需求必然也是分层的：最低层次，由于收入低且不稳定，该类人群的主要诉求是满足温饱和基本生活，对住房的基本需求是有地方住，能遮风避雨，以及起码的卫生条件。第二层次，有一定收入，但收入不高、积蓄不多，没有能力购买房屋，此类人群的住房需求是面积不大、基本功能齐全、质量可靠，并具备一定的卫生条件。第三层次，工作稳定，存有积蓄，未来收入稳定，有能力改善居住条件并可经过较长时间积累拥有房屋产权，但购房需要获得信用增级和融资支持，此类人群的住房需求是面积适中、功能齐全、质量较高以及较好的卫生与生活环境。第四层次，收入高，经济能力强，信用好，有能力充分改善住房条件，对住房要求高，不仅满足于居住，还要将房屋作为投资对象确保个人财产的保值和增值，此类人群对住房需求是面积较大、品质高端、环境优良。许多国家还存在特殊群体，尽管这些群体收入不高，但国家会给予特殊支持帮助其解决住房需求，如公务员、军官等。由于各类人群的住房需求不同，在住房保障制度安排上不能简单运用一种政策、一种方式统一解决。

随着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加快，城镇人口快速增加，普通百姓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保障性住房需求压力越来越大，中高等收入群体改善性住房需求将越来越强烈。面对日益复杂和强烈的住房需求，各级政府一直都在研究借鉴国际经验，努力探索构建一个有效的住房保障体系。尽管各级政府十分努力，各种政策措施也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总是试图通过构建一个可以全面推广的模式，解决全国各层次的住房需求，在实践上一直饱受诟病。为了进一步健全、完善中国住房保障制度，我们还需要新思维、新角度和新模式。基本思路是：在住房供应和住房消费两端分层次构建中国住房保障体系：一方面着力构建“基本需求有保障、首套购房有支持、商品住房有市场”的住房保障供应体系；另一方面建立健全中低收入群体租房补贴财政政策和中高收入住房信贷政策制度体系，从而形成市场供给与政府保障相结合，以市场供给为主的住房保障供应体系，以及政府信用增级、税收灵活调节的市场引导体系，建立符合国情的住房消费模式，逐步构建总量基本平衡、结构基本合理、住房消费和居民收入基本适应的住房供需格局，全面实现“住有所居”的目标。

在政策制度安排上，借鉴国外依法促进住房保障体系建设的经验和做法，尽快制定、完善住房保障法律法规，健全住房保障制度，充分体现效率原则、公平原则、普惠原则、稳定原则。一是建立住房保障相关法律。加快住房保障立法进程，从法律层面明确国民

享有“住有所居”的权利，政府有承担住房保障的义务，明确住房保障覆盖群体范围；确定各级政府在住房保障中职责，以一定形式固化中央和地方政府在住房保障方面的财政支出；明确在住房保障方面的公平、透明的运行机制等。二是完善财税制度。包括建立中央、省级政府对保障房建设的专项转移支付机制；制定保障房建设、运管环节税收优惠政策；对中低收入群体租房、购房给予分层租金补贴或按揭贷款利息支出补贴；金融企业向住房保障项目投入信贷资金给予税收优惠。三是创新金融制度。包括建立保障房建设投融资平台，由国家统一调度、筹措资金；创造住房保障金融的市场运行条件，继续吸引社会资金进入住房保障领域，创新商业运行模式，使金融市场可持续发展；创新个人按揭贷款的产品及担保，对于中低收入群体建立可操作的政府补充担保机制；拓展住房储蓄制度，建立政府引导的住房储蓄制度，实行自愿加入，政府分层补助，低存低贷，先存后贷，互助解决住房需求。四是完善公积金制度。包括明确公积金产权制度，重塑收益分配机制；严格规范公积金中心是“受托管理人”、受托银行是“账户管理人”的职能定位，建立参与主体间的制衡机制；强化监督管理，尤其加强金融监管，改变近几年管理缺失、混乱的情况；对住房公积金制度进行创新，如探索将按揭职能全部交由商业银行，公积金运营机构集中精力通过增加投资收益为公积金缴存人带来更高回报等。五是坚持土地优惠政策。主要指在土地供给量、土地使用费或出让价格方面继续给予优惠，包括采取土地无偿划拨等方式。

在操作层面上，借鉴国外住房保障制度经验，从政府补贴方式、资金来源、房源筹集、财税配套、金融支持、住房管理等几个层面，针对不同人群，提出配套政策安排，通过统筹规划、科学运用、精细管理，达到扩大保障覆盖范围，提升住房保障效率。

一是绝对低收入人群的住房保障。应基本依靠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提供公共产品即租赁型保障住房（2013 年国家规定廉租房并入公租房管理，以下统称公租房），解决低收入人群住房需求。这部分低收入群体主要是指家庭特别困难，需政府救济的人群，包括伤残人士等。具体设想是：（1）政府补贴方式以实物配租和租金补贴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政府直接投入资金筹措公租房，供低收入人群居住并收取租金；土地供给采取行政划拨方式供公租房建设无偿使用。另一方面，按照各地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在低收入人群中分层，对少数最低收入群体进行全额租赁补贴，对其他低收入群体进行部分补贴，随着租赁者收入变化调整租赁补贴标准，可采用租金支付和租金补贴收支两条线或者直接减免租金的方式。（2）资金来源主要是以中央政府为主，地方财政为辅，拨款专项用于租赁型保障房建设。通过立法约束各级政府财政支出行为，改变在住房保障领域投入的随意和无序，确保对低收入群体住房保障资金投入。（3）房屋归属。此类公

租房资金主要由政府提供，产权归政府所有。(4) 房源筹集。公租房房源通过政府新建、改建、收购、在市场上长期租赁住房等方式多渠道筹集。(5) 财税配套。凡是为低收入群体提供公租房的开发建设、收购、租赁等行为全部免收相关税费，免征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等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如果个别中低收入者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对其租金支出予以抵扣。(6) 居住条件。本着保障基本居住标准，扩大保障覆盖群体的原则，对低收入群体提供的公租房居住条件相对较低，仅能满足基本居住需求。结合我国经济水平，考虑进城务工人员的住房保障需求压力，可以借鉴日本面向特困阶层提供第二种公营住宅的经验，在保证房屋质量的前提下，控制房屋面积、简化结构、降低装修材料标准，从而降低租金价格，扩大保障覆盖面。(7) 住房管理。首先，对低收入困难群体提供的公租房是不得转租、不得出售的，属于永久租赁的保障房；其次，制定公租房分配、准入、退出、维护、管理和监督等制度，尤其要细化准入和退出标准、实施方式，如对入住后收入水平超过上限标准的承租人，强制五年之内必须搬出；再次，政府成立专门机构或委托下属事业单位对公租房进行长期管理和维护，负责执行公租房政策，对承租人进行准入、监督和退出，对房屋进行维护和管理等。

二是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保障。中低收入人群是指收入较低，买不起住房且无法支付市场住房租金的群体。基本思路是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支持，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共同解决此类人群住房需求。具体设想是：政府投入资金并引入社会资金建设公租房供中低收入者居住，收取租金，土地供给采取行政划拨方式供公租房无偿使用，或者与当地市场住房租金平均价格衔接，此类人群直接租住市场提供房屋的，政府按照该类人群收入分类给予租金补贴；在政府投入方面，以地方财政投入为主，中央财政补助为辅，对于采用提供公租房保障方式的，可以引入社会资金投入建设，政府通过参与投资、资本金注入、投资补助、贷款贴息等方式，支持公租房建设和运营的投入；该类公租房实行“谁投资、谁所有”，投资者权益可依法转让；公租房房源通过新建、改建、收购、在市场上长期租赁住房等方式多渠道筹集；如果采用租金补贴方式，保障人群可以自主到市场租赁住房；除适用低收入群体的税收优惠外，还可以采取以下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资金进入公租房市场，对保障性住房开发商贷款政府予以贴息，金融企业为公租房提供信贷资金支持，按信贷支持资金的一定比例给予税收优惠。此类公租房的房屋面积、结构、材料等略好于为低收入群体提供的公租房，租金价格也高于为低收入群体的公租房。在住房管理方面，与低收入群体公租房管理相比有以下两点不同：首先，对中低收入群体提供的公租房不得转租，但租赁人可以购买。借鉴韩国建设可出售公租房经验，当租赁期限达到一定期限，保障群体依靠住房储蓄和政府金融支持购买公租房产权。其次，

严格退出机制，如对入住后收入水平超过上限标准的承租人，强制三年之内必须搬出或购买。

三是中等收入群体的住房保障。中等收入人群是指收入稳定，有能力购买住房但融资能力不足的群体。基本的解决思路是由地方政府城市建设开发中提供一定数额的经济适用房或自住商品房，供中等收入者选购，购房者依靠群体间互助、商业性金融支持、政府信用增级等途径完成自住房购买；政府补贴方式以间接补贴为主，包括对经济适用房、自住型商品房建设通过行政划拨供给土地、减免土地出让金等；资金来源主体是以社会资金为主，财政资金为辅，采取财政补助、银行贷款、债券融资、群众自筹、市场开发等办法多渠道筹集资金；中等收入者购买经济适用房、自住型商品房的支出按收入水平分层抵扣个人所得税，借助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住房储蓄贷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的，政府可以提供信用增级服务，贷款利息支出按收入分层予以抵扣个人所得税；通过强制互助和自愿互助结合方式，即以住房公积金制度和住房储蓄制度并重的方式，提升融资能力。这类人群是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的主要人群，对于住房公积金制度尚不能覆盖的，鼓励该类群体购买商业的住房储蓄，由政府适当予以补助。目前，中德住房储蓄银行是中国与德国的商业银行出资共同建立的住房储蓄银行，国家可通过此银行试点逐步推广壮大住房储蓄制度，解决未进入住房公积金制度群体在住房领域的互帮互助。

从居住条件上来看，房屋面积、结构、材料明显好于公租房，但与标准商品住房相比还存在差距，相应房价低于商品房价格。各级政府应明确购买此类住房条件、税收优惠政策，及按揭贷款的税收优惠或贴息政策；允许上市交易，但政府必须对交易市场、交易行为、交易对象进行管理，如交易对象必须符合经济适用房购买条件；对使用住房公积金资金建设的经济适用房项目，符合经济适用房购房条件的公积金缴存人优先购买。

四是对于不仅有能力购买自住房、还有能力进行非自住房投资的高收入群体，其住房与投资需求应通过市场满足，即高收入人群通过商业按揭贷款进行自住房融资；对于非自住的投资性房地产需求，政府通过税收政策予以调节。其实，很多国家都灵活运用税收政策对于有能力购房者进行差异化调节，如对个人购买唯一家庭首套住房的，给予契税适当减免的优惠政策，对购买高档住房和第三套以上住房的，可征收高额契税等。

责任编辑：沈家文、任朝旺

绿色发展的三大动力

夏 光

摘要：中央把绿色发展列为“十三五”五大发展理念之一。绿色发展是以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为特征的发展进程，是指导中国发展的价值导向。绿色经济发展是绿色发展的主体部分，包含“经济要环保”和“从环保要经济”两项内涵以及“对原有经济系统的生态化改造”和“大力发展绿色产业”两项外延。加快绿色经济发展需要三大动力：一是推动力，对经济发展进行从严从紧的环境管制；二是拉动力，对绿色经济发展给予激励和引导；三是行动力，增强经济体本身的绿色创新能力。三者合一，构成了绿色经济发展总的驱动力。

关键词：绿色发展 绿色经济发展 三大动力

作者简介：夏光，环保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建议，把绿色发展列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与创新、协调、开放、共享一起成为“十三五”规划的灵魂，将重新塑造和引领中国未来的发展格局，意义十分深远。绿色发展是以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为特征的发展进程。发展是本体，绿色为约束。提出绿色发展，就是树立了发展的绿色价值导向，要求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兼得，这是一种很高的价值追求。中国转向绿色发展是一个非常长的历史过程，“十二五”时期已经在绿色发展上取得了很大进展，“十三五”将会进入快速推进的阶段。

一、绿色发展的主要路径：绿色经济发展

严格来说，绿色发展是指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向着生态环保的方向转型和发展，分别构成绿色经济、绿色政治、绿色文化和绿色社会的发展。在这几个领域中，绿色经济发展是最为本质和重要的，因为资源环境问题主要是由原有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方式带来的。解铃还须系铃人，绿色发展的最大突破口还在经济发展领域，而且经济的绿色发展离不开相关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意识的绿色转型支持，可以说，抓住了绿色经济发展，就抓住了绿色发展的要害，因此，绿色发展可以理解为主要是指绿色经济发展，或曰经济发展的绿色化。加快推进经济发展绿色化，在当前具有特殊的意义。

第一，绿色化是中国未来发展战略的核心元素之一。中国是世界上对绿色发展需求最迫切、积极性最高、成功可能性最大的国家，因为世界上同时具备人口多、资源紧、经济强这三个要素的国家只有中国。中国未来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的关键词应该是“均衡”，包含平衡、全面、中速、兼顾、公正、协调、多元、民主、妥协、补平、开放等多种内容，拒绝单一、激进、偏在、少数、片面、封闭等做法。为此，对于那些距离均衡较远的短板因素如社会道德、生态环境等，将会采取一些特别措施，这是为什么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加速”而对经济领域提“稳增长”的原因。国家对节能环保产业提出的发展规划目标是“十三五”期间实现年均 15% 以上的增长速度，比总体经济增长 7% 左右的速度高一倍左右。

第二，绿色化是应对资源环境瓶颈的必然选择。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标志之一是环境承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生态环境问题十分严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巨大的产业“块头”是造成生态环境问题的客观原因。我们能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通过把现有经济产能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去的办法来缓解环境问题压力呢？不能。因为国际金融危机给了人们一个重要的警示：实体经济是国家综合实力的根基，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如果以虚拟经济作为经济的主体，是不切实际而且是十分危险的，所以国家已经做出了做大做强实体经济的战略决策，制定了《中国制造 2025》行动纲领。就是说，我们已经没有放弃实体产业来保护环境的选择，只能通过实体产业绿色化来实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标。

第三，绿色化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动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上世纪 90 年代提出的战略任务，近 20 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集约发展的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这些转变都主要是从经济效率本身的角度来体现的，例如主要反

映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生产的投入产出效率提高、投资决策的科学性增强、市场配置资源的份额提升等方面。现在，中央提出绿色发展战略，指出“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是针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中资源利用效率不高和环境污染较重的突出问题而专门提出的，这是从一个新的角度扩大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容，也使资源环境要求更加深入地融合到经济发展全过程之中。

第四，绿色化是稳增长调结构的引航灯和催化剂。在以往人们的认识中，当经济比较困难的时候，国家对绿色环保的要求会相对降低一点，以免过强的环保要求影响经济增长速度，而这次把绿色发展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是在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的情况下提出的。为什么？因为绿色发展是为稳增长调结构指明方向，向市场发出明确的信号，表明我们要保的经济增长不是所有的产业活动，而是那些有利于国家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活动，我们要的经济结构，也不都是原来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而是有利于循环低碳发展的经济结构。绿色发展实际上是要引导和催化经济的转型升级，促使经济增长进入具有绿色竞争力的通道。

第五，绿色化是经济转型的传动器和输油阀。马达轰鸣不等于车轮飞转，在马达（动力）与车轮（行走）之间，需要有效的传动机构，才能驱动车子前行。要把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顶层设计变成可见可得现实成果，还需要具体的实施行动，推动经济发展绿色化就是把这项顶层设计转化为实际行动的“传动机制”。在这里，绿色化的“化”字具有特殊意义，值得深入理解。“化”意味着在时间上长期持续，在空间上广泛实施。我们都知道，要使一个静止的重物运动起来，开始时十分吃力，需要提供很大的推力，初始速度比较慢，但随着速度逐渐加快，就可以不必提供那么大的推力了。这个比喻告诉我们，推动绿色经济发展，开始时会因为认识不足、利益掣肘等原因而比较困难，此时一定要下定决心，咬牙加力，等到绿色发展逐步成为社会共识，各种有利于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也建立起来了，那时绿色发展本身就会具有继续向前的惯性，就比较容易继续推动了。万事开头难，“化”字解其味，这是深刻理解经济发展绿色化要求的一个关键之处。

二、“绿色经济”的理论解析

（一）“绿色经济”的两重含义

绿色是指环保，经济是指赚钱，所以绿色经济发展就是指那些同时产生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发展过程。具体而言，绿色经济有两重含义：第一重含义，是指“经济要环

保”，即要求经济活动不损害环境或有利于保护环境。在这里，“绿色”是对经济活动的外在限定，它要求经济活动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或不付出过大的环境代价。在这个意义上，绿色经济并非单指某些产业活动，而是对整个经济体系的要求，它实际上是指要把原有经济体系的面貌由“非环保型”转到“环保型”，因此，此时绿色经济又可称为“环保型经济”或“环境友好型经济”。举例说，钢铁、化工、建材、造纸等这些产业，在粗放型发展方式下是高排放的，因而是非绿色经济，而在清洁技术、循环利用和节能减排的生产方式下，就是环保型的，就属于绿色经济。此时，绿色经济发展强调的重点是“环保”，即为了环保的目的，哪怕放弃一部分经济效益也是必要的，以保证经济是“绿色”的。第二重含义，是指“从环保要经济”，即从环境保护活动中获取经济效益。美国耶鲁大学丹尼尔·埃斯蒂教授和安德鲁·温斯顿教授在《从绿到金——聪明企业如何利用环保战略构建竞争优势》一书中指出：“为什么通用电气、索尼、丰田、沃尔玛这些世界最大、最强硬、最追逐利润的企业现在都在谈环境保护？因为聪明的企业会通过对环保挑战的战略管理取得竞争优势”。他们认为“以全新视角观察事物，会带来实际收益。过去 40 年间，越来越多的企业发现了灵活管理绿色浪潮带来的压力所能获得的潜在效益。未来的企业将既创造业务利润，又创造一个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世界”。我们可以把这个意义上的绿色经济称为“从绿掘金”，也就是说，环境保护可以成为经济利润的一个来源，成为一个经济增长点。举例说，环境污染治理、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新能源开发、绿色食品研发等，都可以带来新的利润，使这一部分活动改变了“环保只赔钱不赚钱”的形象。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绿色经济”强调的重点是“经济”，即通过政策调节和定向开发使环境保护也有利可图。

（二）“绿色经济”的两项外延

由此，按照绿色经济发展是能同时产生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发展过程的定义，可以看到，绿色经济发展具有两项外延：第一项外延，是对原有经济系统进行“绿化”或生态化改造。它包括开发新的生产工艺、降低或替代有毒有害物质的使用、高效和循环利用原材料、降低污染物的产生量、对污染物进行净化治理等，这些活动都能减轻对环境的压力，并通过节约资源而获得经济效益，对传统产业都是适用的。实际上，现代工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低排放甚至零排放，所以尽管产业是传统产业，但属性上已属于绿色经济。中国政府部署的“加快建设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工业、建筑、交通体系等”就属于这个范围。第二项外延，是发展对环境影响小或有利于改善环境的产业。它包括生态农业、生态旅游、有机食品、可再生能源、服务业、高新科技、植树造林等等，

称为“绿色产业”。这些产业的特点是天生对环境友好，不必投入过多资源进行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这些产业并不都是新兴产业，有些是属于传统产业，而且有些产业有着数千年的悠久历史，例如中国传统的农耕生产方式中有些做法充分运用了资源循环利用的原理，充满了生态文明的智慧。目前联合国环境署倡导的“绿色投资”主要是要求各国把资金投入到这些既能增加就业、拉动消费又减少排放的经济活动中去，包括清洁技术、可再生能源、生态系统或环境基础设施、基于生物多样性的商业（如有机农业）、废物及化学品管理、绿色城市、绿色建筑和绿色交通等，这些与上述绿色产业也是基本一致的。中国政府部署的“培育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也属于这个范围。

三、绿色经济的实践进展

（一）中国绿色经济发展现状

中国目前已经出台了《节约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循环经济促进法》《环境保护法（2014 修订）》以及《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等，此外还有大量的以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为目的的产业政策等，这些都对促进经济绿色转型和绿色产业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根据环保部政研中心俞海和张永亮博士的研究，近十年来，中国绿色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有所提升。绿色经济以及含有绿色元素的经济成分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GDP）保持了同样增速，2005 年—2007 年占 GDP 的比重便已经达到 10% 以上。有效降低了单位 GDP 能耗和单位 GDP 碳排放。2013 年单位 GDP 能耗为 0.66 吨标准煤/万元，与 2001 年相比下降 52%。2012 年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量为 1.77 吨/万元，与 2001 年相比下降 43%。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占据国际领先地位。目前，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风电场装机容量，光伏组件产量，以及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多的水力发电量。2012 年，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达到 677 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一，比 2009 年翻了一番。环保产业已成为拉动国民经济的重要增长点。1997 年—2006 年，中国的环保产业产值从 459.2 亿元增至 6000 亿元，增长了十倍，相比其他经济部门增速显著。2006 年，环保产业产值占 GDP 的 2.76%。据估计，2010 年环保产业产值已达到一万亿元。环保产业也极大推动了绿色就业，2008 年有 300 多万人在这一领域工作。而在 2004 年，这一数字仅为 153 万。

从以上进展看到，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中国绿色经济发展的步伐在加快，经济绿色化程度在提高。这个趋势在“十三五”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保持不变，并将在这一轮全

球经济绿色转型浪潮中起到引擎作用。若以中美两国经济绿色转型来比较，中国的转型将会比美国更快，因为中国经济绿色转型主要发生在生产领域，主要任务是改变落后和粗放的生产方式，这是受到广泛支持的；而美国经济绿色转型主要发生在生活领域，主要任务是改变过多消耗资源能源的生活方式，这会受到一定的抵触，因此，随着中国绿色经济发展，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将更加重要，这一点已在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谈判过程中反映出来了。

（二）绿色经济发展的一个样本：天津市宁河县

在本文研究期间，作者前往天津市宁河县进行了发展绿色经济专题考察调研。宁河县委李树起书记亲自带领党委政府班子接待了调研组并带领参观了现代农业、新农村建设、新能源产业、总部经济、生态保护等项目，详细介绍了全县发展情况和基本经验。

宁河县位于京津唐三大城市之间，具有区位优势大、自然条件好的基本县情，水系较发达、地热埋藏浅、煤气地层广、湿地面积大、土地资源多、生态环境好、交通干线密、人口压力小，这些都使宁河县发展具有良好的先天条件。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一直是宁河县面临的选择，有这么好的条件，若不制定好的发展战略，反而容易造成大手大脚使用资源走上粗放发展的道路。宁河县确立了建设美丽宁河、坚持绿色发展的理念，实施了产业提升、生态宜居、改革开放、科教兴县、文化繁荣、富民惠民六大战略，使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持了良好的互动关系，二者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绿色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

第一，形成了现代农业发展优势。宁河县形成了小站稻、无公害蔬菜、河蟹等八大主导农产品，建成了种蟹、种猪、种鱼、种兔、种稻、种苗等六大高端种业基地，培育了宁河原种猪场、天津市水稻原种场等四个国字号良种企业，被确定为国家优质小站稻基地、优质棉基地、全国无公害生猪生产基地等。2014 年农业实现增加值 30 多亿元，同比增长 5.9%。第二，形成有本地特色的绿色化工业结构。全县有工业企业 3000 多家，形成了新能源、新材料、食品加工、金属制品、机械制造、高档包装纸等五大主导产业。累计认定科技型中小企业 1200 多家，培育科技小巨人 90 家，使全县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持续下降，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第三，提升了服务业的活力和规模。按照现代商贸物流基地和生态旅游胜地的定位，建设了大型商城、商业区、购物中心、农资连锁店等；总部经济基地已吸引数十家全国大型公司设立分支机构；七里海湿地公园成为较为知名的生态旅游目的地；天津未来科技城已经建设好基础设施；2014 年服务业占比达到 44%。第四，绿色产业加快发展。建立了万亩循环农业园区、低碳产业示范区等，使

大众汽车、热电联产、风力发电等绿色产业项目落户宁河；33 家新能源新材料企业成为新兴产业的龙头；从 2008 年起实施了绿色宁河建设，按照一片两区三网四带的布局进行林业建设。

宁河县是一个只有 42 万人口的小县，却做出了绿色经济的大文章，全县 2014 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500 亿元，是 2008 年的五倍，农民收入比 2008 年翻了一番多，多年来没有人员越级上访、缠访等现象。其主要经验是坚持绿色发展理念，超前布局新兴产业，不断进行环境建设，用绿色规划引导产业转型改造。积极发展绿色经济，发展速度不一定很快，但质量有提高，价值上得实惠，是可持续的发展方式。

四、绿色发展的三大动力

“十三五”既要保增长又要绿色化，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的必然途径是加快推进绿色经济发展。“加快”就意味着“踩油门”，为快跑提供强大的动力。对任何物体，驱动其运动的力量一般都来自三个方面：推动、拉动、行动。绿色经济发展也是如此，即加快绿色经济发展需要三大动力：一是推动力，对经济发展进行从严从紧的环境管制；二是拉动力，对绿色经济发展给予激励和引导；三是行动力，增强经济体本身的绿色创新能力。三者合一，构成了绿色经济发展总的驱动力。

（一）推动力：实行从严从紧的环境管制

推动力是来自经济系统以外的强制性力量，对经济发展可能产生的负面环境影响给予约束和制衡，使经济发展更绿化，属于“大棒”政策。从国内外经验看，对经济发展给予强力的环保限制是普遍做法，相当于从经济发展的腰眼上顶住往前推动，因此被推动的对象是被动的，需要受到监督。这种限制应该达到什么程度，是与当时的经济发展阶段有关的，一般而言，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所受的环境管制越强。从严从紧的环境管制可以通过产业政策、环境管理、司法管制、政治约束等方式来实现。

第一，提高环境准入门槛。按照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等主体功能区，制定不同的区域发展政策。根据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确定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并以此为基础制定经济发展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在一些特殊的地区，要实行环境优先。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环境标准的要求，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经济政策、建设项目等进行严格的环境影响评价，对环境容量不足和污染物排放超过总量控制计划的地区，严格限制有污染物排放的建设项目的新建和扩建。对资源和环境消耗设定刚性红线。从资源环境保护的角度制定更加严格的产业政策。

第二，加强环境保护管理和执法。依法关闭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对排放污染造成重大损失的企业和个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围绕水污染防治、大气污染防治、城市环境保护、农村环境保护、生态保护、核与辐射环境安全和推动解决当前突出的环境问题等重点任务严格执法，抓一些大案。严格实施对自然资源的用途管制。司法系统介入资源环境领域，按照新《环保法》、高级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解释，加强环境污染案件的审理和判决。

第三，强化环境与经济综合决策机制。把环境保护前置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阶段，在经济决策过程中强化环境保护的把关和引导作用。从环境保护方面提出对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建议。对环境有重大影响的决策，应当进行环境影响论证，必要时实行环保一票否决。把环境保护作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主要标准和重要手段。

第四，把环保要求纳入生产和消费全过程。广泛推行清洁生产，鼓励节能降耗，防范和应对污染事故，构建低消耗、少污染的现代生产体系。实行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流通方式，积极治理铁路、水运等运输污染，保障危险化学品运输和储存安全，限制高污染产品贸易，完善资源再生回收利用，建立清洁、安全的现代物流体系。推行强制性生产者责任延伸、垃圾分类和消费品回收制度，建立绿色、节约的消费体系。

（二）拉动力：制定促进绿色经济发展的激励政策

拉动力是指通过经济利益等市场手段对绿色经济发展行为给予引导和激励。与前述强制性的推动力相比，拉动力更加注重正向激励，谁走绿色发展之路就使谁获益，调动经济行为者的主动性，因此不必过多依赖外在监督。激励政策就是“胡萝卜”政策，这种政策是有前提条件的，就是企业等经济主体已经能够达到基本的环保要求，在此基础上用经济激励政策使之达到更高的环保要求。在这方面，国家已经制定了很多促进循环经济、绿色产业、清洁生产、综合利用、环保产业等方面的鼓励性政策，今后这些政策将会更加充实。

第一，建立健全环境产权制度。按照中央关于“落实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建立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人职责的体制”的要求，完善产权制度。一是建立环境资产的产权法律制度。制定环境标准和划出生态红线，确定可用于支撑经济发展的环境承载力规模，明确这些环境承载力的终极产权属于全民所有，其作用是从经济发展中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二是建立国有的能代表全民行使该种环境承载力所有权的经济体制，可以考虑成立“国家环境资产经营总公司”来承包作为经济资产的环境承载力，这个公司出于追求经济利益的目的，会尽力把有限的环境承载力资源配置到获得

最大经济效益的经济活动上去。三是建立环境资产产权交易市场，让市场机制发挥配置经济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使有限的环境承载力资源经过市场选择而流转到获得更高效益的生产领域。以上思路可以先在局部的区域或流域进行试点。

第二，实施促进提高资源产出率的鼓励措施。用法规形式确立对循环利用资源的经济活动给予减税、补贴等优惠措施。制定法规和相关政策，对优先采购和使用节能节水节材等有利于保护环境的产品、设备和设施等行为，给予奖励或补差。制定法规政策支持清洁能源、节能环保产业发展，包括建立清洁产业技术研发支持基金、风险投资基金、新型节能环保技术推广平台等。建立和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和生态补偿等重要制度。

第三，创设有利于绿色经济的激励机制。出台绿色信贷、污染责任保险、绿色投资等环境经济政策，把产品消费后的处置责任前移到生产者，从而激励生产者按照环境友好的理念进行产品设计，优化生产过程。通过制定引导性的财政和价格政策，引导企业走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之路。通过调整水、电、煤等资源价格促进企业采取资源节约型的生产工艺。完善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生态省（市）、生态示范区、环境友好型企业、绿色学校、绿色社区等创建活动，大力倡导环境友好的消费方式，实行环境标识、环境认证、绿色采购等，使那些在推进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互融合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的地区获得荣誉和实惠。

第四，实行有利于绿色发展的干部选用制度。以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为依据，改革干部考核评价和任用制度，使那些在推进绿色化中成绩突出的干部得到重用。以资源环境生态红线管控等为基线，建立生态环保问责制，进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和责任追究。

（三）行动力：鼓励企业和社会的绿色创新

行动力是指企业和社会主体实现绿色转型和绿色发展的能力。如果这些经济主体没有行动能力，那么无论外界的推动力和拉动力怎样加大都不会起作用。绿色创新是一切有利于实现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目标的创新活动，又可称为生态文明创新，是应对发展与环境双重要求的唯一出路。过去，企业和社会的创新活动主要是以追求经济利益为导向，这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现在需要把他们的创新活动引导到生态文明创新上来。

生态文明创新（绿色创新）的行动力是企业和其他社会主体自身的一种内在能力，这种能力之强弱，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企业和社会主体的生态文明意识，这是一种主观动力；二是这些主体综合运用各种知识进行创造性思维和行动的能力，这是一种客观

能力。因此，提高绿色发展行动力，要分别从提高主观动力和客观能力上入手。

第一，增强全社会绿色创新的价值观和责任感。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重视精神力量对全社会绿色创新的强烈激励作用，在推动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文化创新中倡导绿色价值导向和生态伦理观，大力宣扬企业家和知识界对绿色创新的责任感和荣誉感。把绿色创新纳入“创新发展”的范畴之中，向全社会传播把绿色发展与创新发展融合起来的理念。发起绿色社会运动，倡导“我是绿色发明家”理念，鼓励社会公众从生活细节中发现和发明各种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小窍门、好方法。在各级教育系统中增加绿色发展和绿色创新的内容，培育青少年对绿色发展的信念和兴趣。

第二，增强全社会对绿色创新的知识重组能力。完善绿色创新的知识产权制度，为社会的绿色发明创造提供有力的法律保护。实行广泛的环境信息公开，向全社会提供尽可能多的绿色环保信息。向中小企业提供提高研发能力的专业培训，支持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设立国家绿色创新工程和绿色科技创新奖，对公益性绿色发展科技研发进行专项资金支持。

责任编辑：艾 冰

(上接第 90 页)

参考文献：

1. 黄勇、董波、陈文杰：《“县域经济”向“都市区经济”转型的意义与构想》，《浙江经济》2013 年第 11 期。
2. 编写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 2013 年版。
3. 杨伟民：《发展规划的理论和实践》，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4. 黄勇主编：《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 2013 年度报告》，中国计划出版社 2014 年版。
5. 浙江省经济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编著：《透视浙江改革开放 30 年》，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6. 浙江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编著：《未来浙江可持续发展》，红旗出版社 2012 年版。

责任编辑：沈家文、方 虹

国际原油价格影响因素分析及对策研究

何晓伟 郭 红

摘要：本文通过对原油供求基本面、库存、贸易、金融市场、美元指数、其它大宗商品价格等相关因素及其间的关系进行梳理和分析，展示了影响原油价格的关键因素与原油价格的变化趋势，得出供需决定价格的定性结论，并初步预测原油价格自 2014 年起将会走出持续三到五年平缓底部“U”型曲线；通过对原油价格与储量、产量、消费量、贸易量等因素的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出长期供需决定价格、多种因素相关共同影响的结论，提出分步建仓、增加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降低供应中断风险，推进战略石油储备基地建设、减轻经济下行压力，重视基础研究、构建原油价格监测预警体系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原油价格 因素分析 战略石油储备 协整检验

作者简介：何晓伟，国家物资储备局物资储备研究所高级物流师；
郭 红，国家物资储备局物资储备研究所经济师。

一、问题的提出

在当今经济生活和能源话题中，原油价格已经成为全球最关注的焦点之一。2014 年 6 月以来，原油价格一路下滑，从 120 美元/桶以上，一度跌到 30 美元/桶以下，达到近五年的低位。

截至 2016 年 1 月 29 日，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 33.62 美元/桶，基

本维持近一年多以来的低价区间。回顾在 2008 年时油价曾经逼近 150 美元/桶，当前价格仅是高峰时的 1/5。而这期间，接连曝出 2015 年 1 月 14 日，中国某企业急于抢购，进口一船油运输过程中跌去人民币净值 2.5 亿元；海关总署 2014 年 12 月，2015 年 1 月、2 月及 5 月日均进口数据下滑也表明存储空间几乎已经用完。本轮原油价格下跌诱因是乌克兰危机，主要影响因素是沙特等产油国与美国页岩油抢占市场份额而引起的供需失衡所致，随着国际油价暴跌，中国在 2014 年底至 2015 年购买了创纪录数量的原油，但由于国内存储空间不足和价格介入时机把握不准，无法充分利用较低的价格区间来持续充实战略储备。短期内国际油价如此快速涨跌引起诸多讨论，而中国相应的反应和应对措施更显乏力，这也对我们持续做好战略石油储备工作提出了严峻挑战。

二、国际原油价格的主要影响因素

石油是重要的战略物资，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对于国际石油价格巨幅波动，影响因素很多，一般包括能源消费量、产量、库存、剩余产能、替代产品供给以及地缘政治风险等基本因素。就目前的市场情况来看，这些因素仍然是影响原油价格的最根本要素。此外，期货市场交易、大宗商品投资及美元指数、股票、债券市场等因素，也会影响原油价格变化的评估与判断。图 1 描述了影响原油市场的六个主要因素，以及每个要素与原油价格间可能存在的联系，通过数据图表来阐释各因素间的复杂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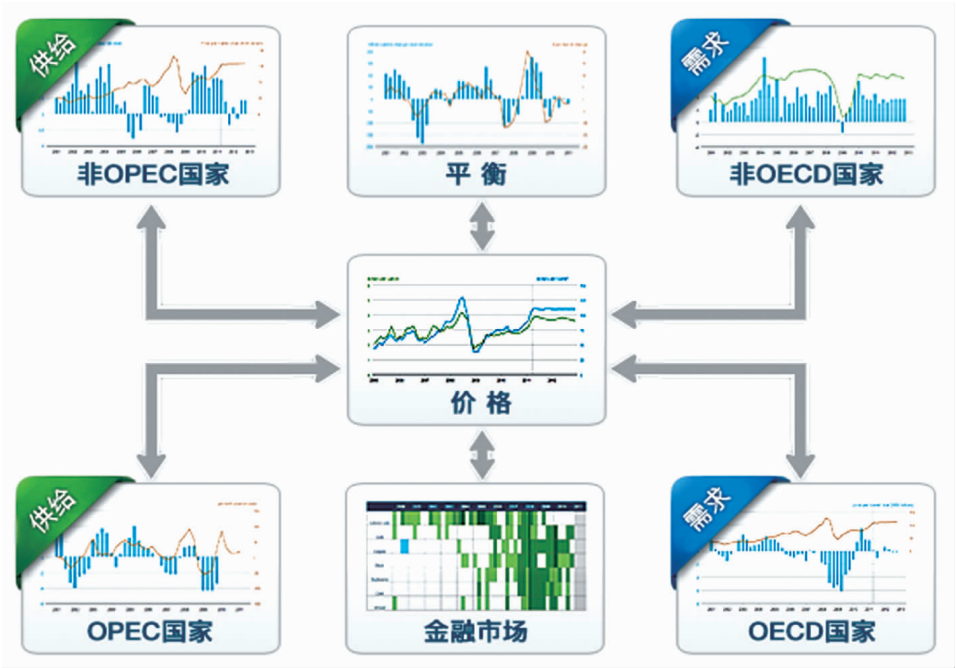


图 1 原油价格的影响因素

（一）非 OPEC 国家供应情况

目前，非石油输出国组织（非 OPEC）国家石油产量占世界石油总产量 60%左右，非 OPEC 国家的生产商通常被看作是价格接受者。2005 年—2008 年，全球经济增长势头强劲，而原油产量增长放缓甚至在某些季度中出现下滑，市场供不应求对原油价格形成较大支撑（见图 2）。2009 年—2014 年，非 OPEC 国家产量显著上升，其中增量主要来自美国。资料显示，美国石油生产过去六年来从每天接近 600 万桶剧增到 870 万桶，创近 20 年新高，而同期美国的原油日均进口从 1400 万桶降至 800 万桶，作为主要消费国，美国逐步实现能源自给，原油价格承压下降是必然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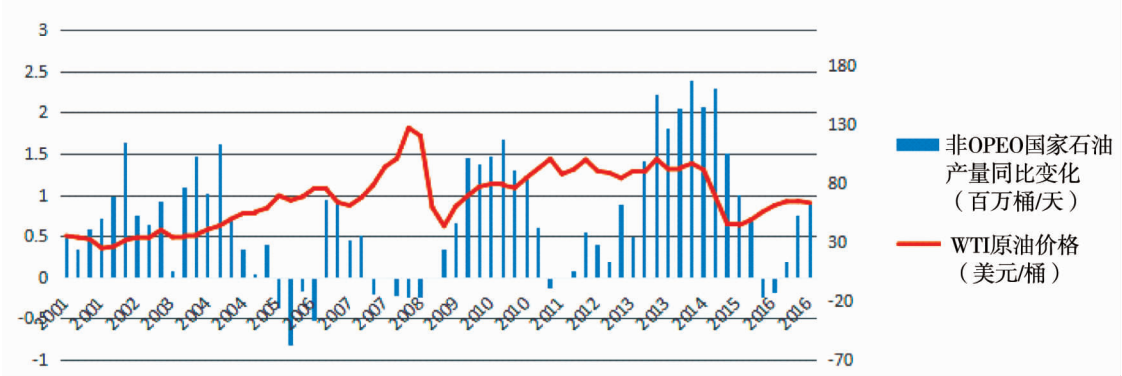


图 2 2001 年—2016 年非 OPEC 国家石油产量和 WTI 原油价格

数据来源：美国能源信息署 2015 年 9 月数据；美国能源部，<http://eia.gov>（下同）。

注：WIT 美国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WIT），WTI 即期合约被很多投资者视为国际能源市场的基准价。

OPEC 成员国的常规石油资源成本较低，非 OPEC 国家原油生产集中在勘探成本和生产成本相对较高地区和目前开发还不成熟的领域，如深水、油砂等，原油生产处于成本劣势；但非 OPEC 国家通常又处于技术领先地位，随着美国页岩油等新生产技术突破并开发利用，原油生产成本显著降低，最终间接促使价格降低。

原油价格不仅受非 OPEC 国家实际产量影响，还与各国对未来原油供应期望值变化密切关联。2005 年—2008 年，非 OPEC 国家最终产量报告显示其产量连续低于预期，使全球对 OPEC 国家原油产量依赖度史无前例地提高，进一步降低了 OPEC 成员国剩余产能，对非 OPEC 国家产量预测值下调也对原油价格的上涨形成压力。

（二）OPEC 成员国供应

全球 40%的原油来自 OPEC 成员国，同时 OPEC 石油出口量占国际石油贸易总量的 60%。OPEC 成员国的供给很大程度上影响国际原油价格。历史上，每当 OPEC 产量目标削减时，原油价格大都会上涨（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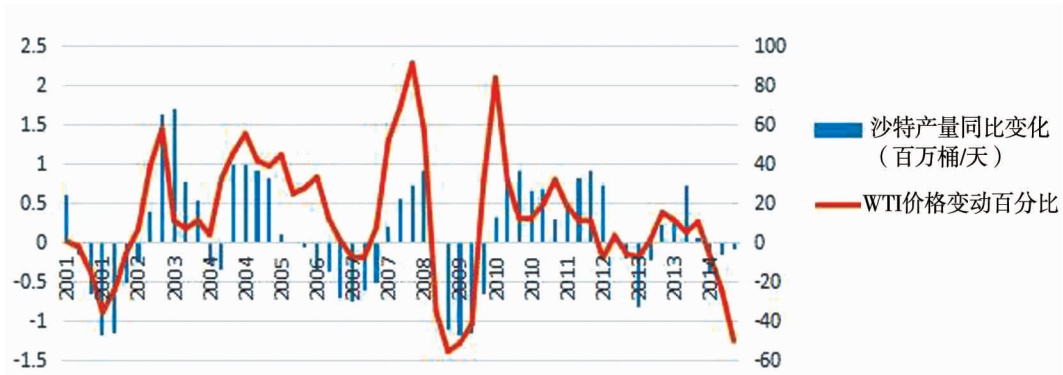


图 3 2001 年—2014 年 OPEC 产量目标变化与原油价格变化的对比结果

OPEC 剩余产能是评估全球原油市场应对原油供应减少风险的重要指标。当 OPEC 剩余产能降低到一定程度时，将推高原油价格风险溢价。2003 年—2008 年，经济对原油需求快速增长而原油供给增长缓慢，导致 OPEC 剩余产能紧缩，总剩余产能低于或接近 200 万桶/日（或低于全球供应总量的 3%），低剩余产能限制其对原油需求和价格上涨的反应能力（见图 4）；而 2009 年—2014 年，随着美国原油进口逐步减少，OPEC 剩余产能富余较多，市场份额逐步萎缩，以低成本价格换取市场份额的举措最终上演。此外，原油市场还受 OPEC 成员国国内及各成员国之间地缘政治事件的影响，包括对原油供应造成实际损失或潜在损失的事件都会对国际原油价格产生强烈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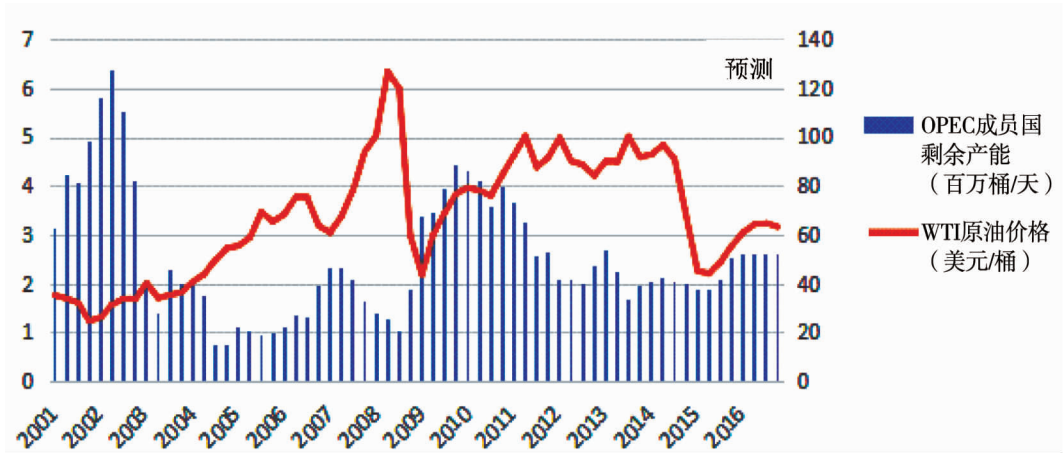


图 4 2001 年—2016 年 OPEC 成员国剩余产能与 WTI 原油价格

尽管 OPEC 试图对原油产量进行管理以维持既定的价格水平，但其成员国并未一直遵守 OPEC 所制定的产量目标，进而影响到原油价格。此外，近年非 OPEC 国家天然气产量不断上升促使天然气凝析液（NGL）产量出现显著增长，推动全球液体燃料供应总量上升，且 NGL 并未包含在 OPEC 产量配额中，有助于减缓原油价格上涨趋势。

此外，国际原油价格的走向不仅取决于现有的供应和需求量，还取决于对未来需求和供应量的预测情况。OPEC 根据现行供应情况和对未来供应的预期来调整其成员国的产量目标，但是对未来供应情况的评估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尤其是在当市场情况多变且存在很高的不确定性时预测会更难，并存在很大的滞后性，也将会影响原油价格。

（三）非 OECD 成员国需求

近年来，非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非 OECD）国家（包含主要发展中国家）的原油消耗量大幅上涨。2000 年—2014 年，OECD 成员国的原油消耗量呈缓慢降低趋势，而非 OECD 国家的原油消耗量则大幅上涨 40% 以上，其中上涨最快的国家有：中国、印度和沙特。非 OECD 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和原油消耗量之间存在着显著关联性（见图 5），尤其是 2001 年—2007 年、2009 年—2014 年中期，经济增长导致的需求增长超出了较高价格施加给原油消耗量下降的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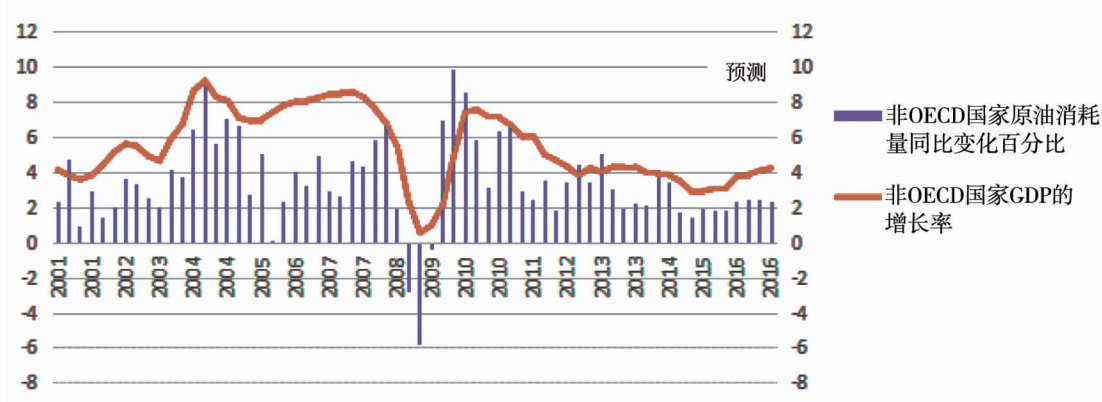


图 5 2001 年—2016 年非 OECD 国家 GDP 的增长率与原油消耗量

原油消耗量上涨反映了这些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经济增长的当前和预期水平对全球原油需求和原油价格的影响最大，尤其是商业和交通运输活动需要大量的原油，并直接与经济状况挂钩。同时，许多非 OECD 国家还经历着人口快速增长，这也导致原油消耗量强劲增长。

原油价格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与各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有很大关系。在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占经济总量比重较大，相对于服务业属于能源密集型产业。尽管在非 OECD 国家中，原油的运输消耗仅占总消耗量的一小部分，但是这一比例将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增大，非 OECD 国家人均汽车保有量与收入的上涨正相关，并具有很大的上升空间。据《英国石油公司（BP）2035 能源展望》预测，在未来 20 年内，原油消耗量所有净增长都将来自非 OECD 国家。

不仅原油消费与经济活动有关，能源政策也同样影响这一变化趋势。例如，许多发展中国家对终端用户价格施行管控或发放补贴，以防止消费者对市场价格变化做出过激反应。这使得需求对价格变化不敏感，进一步使经济增长成为推动非 OECD 国家需求和促使全球原油价格变化的重要因素。未来经济状况的展望也会对原油价格产生直接影响。

（四）OECD 成员国需求

2014 年，OECD 国家原油消耗量低于非 OECD 国家，占当年全球原油消耗总量的 49.2%，消费增长率较低。2000 年—2014 年的 15 年间，OECD 成员国原油消耗量实际呈下降趋势，而非 OECD 国家消耗量同期则上涨 40%。2006 年—2009 年，与非 OECD 国家相比，OECD 成员国的原油消耗量随着原油价格的上涨而下跌，并在经济低迷时大幅下跌。由于经济增长速度相对较慢而其运输体系较成熟，因此原油价格对 OECD 成员国消耗量的影响比对非 OECD 成员国消费量的影响更加突出。

与非 OECD 国家相比，OECD 国家人均汽车保有量较高，运输行业较成熟且增长较慢，占原油消耗总量的比例较大。经济状况与政策决定运输量，进而影响着 OECD 国家的原油消耗总量。许多 OECD 成员国设置了较高的燃油税，出台了提升新型汽车燃料经济性政策，推广生物燃料使用，即使是在经济强劲增长时期，这些措施也起到减缓原油消耗量增长的作用。此外，在 OECD 国家中，服务行业份额大于制造业的份额，因此，这些国家经济的强劲增长并未对原油消耗量产生如非 OECD 国家那样强烈的影响。OECD 成员国对终端用户价格的补助较少，市场上原油价格的变化通常会快速传递给消费者，原油价格预期值变化还会影响消费者对运输方式选择和车辆购买决策。

（五）库存

库存充当着平衡供需的角色，如在 2008 年末到 2009 年初的经济衰退期，全球原油需求量毫无征兆下跌，导致 OECD 成员国破纪录的增加原油储备。相反，当消耗量超出现有产量时，可以使用库存来补充供给量满足需求。鉴于供应不确定性，石油库存通常被当作一种预防风险的措施。库存量随着未来原油价格相对当前价格的增长而增长，反之则减少。

OECD 国家会定期发布库存统计报告。但其他国家的库存数据有时无法及时得到或者根本无法获得。此外，原油也会存储在海上的油轮里，库存量完整信息的缺乏给原油市场带来了又一不确定性，同样也会影响原油价格变动。

除商业性质库存外，美国和其他国家还有战略石油储备。美国能源部管辖的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现有石油储备数量为 14.29 亿桶，截至 2015 年 3 月，加上商业库存 4.44 亿桶，原油储备和石油产品储备达到 18.73 亿桶，按照最新日均消费 1966 万桶计算，石油

战略储备天数是 95 天，这已经大大超过了常规的 65~70 天的水平。另外，国际能源署所有成员国共持有 37.3 亿桶石油库存以备应急响应。

（六）其他影响因素

2007 年之前，股票、债券和汇率对原油期货价格都有短暂影响。2008 年—2013 年，原油价格与股票呈正相关，2014 年则呈现负相关；2007 年底以来，在多数时间内原油价格与美元价格呈负相关；2008 年—2014 年，原油价格与债券价格多呈不规律负相关。

1. 股票。2008 年—2011 年，标准普尔 500 指数与原油之间呈现正相关的可能原因之一就是经济预期。在过去的十年间，原油的风险和收益特性与股票极为类似。

2. 债券。鉴于债券价格与利率成反比，美国长期债券价格和原油价格在经济发生剧变时沿着相反的方向变化。当投资者们担忧较高风险资产（例如股票和大宗商品）的未来收益时，他们倾向于在其投资组合里加大债券投入。

3. 货币。美元的交换价值与其他货币和原油价格呈反比。美元作为国际原油价格的计价货币，美元对原油价格的影响远远高于其他货币。从统计数据来看，WTI 轻质原油价格与美元指数存在很强的负相关性，2001 年—2014 年月度统计数据显示，WTI 轻质原油价格与美元指数相关系数为负 0.82。

三、原油价格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一）样本选择及数据说明

根据上面的分析，为了进一步验证各个因素对原油价格波动的影响情况并进行实证检验，从经济学的角度，选取国际原油价格、世界原油剩余探明储量、世界原油生产量、世界原油消费量和世界石油地区间贸易量五个变量，分别记为 W、R、P、C 和 M。数据选自 BP 公司《2014 年世界能源统计》，原油价格取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 WTI 价格，时间跨度为 1980 年—2013 年。通过对各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ADF）、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进而分析出选取变量与国际油价之间长短期关系及内在联系。在实证过程中，为消除数据的异方差性，对原始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分别记为 LnW、LnR、LnP、LnC 和 LnM。运用 Eviews6.0 软件进行分析运算。

（二）单位根检验

首先，运用 ADF 检验方法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定各个变量数据的平稳性，为下一步的协整检验和因果关系分析提供必要准备。检验结果如表 1。

表 1 序列的 ADF 检验

变量	差分次数	(C, T, K)	D. W. 值	ADF 值	5%临界值	1%临界值	结论
LnW	0	(C, T, 0)	2.323623	-1.932708	-3.55297	-4.26273	不稳定
LnR	0	(C, T, 0)	1.897366	-2.118404	-3.55297	-4.26273	不稳定
LnP	0	(C, T, 0)	1.397135	0.429025	-2.95402	-3.64634	不稳定
LnC	0	(C, T, 0)	1.222297	-4.560367	-3.55297	-4.26273	I (0) *
LnM	0	(C, T, 0)	1.525409	-4.308314	-3.55297	-4.26273	I (0) *
LnW	1	(C, 0, 1)		-6.162196	-2.95711	-3.65373	I (1) *
LnR	1	(C, 0, 1)	1.957927	-5.521122	-2.95711	-3.65373	I (1) *
LnP	1	(C, T, 1)	2.033100	-5.026538	-3.58062	-4.32397	I (1) *

说明：(C, T, K) 表示 ADF 检验式是否包含常数项、时间趋势项以及滞后期数；* 表示变量差分后在 1% 的显著水平上通过 ADF 平稳性检验。

由表 1 可以看出，原序列 LnW、LnR 和 LnP 的 ADF 检验值大于 1%、5%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所以原序列都为不平稳序列；LnC 和 LnM 的 ADF 检验值小于 1%、5%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所以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原序列都是平稳序列，记为 LnC~I (0)、LnM~I (0)。对 LnW、LnR 和 LnP 原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后，DLnW、DLnR 和 DLnP 的 ADF 检验值均小于 1%、5%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故它们均为平稳序列；LnW、LnR 和 LnP 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分别记为 LnW~I (1)、LnR~I (1)、LnP~I (1)。

(三) 协整检验

通过以上 ADF 单位根检验可以看出，国际原油价格 W、世界原油剩余探明储量 T 和世界原油产量 C 都是一阶单整时间序列，国际原油价格 W 与世界原油剩余探明储量 T 之间，国际原油价格 W 与世界原油产量 P 之间可能存在长期均衡稳定的关系。运用 Johansen 检验法进行协整分析，分析结果如表 2。

表 2 序列协整性检验

协整变量	特征值	迹统计量	5%临界值	原假设	备择假设	结论
nW、LnR 和 LnP	0.410560	30.89204	24.27596	0 个	拒绝	存在协整
	0.334352	13.97739	12.32090	至多 1 个	拒绝	

由表 2 可以看出，对于 LnW、LnR 和 LnP 来说，它们的迹统计量均大于 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故拒绝原假设，三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由于三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所以得出国际原油价格 W 和世界原油剩余探明储量 R、世界原油生产量 P 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即从长期来看，三者存在稳定关系。原油剩余探明储量 R 和原油产量 P 同属原油的供给因素，虽然在短期内，由于受到相关外部因素的影响，这种均衡关系可能会被破坏，但原油价格与原油供给之间的均衡关系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之后又将重新回到均衡状态。它们之间的这种长期稳定关系也恰当地符合经济学原理中的供给与价格之间的关系，原油供给对价格的波动产生影响，而且价格波动对原油供给也产生影响，二者相互作用，并且处于长期均衡稳定状态。

（四）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由以上协整检验得知，LnW、LnR 与 LnP 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故在此基础上可以分析三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检验结果如表 3。

表 3 格兰杰因果检验

滞后期	K = 1		K = 2		结论
	F 统计量	P 值	F 统计量	P 值	
LnR 不是 lnW 的格兰杰原因	6. 56773	0. 0156	4. 46480	0. 0211	拒绝
LnW 不是 lnR 的格兰杰原因	0. 15243	0. 6990	1. 65948	0. 2091	接受
LnP 不是 lnW 的格兰杰原因	8. 65111	0. 0062	4. 70664	0. 0176	拒绝
LnW 不是 lnP 的格兰杰原因	3. 71687	0. 0634	0. 98830	0. 3853	接受
LnR 不是 lnP 的格兰杰原因	28. 6140	9. E - 06	5. 29354	0. 0115	拒绝
LnP 不是 lnR 的格兰杰原因	0. 01652	0. 8986	0. 72060	0. 4956	接受

由表 3 可以看出，在 5%显著性水平下，无论滞后期是一期还是二期，LnR 和 LnP 是 LnW 的格兰杰原因，而 LnW 不是 LnR 和 LnP 的格兰杰原因，这说明 LnR 和 LnP 对 LnW 在一定程度上有解释影响作用，即原油产量和剩余探明储量是原油价格波动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通过计量分析得知原油价格的波动受到原油供给的直接影响；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当产量增加时，原油价格将随之下降，当原油产量减少时，原油价格将随之上涨，但是，原油价格波动并非原油产量增减的一个直接影响因素。这一结论也印证了石油这种商品的特殊性：在石油生产中，要增加新的生产能力，需要花费很长的投产期，所以，在特定时间内，石油供应量是有界限的，无论石油价格如何上涨，石油供应量在短期内是不会增加的。

四、结论及分析

通过对国际原油价格的影响因素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世界的原油价格不仅取决于供求关系，还与库存、战略储备动用情况、期货、股票市场、债券及货币等因素的变动密切相关，其中，供需关系特别是供给因素是油价变化的基本决定因素，它决定了石油价格的基本背景。其次，成本因素不容忽视，目前全球油气上游成本大约为 25 美元左右，绝大部分时间属于低位（如图 10），未来合理的油价平台应该为 50~60 美元，从短中期（1~5 年）看，这一水平可以构成油价的基础支撑，从更长期看，成本和价格将会不断上升，受全球经济增速、美元指数、OPEC 影响力、美国页岩油气等因素影响，本次的油价暴跌跟 1998 年和 2008 年有所不同，不太可能会重现“V”型曲线走势（快速反弹），而可能是一个平缓的“U”曲线，这个“U”曲线的“底”到底有多宽，取决于世界经济复苏快慢、石油行业对低油价的适应性等，可能会持续 3~5 年。第三，在以美元计价的石油核算体系下，美元因素对油价的影响力不容忽视，美元汇率与石油价格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性。另外，当前的石油价格和市场体系存在着市场垄断者利用其地位，操纵或炒作油价的现象，这也是本轮石油出现巨大波动主要的推动力；并且，不确定因素经常引起油价短期波动，如突发战争、自然灾害、事故以及其他突发事件等不确定性因素也会影响油价走势。

通过实证分析可知，国际原油价格与原油产量和原油剩余探明储量存在协整关系，即长期均衡关系，并且原油产量和剩余探明储量是原油价格的格兰杰原因，而原油价格并非原油产量和剩余探明储量的格兰杰原因。可以看出，原油产量和剩余探明储量的增减将直接导致原油价格的涨跌，原油产量和剩余探明储量同为供给因素，是决定原油价格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石油作为一种与社会经济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的重要商品，它的供给及需求曲线在短期内几乎都是无弹性的，即价格弹性接近于零，所以，在短期内价格的涨跌对石油产量的影响较小，也进一步验证了第一部分中关于供需对原油价格影响的判断，因此我们应该在国际原油价格较低时，建立梯级战略石油储备，有效降低石油供应中断风险，确保石油供应安全，摆脱国际原油价格上涨所带来的被动局面。

五、政策建议

（一）落实石油储备应“缓行”

根据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石油储备中长期规划》，2020 年以前，中国将陆续建设国家石油储备第二期、第三期项目，形成相当于 100 天石油净进口量的储备总规模，以进一步

增强中国应对石油中断风险的能力。预计中国 2015 年石油对外依存度将接近 60%，今后可能进一步提高。有关部门应抓住油价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内下行的时机，在推动石油储备能力建设的同时，分阶段缓步扩大原油购买，充实战略储备库存，但切忌短期巨量购买，为后续储存持有造成巨大的成本压力。一是国际油价进入下行周期，原油生产、美元升值、伊朗核谈判取得积极进展等影响因素向好，均没有出现实质性恶化的预期，原油价格处于低位徘徊将是一个长期过程。二是要在深度调整石油产业结构的基础上，精心设计并慎重实施。近年来，全球石油石化产业结构深刻调整，形成了一支以垄断资本为依托的大石油石化公司和以国家资本为后盾的国家控股公司（如埃克森美孚、BP 阿莫科、英荷壳牌、道达尔菲纳埃尔夫四强称雄格局及沙特阿拉伯等国家石油公司）为主体的跨国大石油石化公司群，市场影响力明显增强。而中国的石油企业却面临业绩下滑，资本开支继续收缩的不利局面，此时加强战略石油储备更应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以石油石化产业链发展角度审视增加战略储备时机和供应量问题，有利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不为延迟改革背书。三是合理确定原油和成品油储备比例，国际原油与成品油储备通行做法比例为 60:40，中国距这一比例还有一定距离，需适当扩大成品油储备量，增强应对供应紧张的处置能力。

（二）推进战略石油储备基地建设，减轻经济下行压力，提高应对供应中断的能力

目前，在世界经济整体缓慢复苏，油价持续处在低位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深层次的调整期。根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2015 年国内生产总值 676708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6.9%。全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551590 亿元，比上年名义增长 10.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12.0%，实际增速比上年回落 2.9 个百分点。石油作为一种战略资源，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油价暴跌，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在去年底购买了创纪录数量的原油，但由于存储容量不足，无法充分利用较低的国际原油价格来充实战略储备，达到国际通行的 90 天消费储备量。从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看，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将确定性地提高，进口依存度还将进一步上升，预计到 2020 年将达到 70% 左右，低油价时期应尽量利用国外石油资源，应是石油储备国家战略的重要一环，但当前中国从国际市场购买原油受到了石油储备能力的限制。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陆续推出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自由贸易区群、中巴经济走廊、“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战略举措，创造了消费、投资、进出口等方面的巨大契机，在战略举措为人民币国际化铺平道路的同时，进一步强化能源安全基础设施建设等。有计划地开展石油战略储备基地建设属于国家基础

设施建设的范畴，在实行积极财政政策背景下加大公共投资力度具有一定推动作用。同时，在非常规石油供应日益增长的国际体系中，多渠道拓展石油储备基地发展战略，以指导各种非常规石油资源的选择，并在对环境和气候影响最小的情况下有效满足自身的石油需求，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

（三）重视基础研究，构建原油价格监测预警体系

目前，中国无论政府、还是主要石油企业，尚没有建立完善的原油价格监测预警体系和价格发现研究模型，无法有效支持石油产业有关核心问题决策，对此建议：一是充分搜集、编译、分析世界和中国石油资源的储量、生产、运输、消费、储备以及技术研发等领域的基础数据，为建立石油价格研究影响因素分析模型提供数据支撑；二是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探究相关因素对石油价格影响程度，形成系统化的石油价格预测理论，为国家决策和石油产业长久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参考文献：

1. 马登科、张昕：《国际石油价格决定的四个新特点》，《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4 期。
2. 陈明华、陈蔚：《关于国际石油价格波动原因的深入思考》，《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10 年第 10 期。
3. 缪建营、李治国：《国际原油价格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 年第 5 期。
4. 杨少兰、何晓伟等：《国家物资储备局赴美国能源与矿产资源培训报告》，2011 年。
5. 李治国、杨俊杰、裴辉：《国际原油价格、黄金价格与美元指数的互动关系研究》，《价格理论与实践》2012 年第 1 期。
6. 何晓伟：《能源与金融市场：谁在左右原油价格》，《国际石油经济》2012 年第 12 期。
7. JAMES D: Understanding Crude Oil Prices. NBER Working Paper, 2008.

责任编辑：沈家文、杜振华

2015 年全球金融市场焦点回顾

陈 超

摘要：2015 年，在全球经济整体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美国经济回暖并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由于原油产量持续增长、需求低迷以及美元走强等因素，国际原油价格持续下跌，新兴市场也面临资本大幅流出的危机。其中，中国存款利率上限放开，利率市场化机制进一步完善，而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方式的改革在推动汇率市场化、释放经济活力的同时，也增强了短期内对人民币贬值的预期。在 2015 年中国股市的大起大落中，股价与内在价值的严重偏离、去杠杆的作用、外部市场的动荡等是重要影响因素。欧洲通过进一步延长量化宽松政策以促进投资消费与就业，实现经济发展和通胀目标，而瑞士法郎脱钩欧元和降息则旨在应对欧洲量化宽松政策影响并鼓励资本外流。以上各大市场政策与环境的变化和相互影响共同带来了 2015 年的全球金融市场波动。

关键词：量化宽松 资本外流 市场波动

作者简介：陈超，中国投资公司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后。

与 20 世纪 40 年代的美国和 70 年代的日本相似，目前中国正在经历人口拐点后的重工业化去产能阶段，投资增速和经济增长速度面临着一次系统性下移。2015 年，中国经济正处于增长水平下移的转型期，投资的不断下行伴随的是通缩风险加剧。各国政府也都以各种方式降低利率水平扩大宽松规模，防止债务周期逆转。其中，美国因率先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带来了美国消费、地产和就业领域的正循环，但这种正循环并没有带动全

球产能周期的启动。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也势必会因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而走走停停。其他主要经济体由于经济低迷仍然不会轻易停下量化宽松的脚步。因此，各类金融资产价格在这一过程中将持续享受流动性带来的低风险溢价，并在流动性的逆转中出现大幅度波动和调整，全球大宗商品、外汇和资本市场都随之大幅波动。2015 年，注定是金融市场的“多事之秋”。

一、瑞士央行决定瑞士法郎脱钩欧元

2015 年 1 月 15 日，是全球最大外汇交易福汇（FXCM）最黑暗、紧张的一天。瑞士央行意外取消欧元兑瑞士法郎（以下简称“瑞郎”）1.20 汇率下限，同时下调利率，瑞郎兑一揽子货币暴涨近 20%。现货黄金受到支撑从 1228 美元/盎司上涨至 1248 美元/盎司，并考验 1250 美元/盎司关口。瑞郎在全球外汇市场中处于怎样的地位，使瑞士央行的此举造成了如此大规模的影响？

瑞士法郎长期以来都被投资者视作传统的避险货币，避险货币也叫保值货币。瑞郎与欧元脱钩对全球市场的影响巨大：首先，全球外汇市场产生了巨大的波动。此次瑞士央行取消欧元兑瑞郎 1.20 汇率下限，下调活期存款利率至 -0.75%，并且将三个月瑞郎伦敦同业拆借利率（Libor 利率）的目标区间在负值区域内进一步下移（-1.25%至 -0.25%），此前为 -0.75%至 0.25%，立即生效。消息公布后，黄金变动不大，但是随后的黄金价格走高至日内高位 1248.04 美元/盎司。瑞郎涨逾 20%，结束了瑞士外汇市场持续了三年多的平静局面。其次，全球股市也出现大幅波动。瑞士股市指标股指随后扩大跌幅至 5.2%，创 2014 年 12 月中旬以来最低位。其中，瑞士斯沃琪（SWATCH）、诺华制药和历峰集团（RICHEMONT）股价均下跌超过 5%。欧洲其他主要股指则全线下挫，泛欧绩优 300 指数迅速扩大跌幅至 2.1%。欧洲债市也是风起云涌，德国十年期公债收益率加速下挫，触及纪录低点 0.405%。大宗商品市场，现货黄金大涨近十美元，最高触及 1239.30 美元/盎司；现货白银最高升至 17.03 美元/盎司。瑞士央行出台的政策对欧元和瑞郎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作为全球流通的货币，瑞士央行此番举措旨在鼓励资本外流，但同时自身也面临着为了稳固金融市场可能再度回笼货币。市场预期瑞士央行可能最终意识到了若欧洲央行（ECB）采取量化宽松政策（QE）的风险，本国采取相应货币政策对调控瑞郎汇率的至关重要性。若欧洲央行推出新一轮 QE，则欧元必将重创，美元将飙涨。自 2014 年夏季以来，大量资金流入瑞士，瑞士央行担心此种趋势还将延续，因此采取先发制人措施。

二、高杠杆酿成中国资本市场巨幅震荡

2014年，中国A股的收盘价定格在3234点，2015年1月5日，上证A股高开高走，用3.58%的阳线迎来2015年首个交易日的开门红。随后上证A股在3000点附近震荡，在2月9日探明波段低点后，开启了气势磅礴的连续上涨行情，并于6月12日达到峰值5178点，实现2015年上证指数最大涨幅60.1%，创业板指数更是此轮上涨的急先锋，从年初的1471点上涨到4037点，实现了2015年的最大涨幅176%。沪深两市成交额，从年初的8000余亿元逐渐攀升，于6月中旬达到峰值2.4万亿元，为全球股票交易所之冠。2015年前两季度沪深股市的大牛市，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场外配资和融资融券等杠杆资金的疯狂炒作。融资融券余额从年初的1.03万亿逐渐攀升，于5月20日首度超过两万亿大关，并在6月18日达到峰值2.27万亿元，参与两融交易的投资者数量高峰时达到50万名。当时，两市总市值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点——超71万亿元。但紧接着A股迎来大跌，随后开始盘整震荡，整体仍呈下滑趋势。百日中，沪指从6月12日的最高点5178点跌至10月30日的3382点，其中于8月26日达到最低点2850点，最大跌幅近45%，两市总市值蒸发约30万亿元，其中约经历了16次“千股跌停”；单日交易额从两万亿元缩水至10月30日的9323亿元。不过作为市场人气“标杆”的两融余额，在经过近三个月的配资清理，场内两融余额已呈现几何式缩量，从高峰期的近2.3万亿元降至9月的约9400亿元，降幅高达六成。9月18日，场内融资余额仅为9362.14亿元，创年内新低。其中，沪市融资余额5889.30亿元，自2014年12月5日以来首次降至6000亿元下方。100亿元融资融券余额以上的个股，则从6月18日高峰时的20只降至9月18日的两只。同时，参与两融交易的投资者数量也从高峰时的50万名降至如今的17万名，市场人气低迷。

为稳定证券市场，一方面被称为“平准基金”的证金公司大力扫货，从7月初开始入市，直至8月14日证监会宣布“一般不入市操作”，部分相关股份转让给中央汇金公司，一个月内“国家队”扫入沪深股市中1365家个股，耗资约1.23万亿元，目前浮亏约2100亿元。另一方面，从中信证券到证监会再到私募机构，金融系统掀开一场“打虎记”风暴，从6月20日至9月18日，22名相关人员受处罚或遭调查。A股震荡百日，“暴涨暴跌”已成为常态，为防范市场大幅波动风险，证监会9月6日表态将研究关于资本市场的熔断机制，熔断机制意见征集结束后，2016年1月在A股推出，运行四天暂停。

回顾2015年中国股市的巨幅震荡，主要原因包括：一是部分股票估值过高。创业板有些股票价格与价值严重偏离，股价远高于其内在价值，股价惊人上涨后被公众盲目追

捧加大了下行风险。二是市场的高杠杆。去杠杆造成的下行漩涡引发了股指和股价的技术指标破位，去杠杆和技术指标破位的自我强化过程导致股市进一步下跌。另外，股指期货的高杠杆，T+0（指当天买入的证券或期货在当天就可以卖出），和双向交易性（做多和做空）为股市的上涨和下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三是外围市场的不稳定性。美元加息和升值可能引发新兴市场金融风暴的担忧。美联储 2015 年 12 月加息，这是 2008 年以来第一次加息。美元七年的几乎零利率埋下了下一个新兴市场金融风暴的伏笔。四是内外恶意做空。例如，作为股灾期间救市主力的中信证券，涉嫌在股灾期间联手香港子公司中信国际做空 A 股指数期货。

在本轮市场快速上涨和迅速下跌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在宽松的流动性环境之下，由于实体经济流动性需求低迷和投资者改革预期悲观推动的资本市场泡沫是如何在流动性逆转之后出现快速下跌的，这种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和下跌在目前流动性宽松的大环境下，很有可能在其他领域重演。

三、中国人民银行调整人民币汇率以及中间价报价方式

近年来，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复杂，美国经济逐渐复苏，美元走强，欧元和日元趋弱，一些新兴经济体和大宗商品生产国货币贬值，中国货物贸易继续保持较大顺差，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相对于全球多种货币表现较强，与市场预期出现一定偏离。因此，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市场发展的需要，于 2015 年 8 月 11 日实行了新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方式。

新的中间价报价方式是由做市商在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开盘前，参考前一日银行间外汇市场收盘汇率，综合考虑外汇供求情况以及国际主要货币汇率变化，向位于上海的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提供中间价报价。政策出台后人民币随即下跌，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历史性地连跌三日。人民币贬值首日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比上日出现了接近 2% 的变化，引发全球资本市场巨震，美国股市、欧洲股市 11 日开盘后全线下挫，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大跌 4.2%，创下六年新低。

此次央行改变的重点是中间价定价黑箱。由于中间价和即期汇率持续大幅偏离，中间价的市场权威性和定价合理性长期受到质疑，基本成为央行干预市场走势的工具，而且人民币中间价原来的形成机制类似于黑箱，市场对其具体定价操作并不了解。原来的报价方式是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于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开盘前向所有银行间外汇市场做市商询价，并将全部做市商报价作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的计算样本，去掉最高和最低报价后，将剩余做市商报价加权平均，得到当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权重由中

国外汇交易中心根据报价方在银行间外汇市场的交易量及报价情况等指标综合确定。在这种报价方式下，央行中间价这一重要指标反而成了“非市场化”的典型，这无论对于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改革的推进，还是对于加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都是非常不利的。此次改革中间价报价机制之后，中间价和即期汇率的系统性偏离有望得到纠正，央行黑箱操作的难度增大，属于推进市场化的重要进步。

随着中间价和即期汇率趋于一致，虽然仍有日间波幅的约束，但在目前贬值预期主导市场的情况下，人民币贬值的空间被大大拓宽，短期内即期汇率大幅贬值十分正常。这次中间价的大幅下调是对实际市场汇率点差的“一次性校正”，既反映着市场预期也体现着政府意图，是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的重要一步，有利于一次性消除中间价的政策性扭曲，有利于提升国内市场对人民币汇率的定价权；有利于当时在 SDR 谈判中争取主动；也有利于提高汇率弹性，释放经济活力。虽然此次调整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市场对于发生滚雪球式贬值的恐慌，但随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进一步朝着市场化方向深入迈进，其对国际市场的积极影响将会逐步显现。

四、中国人民银行放开存款利率上限

中国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村镇银行、财务公司等金融机构不再设置存款利率浮动上限。这标志着中国利率管制基本放开，金融市场主体可按照市场化的原则自主协商确定各类金融产品定价。这既有利于促使金融机构加快转变经营模式，提升金融服务水平；也有利于健全市场利率体系，提高资金利用效率，促进直接融资发展和金融市场结构优化；更有利于完善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利率形成机制，发挥利率杠杆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对于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具有重要意义。取消对利率浮动的行政限制后，并不意味着央行不再对利率进行管理，只是利率调控会更加倚重市场化的货币政策工具和传导机制。从这个角度讲，利率市场化改革将进入新阶段，核心是要建立健全与市场相适应的利率形成和调控机制，提高央行调控市场利率的有效性。

一是通过央行利率政策指导体系引导和调控市场利率。借鉴国际经验，中国正在积极构建和完善央行政策利率体系，央行以此引导和调控包括市场基准利率和收益率曲线在内的整个市场利率，以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对于短期利率，人民银行将加强运用短期回购利率和常备借贷便利（SLF）利率，以培育和引导短期市场利率的形成。对于中长期利率，人民银行将发挥再贷款、中期借贷便利（MLF）、抵押补充贷款（PSL）等工具对中长期流动性的调节作用以及中期政策利率的功能，引导和稳定中长期市场利率。

二是各类金融市场以市场基准利率和收益率曲线为基准进行利率定价。货币市场、债券市场等市场利率可以依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ibor）、短期回购利率、国债收益率等来确定，并形成市场收益率曲线。信贷市场可以参考的定价基准包括贷款基准利率（LPR）、Shibor、国债收益率曲线等，在过渡期内央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仍可发挥一定的基准作用。各种金融产品都有其定价基准，在基准利率上加点形成差异化、客户化的利率体系，但万变不离其宗，都围绕市场基准利率变动。

三是进一步理顺利率传导机制。在完善央行政策利率体系、培育市场基准利率的基础上，人民银行将进一步理顺从央行政策利率到各类市场基准利率，从货币市场到债券市场再到信贷市场，进而向其他市场利率乃至实体经济的传导渠道。同时，通过丰富金融市场产品，推动相关价格改革，提升市场化利率传导效率。

五、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

2014 年 10 月 29 日，美联储宣布结束资产购买计划，为六年前开始实施的 QE 画上句号，同时暗示下一步的经济计划是加息，而这意味着一个史无前例的宽松货币“盛宴”的结束。本次 QE 退出的主要原因来自于六个方面：就业情况、家庭支出、商业投资、房地产市场、财政限制、通胀，除财政限制外主要表现为经济数据。

本次 QE 的退出，无论美联储如何小心谨慎，无论退出的时间拉得多长，美国作为全球经济的中心，美元作为全球货币的中心，其未来相对于过去更加偏紧的货币财政政策，必然会给全球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带来负面效应。随着 QE 削减，新兴经济体将面临流动性压力，而其中最脆弱的国家包括印尼、南非、印度等。这些国家有共同的特点，经常项目持续较大的逆差，外汇储备薄弱，因此资金流出对其冲击较大。2013 年 6 月以后 QE 退出预期加强之时，其货币都经历了大幅贬值。

美国退出 QE 对中国的影响既有利也有弊。首先，美国退出 QE 的前提是美国经济逐步复苏、各项经济指标有所回升，而作为全球经济的主导国家，美国经济的复苏则意味着全球经济基本面的好转，中国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之一也必然会得到因市场信心提升而带来的好处。其次，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其购买力的逐步恢复会增加美国的进口量，而随着美国逐渐退出 QE，美元会稳步升值，人民币相对贬值，这二者都会对中国的出口产生推动和促进的作用，出口产业的发展能够带动中国国内产生更多的就业岗位，促进中国经济发展。

尽管美国退出 QE 能为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带来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是美国退出 QE 对各国经济可能造成的冲击也不可小觑。首先，美国退出 QE 意味着利率提升、资金流动

逆转，原本在新兴市场国家投资套利的资金会流回美国等发达国家，这种打击对于一些经济基本面稍差的新兴市场国家而言是巨大的。以印度和巴西为例，在美国释放退出 QE 的信号之初，这两国的经济都产生了明显的下滑，印度卢比贬值 50%，巴西股市跌至四年内的最低位，跌幅达到 22.14%。这些新兴市场国家作为中国的贸易伙伴，不可避免地会通过贸易途径将美国退出 QE 带来的不利影响传导至中国国内。其次，在美国实施零利率政策和 QE 时期，大量的国际游资涌入中国进行投资套利，导致中国房地产业积累了相当多的泡沫，一旦美元升值、联邦基金利率上升，敏感的游资会迅速从中国撤离。这一方面可能会导致国内流动性紧张；另一方面也会造成中国资产泡沫破裂，引起国内资产价格大幅波动。

六、欧洲央行进一步延长量化宽松政策

2015 年 1 月 22 日，欧洲央行正式宣布继续维持欧元区利率在 0.05% 水平的同时，启动每月 600 亿欧元国债和其他债券购买计划，购买计划从 3 月起持续至 2016 年 9 月，购买额度按照各成员国央行在欧洲央行实缴资本的占比在成员国进行分配。这意味着 2016 年 9 月前将有 1.1 万亿欧元的新资金注入欧洲的金融系统，继 2014 年推出的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TLTRO），启动担保债券购买与资产支持证券购买计划后，深陷债务危机的欧洲全面启动 QE。

美联储、日本央行、英国央行买进资产占相应各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25%、64% 和 21%，因此与其他国家的 QE 力度对比，欧洲央行买进占 GDP 5.3% 规模的债券购买量仍较低。欧洲央行此次启动 QE 的初衷是让通胀率达到不高于但接近 2% 的水平。欧洲央行 2015 年 6 月 3 日表示，欧元区通胀预期下降，欧洲经济成长动能有所减弱，债券市场波动将会继续，央行承诺继续实施资产购买计划，直至振兴经济的任务完成。

欧洲央行的 QE 将推动欧元区利率下降，从而鼓励投资和消费，带动欧元区经济发展，解决低就业率问题。欧元区政府公债收益率的降低促使投资者购买更多企业债，使得超过 2/3 欧元计价企业债的收益率已经降至 1% 以下，这大大刺激了企业债的发行，从而促进了企业的发展。而由此带来的通货膨胀预期也可以实现鼓励消费的结果。欧洲 QE 的推出导致欧元等非美货币汇率的大幅下跌和美元汇率的上涨。欧元贬值有利于拉升欧元区的出口，同时进口价格上升也会为其带来输入性通货膨胀。此外，欧元区国家的股市则出现了向好的行情。

此次 QE 涉及包括处于危机中的希腊在内的 19 个成员国，风险由各成员国共同分担。由于欧洲央行购买债券份额以各国实缴资本为准，而希腊、葡萄牙等南欧国家出资比例

较小，因此其 QE 并不能有效地将资金分配到购买风险较高国家的债券上，在降低债券收益率效果上会明显弱于美国的 QE。此外，此次 QE 可能会减弱一些低评级成员国进行改革的动力和决心。QE 只能暂时应对欧元区经济发展迟缓问题，根本的解决方案仍在于各国政府采取的经济结构性改革措施，如让劳工制度更有弹性和鼓励商业投资。除了受到内部推出的 QE 影响，欧元区经济表现还将与外部国家的表现密切相关，尤其是一些新兴国家。比如中国经济的放缓也对欧洲大宗商品的出口造成了不利影响。

市场普遍认为欧洲央行此次推出 QE 已晚于最佳时机。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欧元区经历了欧债危机以及经济的停滞，然而由于欧元区各国的情况各异，各国意见的协调和统一是一个复杂又漫长的过程。比如对评级较高的德国来说，QE 意味着更多的货币，更多的市场波动，因此其一直是欧元区 QE 的一大反对者。这次 QE 的实施也是各国在综合考虑长期利益基础上达成的共识。

七、新兴市场面临资本大幅流出的危机

新兴市场被降级的风险升至金融危机以来最高。饱受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全球需求减弱等压力的新兴市场如今再度面临新的压力，许多国家被评级机构惠誉列入有信用降级风险的名单之中。根据惠誉的名单显示，巴西和南非高居榜首，因为经济增长放缓以及财政赤字高企。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加之巴西经济停滞，致使拉丁美洲国家的信用评级全面承压。此外，南非经济的主要威胁来自长期经济增长放缓以及政府财务状况恶化。美联储若加息，新兴市场将面临资本外流压力。惠誉认为，新兴市场国家基本面将面临时间更长、力度更大的挑战。市场数据显示，2015 年以来投资于新兴市场的美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资本已净流出 58 亿美元。

新兴市场货币兑美元汇率大幅下降，抑制了进口需求，压低了总需求。以 2015 年 6 月为例，新兴市场的进口同比降低 13.2%。随着投资者对预期的美联储加息感到担忧，新兴市场资本流出可能会提速。新兴市场引发全球衰退的可能性也在上升。美联储加息第一阶段会伤害新兴市场经济增长，第二阶段的溢出效应会反过来干扰发达国家。

八、国际原油价格持续下跌

2015 年初，国际原油价格延续了 2014 年 6 月以来的跌势，1 月伊始油价跌破 50 美元/桶大关，相比较 2014 年高点呈现出腰斩态势。一季度原油价格始终维持在低位徘徊，进入第二季度，油价开始了小幅反弹过程，3 月 20 日，在当周国际油价出现反弹态势后，连续数周，油价不断刷新年内新高。然而这一轮短期上涨大约在 5 月初走向终结，当油价

达到 60 美元/桶的价格之后，价格上涨驱动因素的作用效力明显减弱，在 60 美元/桶的相对高点震荡了近两月后，7 月初油价仍是抵不住下行压力一路下跌至 37.75 美元/桶的年内最低价格，随后油价保持在 40 美元/桶~50 美元/桶的低位震荡。国际原油价格走弱，从长期来看也是有迹可循。

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产量配额名存实亡。2015 年 4 月初，自伊朗与六国就核问题达成框架协议以来，沙特、阿联酋和伊拉克原油日产量不断刷新纪录，OPEC 连续四个月超出每日 3000 万桶的配额。而非 OPEC 国家出于保障本国经济发展及抢占国际市场份额的考虑，虽经历了 2014 年下半年国际油价的断崖式下跌，原油生产仍是不减反增。2015 年年初以来，俄罗斯国内原油日产量始终稳定在每日 1000 万桶以上；美国的页岩油革命带来其本土原油产出格局的巨大变动，原油日产量维持在月度日均 900 万桶以上，而通过技术变革和效率提升，美国国内页岩油生产商在未来也将迎来更大的机遇，这也将使国际原油价格面对更大的下行压力。

世界经济总体复苏乏力阻碍石油需求上升。2014 年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强劲使得美联储结束了长达六年的 QE，进入 2015 年第二季度，美国非农就业数据持续走好，重塑实体经济效果明显，经济有迹象进入新一轮启动周期，但美国这一单一经济体的增长并不能改变全球范围内经济低迷的事实。“克里米亚事件”让本就脆弱的欧洲经济雪上加霜，对欧盟和俄罗斯经济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2014 年某种程度上由欧俄双边贸易下降带来的经济萧条，在 2015 年也并未出现明显向好的迹象。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也正承受着由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带来经济增长放缓的事实，2015 年房地产整体所呈现出来的低迷现状和制造业淘汰落后产能的变革都带来了原油需求的冲击，从而进一步影响了世界原油价格。

金融市场波动阻碍了国际油价上涨。一方面，退出 QE 所带来加息预期使美元进入强周期，而原油作为以美元计价交易的重要大宗商品，其价格也受到了随之而来的利空冲击影响；另一方面，黄金价格下跌将助推美元指数持续上涨，从而对原油价格形成进一步打压。

责任编辑：李蕊、杜振华

中国对美国证券投资现状及外汇储备投资策略的调整*

徐长春

摘要：从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看，中国对美国证券投资主要集中在国债领域，占中国对美国证券投资的近 60%；其中，中国对美国国债投资又集中在长期名义国债，占同期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的 88%。总体看，以前中国对美国证券投资属于风险厌恶型的投资者，致力于通过证券投资实现资产保值。鉴于美国国债利率长期下行趋势已经确立，中国外汇储备投资应遵循多样化原则，以资产保值更要增值为目标，支持国家新时期“一带一路”战略，调整现有外储区域和领域布局，更多投资全球优质资产。

关键词：美国 证券投资 外汇储备 美国国债

作者简介：徐长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

国际金融危机之前，随着全球市场化改革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世界范围内逐步形成了欧美消费、以中国大陆为核心的东亚地区生产、广大发展中国家供应能源资源的大三角经济循环格局。由于这个大三角的自稳定调节作用，全球范围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资源倾向于对称配置，中国贸易顺差所得资金流向美国就成为国际资本流动的必然。

*本文为 2014—2015 年度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基金课题《中美经贸关系中长期前景与对策研究》部分成果。

携着这种跨境资本流动的惯性，国际金融危机前后，中国对美国债券投资达到了高峰，并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治理而出现了新的变化趋势。

一、中国对美国证券投资现状及趋势

证券投资是一种技术含量极高的间接投资方式。所谓证券投资（investment in securities）是指投资者（法人或自然人）买卖股票、债券、基金券等有偿证券及其衍生品，以获取价差、利息及资本利得的投资行为，是间接投资的重要形式。随着外汇储备规模的日益增加，中国把对美国证券投资作为一个重要选项。目前，中国对美国证券投资已经形成一定规模。

（一）中国对美国证券投资的现状^①

经检索，美国财政部定期公布各国对美国证券投资概况基础数据，包括来自不同国别的投资数据。这些对美国的证券投资数据，既包括各国央行的投资，也包括各国金融机构、企业与居民的投资。

1. 当前中国持有美国证券的整体结构状况。根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统计资料，如图 1 所示，截至 2015 年 4 月底，中国持有美国证券的种类包括国债、股票、机构债、公司债等长债，也包括一定规模的短债，几乎囊括了美国所有证券品种；各种证券投资标的总规模为 1816923 百万美元。其中，中国对美国国债投资的规模最大，达到 1260657 百万美元，占中国对美国证券投资总规模的 69%；排在投资规模第二位的是股票，达到 319668 百万美元，约占中国对美国证券投资总规模的 18%；排在投资规模第三位的是机构债，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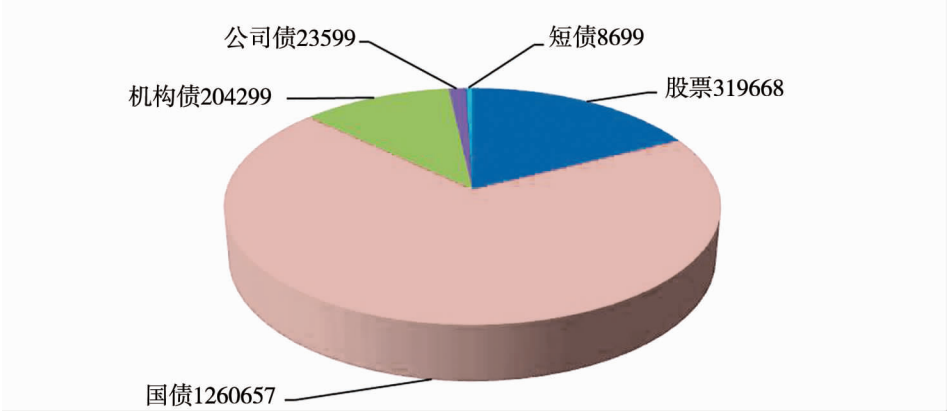


图 1 中国持有美国债券的总体结构（单位：百万美元）

数据来源：美国财政部，截至 2015 年 4 月 30 日。

^①因国内资料缺乏，本文所涉及的证券分类及种类皆参照美国财政部公布资料的标准。

到 204299 百万美元，约占中国对美国证券投资总规模的 11%；剩下的投资品种分别为公司债和短债两类，规模分别为 23599 百万美元和 8699 百万美元，分别占到中国对美国投资总规模的 1%左右。

可见，从总规模来看，中国对美国证券投资的首选品种，也是最受青睐的品种，是风险较小、收益较大的美国国债；其次就是因流动性较好而避险性较高的股票；对资产证券化的机构债和公司债投资规模较小。因此，中国在对美国证券投资方面是风险厌恶型的投资者，对美国证券投资的主要目的是资产保值。

2. 当前中国持有美国长债的结构。根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统计资料，如图 2 所示，截至 2015 年 4 月底，中国持有美国长债的种类包括国债、股票、机构债、公司债四种，总规模达到 1808223 百万美元。其中，国债是中国对美国投资长期债券的最主要品种，排在对美国长债投资的第一位，规模达到 1260657 百万美元，占到中国对美国长债投资总规模的 70%左右；排在中国对美国长债投资的第二位的是股票，规模达到 319668 百万美元，占到中国对美国长债投资总规模的 18%左右；排在中国对美国长债投资第三位的投资品种是机构债，规模达到 204299 百万美元，占到中国对美国长债投资总规模的 11%左右；排在中国对美长债投资规模第四位的是公司债，规模达到 23599 百万美元，占到中国对美国长债投资总规模的 1%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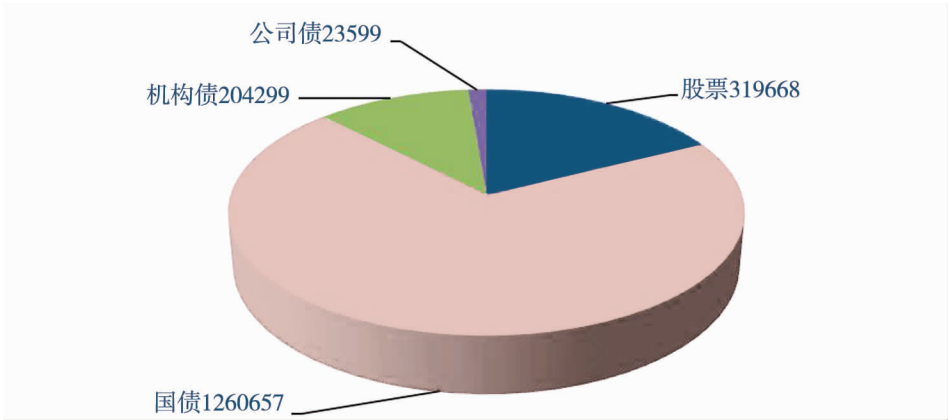


图 2 中国持有美国长债的结构 (单位: 百万美元)

数据来源：美国财政部，截至 2015 年 4 月 30 日。

总体来看，在中国持有的美国长期债券中，国债还是最受青睐的投资品种，因为其有国家信用担保而风险相对较小且收益率相对较高；股票因流动性较好而位居中国对美长期债券品种投资规模的第二位；机构因信用度较高而使得机构债在中国对美长期债券投资中占据第三的位置。由此进一步印证了一个结论：中国以往对美国证券投资更加看

重其规避投资风险的功能，目标更侧重于保值而非增值，是风险厌恶型投资者。

3. 当前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的结构。根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统计资料，如图 3 所示，截至 2015 年 4 月底，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的种类包括长期名义国债、通货膨胀保值国债（TIPS 国债）和短期国债三种。长期名义国债是指各种以不同形式标明利率的国债证券，也就是普通国债。截至 2015 年 4 月底，中国持有长期名义国债的规模达到 1117243 百万美元，占同期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的 88%，是中国持有最多的美国国债；中国持有第二多的美国国债是 TIPS 国债，规模达到 143413 百万美元，占同期中国持有美国国债总规模的 11%；除此之外，中国还持有少量美国短期国债，规模为 7999 百万美元，占同期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的 1%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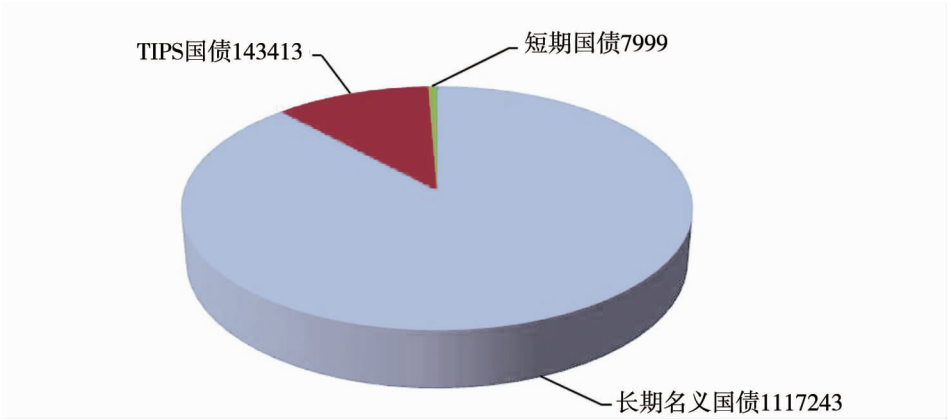


图 3 中国投资者持有美国国债的结构（单位：百万美元）

数据来源：美国财政部，截至 2015 年 4 月 30 日。

总之，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的品种以特定利率债券为主，以通胀保值国债为辅，辅之于极少量的美国短期国债。由此可见，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多具有收益率固定且高的特点，投资主要目标的保值色彩浓烈。

4. 当前中国持有美国股票的结构。根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统计资料，如图 4 所示，截至 2015 年 4 月底，中国持有美国股票的种类主要包括普通股票、基金、优先股和其他类型的一些股票。截至 2015 年 4 月底，中国持有美国股票总规模达到 319668 百万美元。其中，普通股票的规模最大，达到 252607 百万美元，占中国所持股票总额的 79%；其次是优先股和其他类型的股票，规模达到 48872 百万美元，占中国所持股票总额的 15%；另外，中国同期还持有美国基金类股票 18190 百万美元，占中国所持股票总额的 6%左右。

总之，中国持有美国股票的品种以流动性强的普通股票为主，以优先股等为辅，辅之于少量美国基金类股票。可见，中国持有的美国股票也具有流动性强的特点，投资目标以保值为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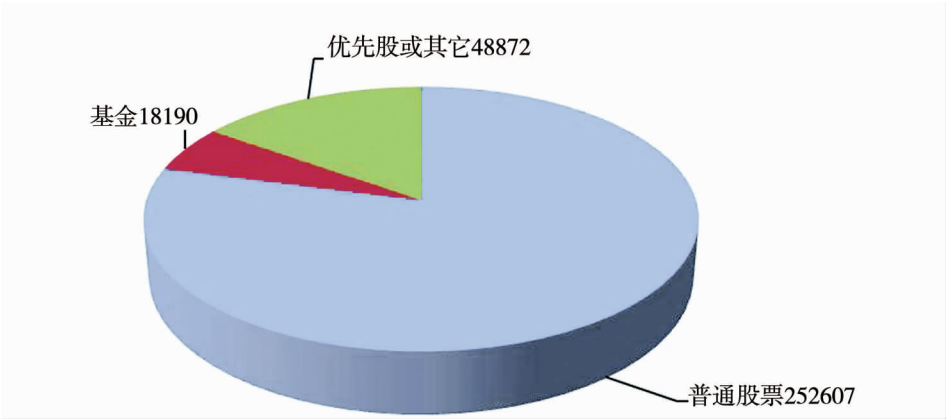


图 4 中国持有美国股票的结构 (单位: 百万美元)

数据来源: 美国财政部, 截至 2015 年 4 月 30 日。

5. 当前中国持有美国资产抵押债券的结构。根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统计资料, 如图 5 所示, 截至 2015 年 4 月底, 中国持有美国资产抵押债券的种类主要有机构抵押支持债券 (ABS)、公司抵押支持债券 (MBS)、非公司抵押支持债券 (NonMBS) 三类。ABS 是以资产的组合作为抵押担保而发行的债券, 是以特定资产池 (Asset Pool) 所产生的可预期的稳定现金流为支撑, 在资本市场上发行的债券工具, 这种债券在欧美很普遍。截至 2015 年 4 月底, 中国持有美国资产抵押债券总规模达到 196067 百万美元, 其中, 所持有的 ABS 规模最大, 达到 188495 百万美元, 占中国持有资产抵押债券的 96%; 另外还持有 MBS 和 NonMBS 分别为 3749 百万美元、3823 百万美元, 分别占中国持有资产抵押债券的 2% 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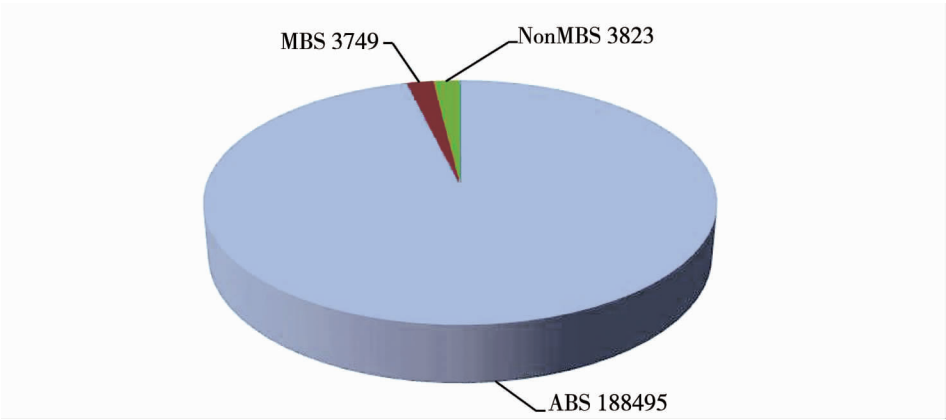


图 5 中国持有美国资产抵押债券的结构 (单位: 百万美元)

数据来源: 美国财政部, 截至 2015 年 4 月 30 日。

总体来看, 中国持有美国资产抵押债券的品种偏重于 ABS, MBS 和 NonMBS 仅是辅

助产品，数量极少。在持有美国资产抵押债券方面，中国以保值为主要的投资意图也十分明显。

6. 当前中国持有美国短债的结构。根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统计资料，如图 6 所示，截至 2015 年 4 月底，中国持有美国短期债券的种类主要有国债、机构债、公司债和商业票据四类。截至 2015 年 4 月底，中国持有美国短期国债规模为 7999 百万美元，占中国持有美国短债的 92%；中国持有美国短期机构债的规模为 673 百万美元，占中国持有美国短债的 8%；中国持有美国短期公司债的规模为 28 百万美元，占中国持有美国短债的 1%；中国持有美国商业票据一百万美元，在中国所持所有美国短债总额中的比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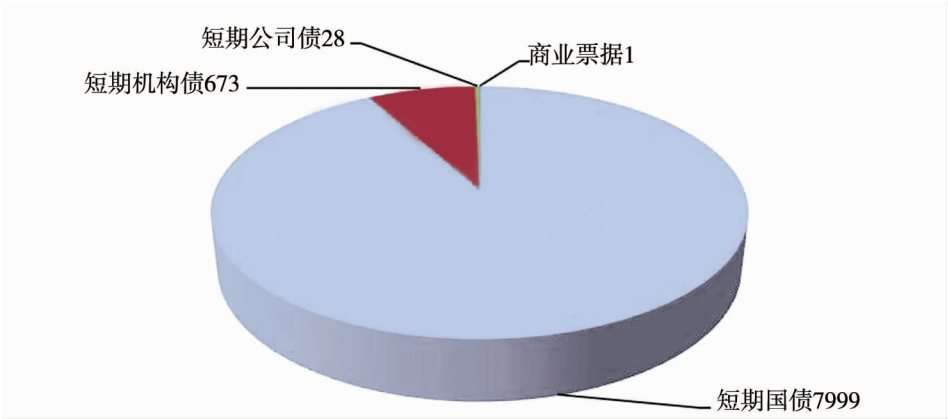


图 6 中国持有美国短债的结构 (单位: 百万美元)

数据来源：美国财政部，截至 2015 年 4 月 30 日。

总体来看，中国持有美国短期债券的品种偏重于美国短期国债，辅之于美国短期机构债，美国短期公司债和美国商业票据的规模数量极少。从持有美国短期债券的角度看，中国对美国短债投资以规避风险为主，力争保值的投资意图十分明显。

(二) 中国对美国证券投资的发展趋势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对美国证券投资经历了一个快速增长期，然后进入了一个相对缓慢的平台发展期。其中，部分种类投资规模增长，另外部分种类投资规模则呈现波动性变化。

1. 中国对美国长期债券投资规模呈现微幅上涨，总体趋稳态势。根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统计资料，如图 7 所示，从 2007 年 4 月至 2014 年 4 月，中国对美国的长期国债投资从 2007 年 4 月的 8700 亿美元一路飙升到 2011 年 4 月的 15630 亿美元，呈现快速攀升态势。2012 年，中国对美国长债投资规模出现了大幅下滑，仅有 13630 亿美元的规模，

较上年下降了 2000 亿美元。随后两年，中国对美国长债投资规模增长态势锐减，出现长债规模增长幅度逐年下降态势，总体呈现高位小幅震荡趋稳的态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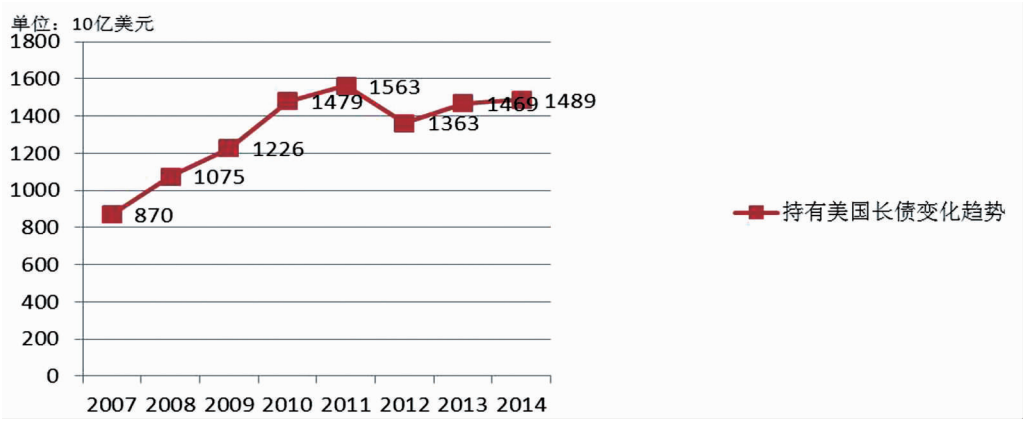


图 7 2007 年—2014 年中国持有美国长债规模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美国财政部。

纵观这八年的发展趋势，我们发现，在经历了 2011 年之前的飙升之后，近期中国对美国长期债券的投资规模总体呈现微幅上涨、高位小幅震荡趋稳的态势。

2. 中国对美国短期债券投资规模总体呈现低位徘徊态势。根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统计资料，如图 8 所示，从 2007 年 4 月至 2014 年 4 月，中国持有美国短期债券的规模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呈现快速增长态势，一度达到巅峰的 1600 亿美元，随后就急速衰减到 2010 年及其以后的不足 100 亿美元的规模，并且一直维持着低位徘徊的态势，直到今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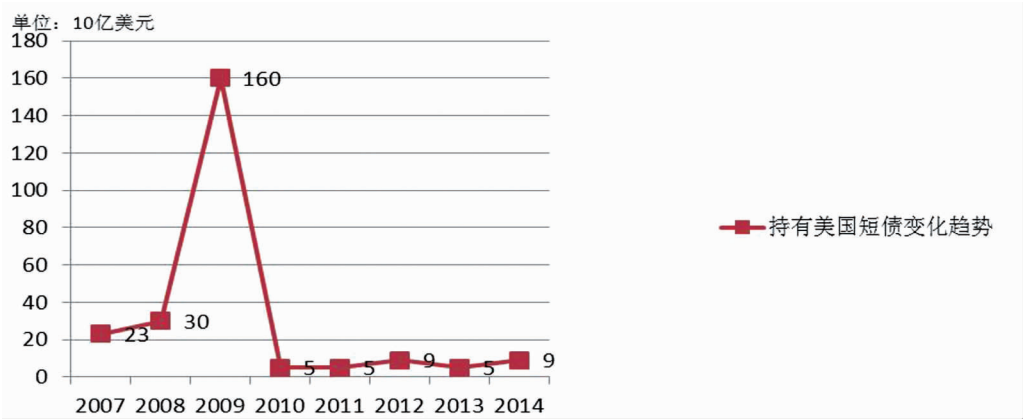


图 8 2007 年—2014 年中国持有美国短债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美国财政部。

从图 8 来看，面向未来，如果没有大的事件刺激，我们短期内很难看到中国对美国短债投资快速攀升的局面，更可能一直维持这种低位徘徊的格局。

3. 中国对美国股票投资规模总体呈现快速攀升态势。根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统计资料，如图 9 所示，从 2007 年至 2014 年 4 月底，中国持有美国股票的规模一开始就呈现快速攀升的态势，但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影响，2009 年出现了明显下挫，由 2008 年的 1000 亿美元下降到 2009 年的 780 亿美元。随后，虽然一直笼罩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梦魇下，中国对美国股票投资态势依然保持了越来越强的快速攀升态势。中国持有美国股票的规模由 2009 年 780 亿美元持续上升到 2013 年的 2610 亿美元，最终 2014 年跃升到 3200 亿美元，平均每年的同比增长率在 20% 左右，增长势头不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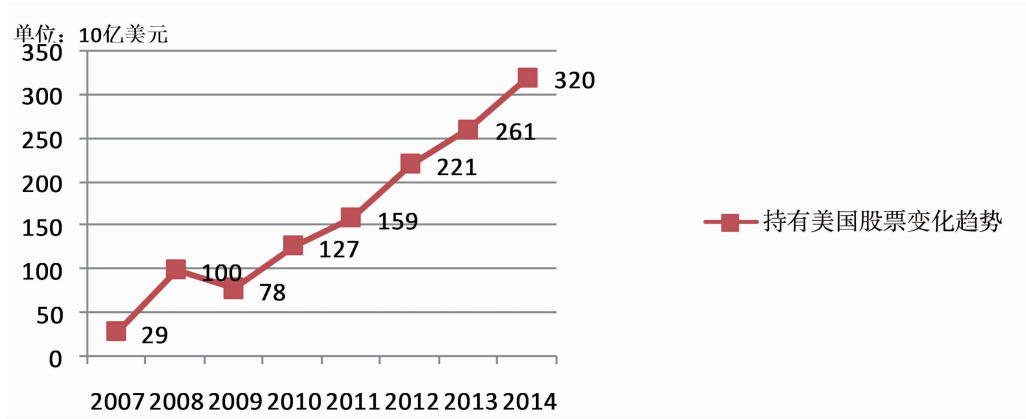


图 9 2007 年—2014 年中国持有美国股票规模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美国财政部。

面向未来，中国对美国股票投资规模有望继续保持攀升态势。从图 9 的走势看，中国对美股票投资规模依然处在进一步放大的态势之中，未来还有望保持这种发展态势。

4. 中国对美国证券投资的总规模呈现快速攀升态势。根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统计资料，如图 10 所示，从 2007 年至 2014 年 4 月底，除个别年份之外，中国持有美国证券的规模不断攀升。由 2007 年的 9220 亿美元，持续攀升到 2011 年的 17270 亿美元，2013 年和 2014 年分别达到 17350 亿美元和 1817 亿美元，前期年同比增速最高达到 20%，后期在 10% 左右，呈现增幅下降趋势。当然，2012 年是个例外，中国持有美国证券的规模不增反降，降幅达到 8%。但这并不影响中国对美国证券投资总体规模上升的态势。

总体来看，中国对美国不同种类的证券投资规模发展趋势各有差异，有的呈现出进入平台期的迹象，有的呈现快速增长态势，但近期中国对美国证券总体投资规模的增幅在不断降低，出现了进入平台期的迹象，呈现出增速减缓条件下的微幅增长态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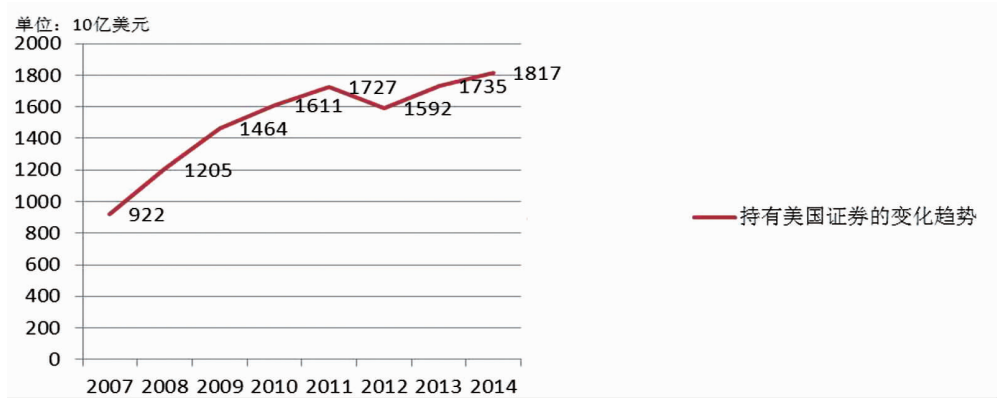


图 10 2007 年—2014 年中国持有美国证券规模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美国财政部。

二、美国国债风险变化趋势

作为一个投资选择，美国国债（U. S. Treasury Securities）因有美元世界货币地位的护卫无疑是全球最具有诱惑力的投资品种之一。但是，投资是真金白银的投入，涉及切身利益，需要具体问题具体慎重分析。如同对任何其他投资品种的研究一样，对美国国债的投资也要研究其利率的走势以及造成这种走势的深层次原因，然后选择针对性强的投资策略。

（一）美国国债利率的实际走势

作为一个投资品种，美国国债是需求学派进入政府决策视野的结果。在凯恩斯以前，经济学家几乎全部反对赤字财政，世界各国政府也主要信奉预算平衡理念。1936 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其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提出，政府应通过增加政府支出、减少税收的方法去刺激总需求，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应对经济衰退。在大萧条的大背景下，这首先开了需求学派的先河，给处于困境中的政府找到了处理危机的药方，纷纷采用这种理念治理经济。由于政府支出来源于税收，这种政策导致财政赤字和国债的产生。此后，美国历届政府都以各种理由通过发行国债融资刺激经济增长和就业，导致美国国债规模不断上升，国债市场不断扩容。甚至政府一度因赤字过高而无法在国会通过政府财政预算案而关门。目前，美国国债债券品种期限从三个月到 30 年不等，品种丰富，各期限债券分布也较为合理，其收益率曲线也是成熟债券市场的代表，国债的持有者也已经囊括了国内持有者和国际持有者。美国国债市场实际已经成了一个国际市场。经过了漫长岁月的发展完善，美国国债概念被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所接受，国债利率也经历了多个收缩和扩张的周期性变化，总体呈现三大变化趋势。

第一，从长期看，美国国债利率总体呈现逐步下降趋势。总体来看，如图 11、图 12 所示，美国两年期国债和十年期国债的利率整体是处于下降通道，国债利率由 1990 年的 9% 一路下降到 2015 年的不足 2%。首先，美国长期国债利率呈现阶梯式震荡下行趋势。如图 11 所示，1990 年—2001 年，美国十年期利率大体围绕 6.5% 的中间线上下波动；2001 年—2008 年，开始围绕 4% 的中间线波动。如图 12 所示，2009 年之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美国十年期国债的利率又开始围绕 2% 的中间线波动。总体来讲，美国十年期长期国债利率整体呈现阶梯式震荡下行态势。美国长期国债利率曲线基本上就是美国金融市场的基准收益率曲线，其走势与美元长期信用软实力流失的大趋势基本吻合。其次，美国短期国债利率总体以低于同期长期国债利率的方式呈现波浪式下降态势。如图 11 所示，从 1990 年至今，美国两年期国债利率都不高于同期美国长期国债的利率；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美国两年期国债的利率是以波浪式降低的方式一直在加速赶底，利率由最高的近 9% 一路下降到 2009 年的不足 1%；如图 12 所示，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以两年期为代表的短期国债利率就以 0.5% 为中间线不规则波动，但一直没有摆脱低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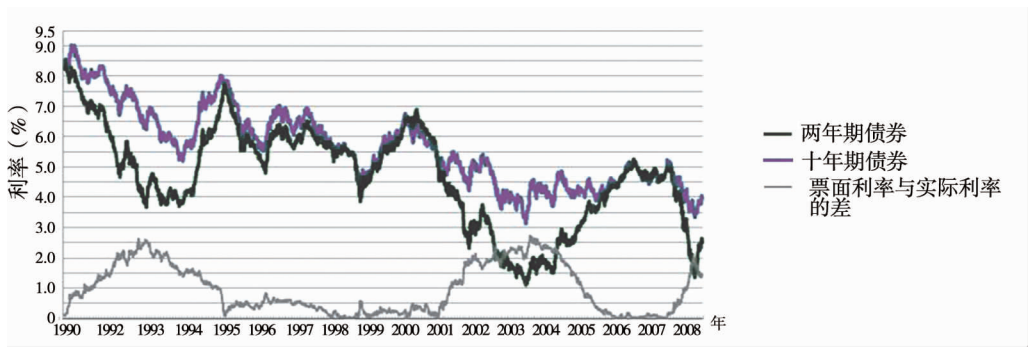


图 11 1990 年—2008 年美国国债利率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美国财政部。



图 12 2006 年—2015 年美国国债利率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美国财政部，截至 2015 年 6 月初。

第二，美国长期国债利率与短期国债利率之差（可视为票面利率与实际利率之差）与美国经济的周期性繁荣和复苏呈一定相关性，由小变大则往往预示着美国经济将走向复苏。根据美国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美国经济呈现约每五年为一个周期的变化，每个周期分为收缩期、扩张期；如图 11、图 12 所示，一般情况下，美国长期国债利率与短期国债利率之差与美国经济周期有明显的相关性。这个差在美国经济扩张后期变为最小；美国经济迈入经济收缩期和扩张期的初期时，这个差又开始扩大；当美国经济扩张到中期时，这个差达到最大，随后逐渐缩小；当美国经济进入扩张后期时，这个差将再次降到最低。也就是说，美国长期国债利率与短期国债利率之差逐步扩大，意味着美国经济即将进入复苏和繁荣阶段；美国长期国债利率与短期国债利率之差日益缩小，意味着美国经济即将进入衰退和萧条阶段。

（二）美国国债利率走势的成因

美国国债利率之所以呈现这样的变化趋势是市场主体博弈的综合结果，根本反映了市场主体对美国经济的预期，是美国长期和短期国债投资者“用脚投票”的结果。

第一，美国国债利率整体波浪式走低是美国经济实力总体发展趋势的结果，也是投资者对这趋势预期的反映。美国国债利率是美国经济财富生产能力的产物，也是市场供求的产物。其变化直接反映了美国债券的国际供需状况，间接反映了美国经济的财富生产能力。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参与美国债券交易的主体遍及全世界，而且以非美国主体为主。当市场主体看好国债融资收益即看好美国经济时，购买需求量就会大，世界各地的资金就会流入美国争相买入美国债券，美国债券利率就会上升，反之亦然。美国国债利率的变化也间接反映了全球投资者对美国经济财富生产能力发展前景的判断。二战之后，美国凭借超强的经济实力一跃而成为世界上实力最强的国家；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更是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外投资者普遍看好美国经济财富生产能力，不担心美国还不起国债，争相购买美国国债，搭美国经济的顺风车。因而美国国债的利率持续攀升，在冷战结束时达到顶峰的 9% 左右。冷战之后，世界经济进一步一体化和全球化，美国经济的竞争力相对弱化，世界格局的变化正在改变美国的绝对优势地位。经过近 30 年的发展，各国力量对比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就经济力量方面来讲，如图 13 所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按照购买力平价进行的统计，近 24 年间，在全球美、英、法、德、俄、日、中等主要国家中，各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占世界 GDP 总额的比重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除中国之外的其他主要国家都在缓慢地降低，只有中国所占比重在快速增高，并在 2013 年超过了美国，成为占

世界 GDP 比重最大的国家。但必须说明的是，按照现价名义 GDP 统计的话，2014 年中国 GDP 只占世界的 13.7%，美国占世界的 22.9%，日本占世界的 6.3%，中国还远没有超过美国。客观地讲，后者更为可靠一些。但尽管如此，中国 GDP 占世界的比重正在赶超美国，越来越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是个不争的事实。这就意味着，美国之外的高回报投资机会也越来越多。这导致美国国内的投资者越来越多地选择在美国之外的投资机会；国际投资者由于在美国之外的投资增加，也就相对减少了对美国国债的投资。随着国际格局扁平化的进一步发展，这种趋势还将延续甚至加剧。所以，在投资机会分散化的背景下，对美国国债的投资金额就呈现下降趋势，而高回报率的投资机会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均衡化，美国生产的可供各经济体分享的经济剩余总额变少，也就形成了美国国债利率递减的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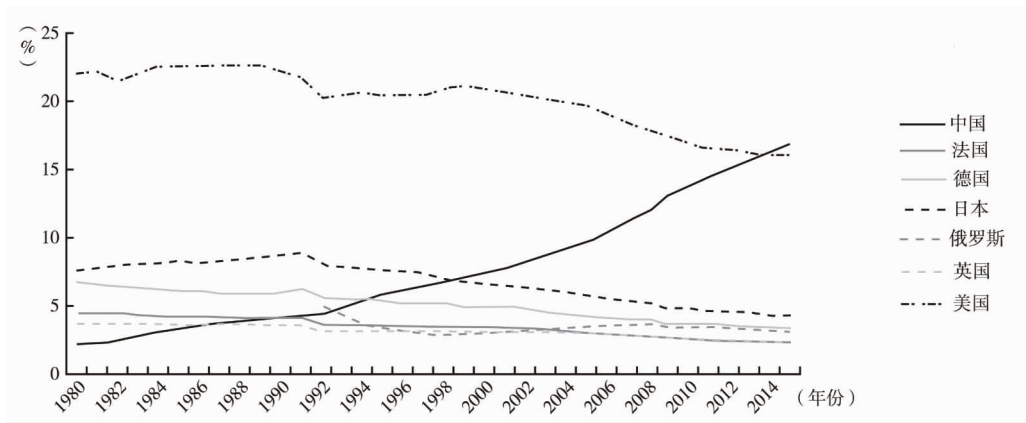


图 13 1980 年—2014 年主要国家 GDP 占世界总额比重的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IMF 数据库。
注：2011 年之后数据为评估数据。

第二，美国长期国债利率与短期国债利率之差日益扩大与美国经济周期性繁荣和复苏的正相关性，主要是投资者对长期国债和短期国债资金重新配置的结果。美国经济发展主要是以市场为基础进行资源配置。在美国长期国债和短期国债利率长期走低的大趋势下，当由创新驱动的经济繁荣接近尾声时，国际投资者对美国经济信心不足，欲走还留，在观望中避险的需求增加，对短期国债的需求增加，以便随时变现出逃，从实体经济中流出的资金和变卖长期债券的资金加大了对短期国债的购买规模。这导致美国短期国债利率下行相对较慢、长期国债利率下行较快，进一步导致长期国债与短期国债利率差变小。当美国经济新一轮经济繁荣开始时，投资者看好美国经济，放心分享美国经济发展成果，资金配置正好相反，购买美国长期国债的规模加大，购买美国短期国债的规模减小，这个利差也就变大。所以，投资者对美国经济不同发展阶段风险的判断以及由

此引发的资金再配置，是导致长期国债与短期国债利率差趋势性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投资者“用脚投票”的结果。这个差的扩大往往预示着美国经济将进入下一轮的经济增长长期；缩小则预示着美国经济将进入衰退期。长期国债利率与短期国债利率或美国国债票面利率与实际利率之差也就成为观察美国经济走势的一个风向标型指标。

（三）美国国债利率未来走势判断

第一，就长期趋势来看，美国国债利率继续下降将成为不得不面对的客观现实。美国国债利率变化反映的是美国经济在国际格局中相对优势的变化。当前，美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力和影响力越来越弱，正在被更具活力的金砖国家所取代。2014 年，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超过发达国家，金砖国家也从美国手中接过领跑的接力棒。中印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跃居全球第一和第三位。实际上，自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越来越小。由于短视，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IMF 和世界贸易组织（WTO）正在远离初衷，越来越难以发挥控制其他国家的作用。与之相反，“金砖国家”新成立的新开发银行，以及在中国大力推动下正式设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见图 14）都引发了国际社会甚至发达经济体的高度关注和热烈响应。英法德等发达经济体撇开美日的阻挠先后加入亚投行的事实说明，美国试图借助二战继承的全球同盟体系推动西方发达国家联手制衡新兴大国的努力，在经济利益面前更多地表现为在口头上做个姿态。美国力不从心的最大问题就在于无法提出引领全球增长的创新方案，冷战思维只会加速自己的衰落。随着国际多极化局势的进一步加深，美国经济和社会影响力会进一步削弱，特别是在政府关门事件一再发生之后，世界各国投资者普遍担心美国政府是否能够还得起国家债务，不会把投资美国国债作为牟利的手段，而会把更多的资金投入世界更具活力的经济体去谋取更大利益。所以，由于源头之水的递减成为必然，美国国债的收益率进一步降低将成为必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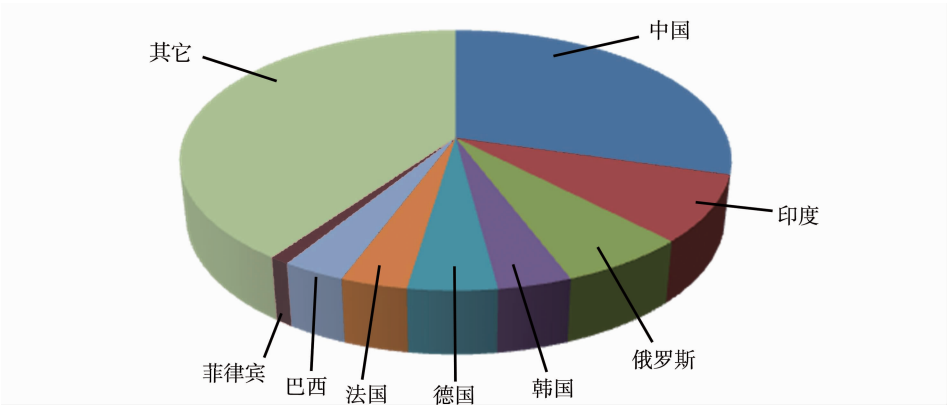


图 14 亚投行 1000 亿美元注册资本金各国出资比例

第二，短期来看，美国国债利率可能因美国经济回暖而出现短期回调，但不会改变长期趋势。据美国商务部 2015 年 10 月 29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性调整，美国三季度 GDP 初值年化季率增速由二季度的 3.9% 放缓至 1.5%，略低于预期的 1.6%。但是，三季度商业库存增加 568 亿美元，低于二季度的 1135 亿美元。三季度出口增速从二季度的 5.1% 放缓至 1.9%，进口增速从二季度的 3.0% 放缓至 1.8%。三季度消费者支出年化季率由二季度的 3.6% 放缓至 3.2%。三季度政府支出由二季度的 2.6% 放缓至 1.7%。这一切表明，虽然美国经济在三季度表现最差，但复苏势头已经显现。然而美国三季度进出口和消费增速的下滑，意味着美国经济复苏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复苏的基础还不牢固。另外，从美国长期国债利率与短期国债利率之差这个指标看，在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之后，如图 15 所示，该指标出现了向上的趋势。这意味着美国经济总体正处在复苏的前夜，市场对资金的需求面临增加的局面，美国国债利率可能因美国经济回暖而出现短期回调。所以，随着美国经济复苏势头的加大，特别是美联储加息政策的出台，美国国债利率近期可能有一定幅度的上升。但是，这种上升只是美国经济依据自身规律做出的小幅回调，不会改变国际体系范围内的竞争力相对削弱的根本态势，美国国债利率总体还是处于下行通道。美国经济复苏导致的国债利率回调撼动不了相对实力弱化和世界经济格局多极化带来的巨大影响。



图 15 2014 年 6 月—2015 年 6 月美国国债利率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美国财政部。

三、合理多元化配置外汇储备的政策建议

所有的投资策略选择和行动，都是对当时投资环境的反应，都是考虑到自身实力和具体环境的具体回应。面对当前国际国内环境，面对美国国债利率长期下行、短期回调的局面，中国要对原有外汇储备投资策略进行调整。

（一）国际国内投资环境变化要求外汇储备多元化

经过国际金融危机的洗礼，国际市场环境正在发生本质性变化，世界经济的运作模式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世界格局日益扁平化的趋势，意味着中国外汇储备投资要多元化，才能更好地维护中国国家利益。

第一，世界经济运作模式的根本性调整，正在改变投资模式。国际金融危机之前，世界经济运作的模式是欧美消费、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生产、第三世界配置能源资源的大三角运作模式。国际金融危机发生深刻地改变着这种大三角运作模式。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国际市场争夺问题就提上了美国的议事日程。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经济，失业率不断走高。坦率地讲，恢复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应该成为美国重整经济的首要任务。美国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希望通过出口增长创造更多就业机会。2010 年，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冲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除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并启动和推进“国家出口倡议”（National Export Initiatives）。美国“国家出口倡议”的核心内容就是要求美国用五年时间使其出口规模翻一番的“出口倍增计划”。美国宣布“出口倍增计划”，主要目的是应对本国的经济危机。为了尽快取得反危机的效果，美国全力加快落实该计划，不仅全力执行面向大西洋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还在“亚太再平衡”的旗号下全力执行面向太平洋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双向展开市场争夺攻势，加大国际市场争夺的力度，加快在全球市场跑马圈地。出于同样理由，日本、欧洲等发达经济体也相继出台拓展海外市场的政策，消化国内过剩产能，解决国内就业问题，恢复经济增长。总之，经过国际金融危机的洗礼之后，发达经济体改变了以往作为全球消费市场角色的发展策略，而致力于再工业化，致力于变身为生产中心。

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定位也在被动地发生改变。发达经济体内部消费市场萎缩以及加快进军海外市场的反危机政策构成了发展中国家的战略环境，发展中国家不仅国际市场萎缩，而且要让出部分国内市场。发达经济体的反危机措施不仅减小了对发展中国家产品的吸纳能力，还反过来要向发展中国家市场销售自己的产品，挤压其传统市场空间，国际市场的“跷跷板效应”就显现出来。在市场空间受到挤压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企业经营环境日趋恶化。一方面，由于发达经济体对国际市场的争夺，发展中国家不仅出口受到压制，国内市场也被抢占，经济增长遭遇很大困难，国内企业库存积压，产能过剩明显，生产链条被打破，企业生存环境更加恶化。另一方面，由于生产技术落后，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受到基础设施、技术和资金的限制愈发明显；国内市场难以产生增量，愈发增加了发展中国家企业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在国民经济的细

胞——企业经营环境日益恶化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产能过剩矛盾凸显，第二产业的发展受到巨大压制。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独立自强的倾向更加明显，纷纷制定适合自己的新时期发展战略。总之，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世界生产中心和原材料能源中心的定位也处在调整改变之中。

总之，经过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之后，全球范围内原来纵向分工为主的大三角世界经济运作模式正在向更加同质化的横向分工的竞合格局转变，竞争合作态势更加复杂，中国再也不能只考虑生产，而必须考虑构建以自己为中心的国际产业网络、价值网络，催生新的投资渠道。

第二，国际金融、国际贸易领域正在发生先导性变革，正在拓展新的投资渠道。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价值网络不得不面临新的调整，以适应主要国际经济体同质竞争的格局。由于原来世界银行、IMF 无法满足世界各国对于资金的需求，欧美发达国家无法再扮演世界经济消费拉动的角色，由此引发的国际贸易横向化、扁平化趋势，立足国际贸易横向化的需要，国际金融体系的资金纵向流动模式正在向横向流动、纵横交织并存方向转变，货币互换、银行集团化成为各发展中国家的必然选择。金砖国家的新发展银行、丝路基金、AIIB 快速增生，以补充原有国际金融机构的空白地带。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 AIIB。该行拥有 57 个意向创始成员国，初始资本为 1000 亿美元，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德国，是其四大股东。这些发展中国家倡导建立的国际银行都直接或间接地以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市场为投资标的市场，不仅改变了传统国际资本流动的方向，也拓展了新的投资渠道，有利于发展中国家通过自身市场建设度过世界经济运作模式变更期。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成为世界经济运作模式重构的重要杠杆。2013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哈萨克斯坦时提出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2013 年 10 月出访印度尼西亚时提出了“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战略。这就是统领新时期中国发展的“一带一路”战略。这个战略延续了扩大市场增量的思路，不仅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找到了出路，还为各经济体通过扩大国际市场增量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推进世界经济复苏找到了战略出路，为改善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各经济体市场环境带来了广阔的发展前景。“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要义就是充分盘活中国资金、技术相对优势以及国际产业链下游经济体市场优势，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亚欧大陆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挖掘亚洲市场潜力；通过经济带产业投资推进沿经济带经济体产业升级，扩大沿线经济体市场，大规模扩展国际市场容量，不仅为各经济体产品打开更大的市场空间，还为本国过剩产能找到市场，提高资金使用

效率，而且提升经济带沿线经济体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互利双赢。与此同时，通过亚洲市场空间拓展增量，带动世界其他经济体的发展。“一带一路”战略大规模拓展了世界市场空间，不仅直接惠及“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也将间接惠及世界，为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各经济体改善市场空间环境带来了曙光，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各经济体经济增长带来了光明前景。不仅如此，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动下，中美市场合作战略也进一步给亚太经济体市场空间的改善带来光明前景。为了进一步打开其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的市场，美国还基于自身利益需要改革了坚持多年的出口管制体系，相对放松了美国占优势的清洁能源等高技术产品对华出口管制，还启动了双方的投资保护协定（BIT）的实质性谈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曾培炎先生在 2014 年“二轨”（中美商业领袖和前高官第二轨道对话会）会谈上倡导，在 BIT 的基础上再加一个贸易 T（trade），变成投资贸易保护协定（BITT），中美双方经由 BIT 到 BITT，最终实现中美自由贸易区（FTA）。这在中美战略圈内已经形成广泛的共识，也为在亚太地区通过中美 FTA 把 TPP 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连接起来，避免双输的市场分割对立，实现互利共赢，为最终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奠定了基础，为世界经济复苏而努力的中美市场合作有利于亚太市场的顺畅联通和扩容。“一带一路”战略成为世界经济运作模式转变的极其重要的变量，正在并将继续对国际格局的重构产生重要影响。

第三，信息技术的进步正在改变国际资本运作的模式。在经历了包交换技术（packet switching）、传输控制协议/因特网互联协议（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Internet Protocol, TCP/IP）、互联网（World Wide Web，又叫万维网）技术三大信息技术的重大突破之后，人类在模拟人脑信息处理传输功能方面取得了革命性进步。作为一项意义深远的新基础设施，互联网正在深刻地改变国际资本运作的模式。互联网沟通的便利化、项目投资的网络电子化，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传统投资贸易模式，正在重新定义着交易的时空概念，形成全新的跨境贸易投资模式。电商、网络银行的新业态及新模式的产生以史无前例的方式拆除着传统贸易投资壁垒，改变着资本运作的方式和空间。信息技术的进步为跨境投资贸易突破传统壁垒提供了有效的新工具，国际资本运作正迈入新的模式。不适应世界技术和经济的新变化就将被淘汰。

（二）合理多元配置外汇储备的政策建议

适应新的投资环境，中国要逐步改变原来基于世界经济大三角运作模式的外汇储备配置策略，以多元化为原则，以崭新的思路应对国际经济政治环境的新变化。

第一，以更加商业化运作方式为原则，提高外汇储备资金使用效率。所有的商业投

资都遵循以下三个原则：一是效益与风险最佳组合原则。任何投资资金都追求“风险一定的前提下，尽可能使收益最大化；或收益一定的前提下，风险最小化”，实现效益与风险的最佳组合。二是任何投资都遵循“证券的多样化，建立科学的有效证券组合”，即遵循分散投资的原则。三是理智投资原则，即任何投资都要在分析、比较后审慎投资，追逐利润。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深入发展，根据国际金融危机投资美国国债收益率明显较低的现实，中国要逐步改变过去偏重考虑防风险需要的思维习惯，强化对投资回报率的追求，增强外汇储备资金的使用效率。

第二，紧跟世界经济运行模式调整的步伐，以新时期的国家战略为指导，适当增加“一带一路”沿线战略投资，适当减少对美国债投资规模，逐步实现外汇储备国际投资的多元化配置。“一带一路”战略是适应新时期国际环境的国家战略，一方面尽力规避中国与发达经济体因市场竞争矛盾激化而可能导致的摩擦和冲突，贡献于世界和平。另一方面，为中国加强与周边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找到了新的互利共赢合作模式，是新时期国家对外交往的总纲。所以，中国要把外汇储备作为“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支撑工具，加强沿线投资和经济合作，特别是提升国内基础设施水平，利用金融杠杆服务于国家战略的执行，为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培育新增长点。在此基础上，逐步把国家外汇储备配置到有更高回报的地区和项目上。同时，中国又要抓住“一带一路”战略的精髓——致力于扩大经济剩余净额，在加强向“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投资的同时，致力于加强中美大市场的融合，可以考虑把部分对美国国债投资资金就地转化为对美国基础设施投资，转化为对美国高收益行业的股票等投资，在自己发展的同时也给美国发展创造机会，实现中美之间的互利双赢合作。

总之，新时期，适应国际投资渠道越来越多的现实，中国要强化经济利益追求，逐步减少对美国债券投资规模，分散外汇储备投资，优化资金配置，把资金配置到国家战略需要和收益率高的项目上去。同时，充分考虑各地投资回报优势，可以考虑把对美国债券投资部分转化为对美国基础设施等高收益领域的投资上去，致力于资金配置效率提高基础上的全方位互利共赢合作。

责任编辑：李蕊、杜振华

· 区域 经济 ·

创新引领转型 改革促进转型

——浙江省“十三五”规划基本思路

黄 勇 等 *

摘要：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谋划好新一轮五年规划的基本思路是确保经济社会实现转型发展的关键环节。本文基于浙江省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的发展实际，结合国内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演变的新趋势，聚焦创新与改革，紧紧围绕加快转型发展的主线，确立转型发展的新目标，强化转型发展的新动力，走出转型发展的新路径。深入阐释了“十三五”时期亟需重点关注的再创民营企业发展新优势、构建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新格局等十个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十三五” 创新 改革 转型

作者简介：黄勇，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一、规划背景：发展呈现新常态，转型进入决胜期

“十三五”时期，浙江省发展面临全新的机遇和挑战，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内条件深刻变革，发展所呈现新常态特征十分明显，转型进入了决胜关键时期。

* 本文是浙江省发改委、浙江省社科联“十三五”规划前期研究公开选聘课题的研究成果，黄勇主持，课题组成员包括傅金龙、朱李鸣、潘毅刚、何垒、施纪平、秦诗立、廉军伟、郎金焕、张伟明等。

从国际方面来看，全球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发展格局已发生重大调整，美欧日经济增速趋缓，新兴经济体崛起势头日益明朗。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T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和贸易服务协定（TISA）区域合作谈判正在成为影响全球经济结构调整的新的的重要因素。而随着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兴起，世界主要国家正在努力寻求经济增长新动力，一场中国参与并处在同一起跑线上，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竞赛正在深入展开。

从国内方面来看，我国“三期叠加”的特征明显，新常态下所对应的内外战略、结构调整和体制机制面临重大变革。随着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等战略构想，我国从全球治理跟随者向主要参与者转变的趋势日益明显。随着涉及到产业和要素结构、市场需求结构、区域空间结构、城乡结构等方面调整进度的加快，我国实现转型发展的活力和潜力正在不断得到释放。我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以加快构建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现代市场体系为核心，协同推进国企和国资管理体制、财税体制、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开放型经济体制等多领域的重大改革，将最大限度释放市场活力，激发创新动力。

从浙江省自身来看，全省实现转型发展的挑战依然不小，经济增速趋缓与改革发展成本高企、传统优势产业快速转移与新兴支柱产业接力过慢、民营经济加速升级压力加大与创新支撑能力不足，以及社会转型加速和治理能力不够等多方面的挑战日益凸显。但是，浙江省“十三五”时期转型发展所面临的机遇也是前所未有的。全球经济、科技的深刻调整与变革，有利于浙江省发挥资本充裕优势，实现我国市场和全球资源的良性嫁接，构建更加主动的开放型经济新格局。国内宏观环境的变化，将为民营经济基础扎实的浙江省打开一个历史性的发展机遇窗口期。改革开放奠定的雄厚经济基础和稳定社会环境，也使得浙江省具备了率先实现转型的优势和能力。

总之，浙江省将迎来一场转型攻坚战，进入决定未来命运的关键时期。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锐意改革创新，抓住稍纵即逝的机遇，着力加快转型步伐，这是浙江省继续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唯一选择。

二、“十三五”规划思路：围绕转型目标寻求新动力、新路径

“十三五”时期，为浙江省适应上述发展阶段与环境的新特点、新趋势、新要求，总的发展指导思想是：以创造全省人民美好生活为追求，紧紧围绕加快转型发展的主线，确立转型发展的新目标，强化转型发展的新动力，走出转型发展的新路径，以创新引领转型，以改革促进转型，努力实现“四个翻一番”目标，高水平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为

建设“两富”“两美”的现代化浙江省奠定扎实基础，保障现代化建设继续走在全国前列。具体来说，围绕以下方面抓好工作。

（一）确立转型发展新目标

一是更加稳健的经济运行，经济增长区间稳定在 6%~8% 之间，年均增速保持 7% 左右，降低经济增长的波动性。二是更加高端的现代产业体系。高效生态农业更加发达，工业化与信息化加快融合，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格局基本形成，以绿色、高效、智能、集约为特征的现代产业体系得以确立。三是更加完善的基础设施网络。全国一流的现代化陆、水、空立体智能交通网络更加完善，城乡一体化的公共设施网络更加健全，宽带浙江、智慧城市建设扎实推进，创新基础设施得到显著加强。四是更加和谐的城乡区域关系。城乡发展的协调性、均衡性、普惠性显著提高，城乡一体化发展迈上新台阶。更加优渥的人民生活品质。社会就业比较充分，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人民群众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难有所助。居民思想道德、科技文化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学习型社会逐步形成。更加美丽的生态人居环境。主体功能区战略得到有效实施，生态功能区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以治水、治堵、治气为重点的城乡综合整治取得明显成效，人民群众最为关心的水、大气环境质量得到有效改善；建成一批美丽城市、风情小镇和美丽乡村；初步形成比较完善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争取建成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区和美丽中国先行区。五是更加科学的社会治理体系。法治浙江省建设取得更大成效，以“四张清单一张网”为重点的行政审批体制改革高效推进，社会组织活力更加充分，政府主导、社会共治治理格局基本形成。

（二）强化转型发展新动力

一是牢牢把握和强化“创新驱动、改革推动、开放带动”三大动力，把创新驱动战略摆在核心位置，以创新引领转型，依靠自主创新实现产业的赶超发展。二是把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落到实处。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率先在民营经济、金融改革、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行政审批体制改革、政府债务风险管控机制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有实质突破。三是把对外开放合作推向新的深度和广度。立足浙江发展浙江，跳出浙江发展浙江，实施更加主动的国际化发展和地区合作战略，抓住国家加快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建设新战略机遇，形成内外联动的参与全球化竞争的合作网络、产业集群与产业链，依托宁波—舟山港、跨境电子商务平台等开放型战略平台，进一步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布局、创新开放方式、提高开放层次。

（三）走出转型发展新路径

一是坚持走集约高效的新路子。更加重视以信息化提升工业化、城市化，更加重视发挥人力资源和技术自主创新的作用，更加重视以强化都市区经济和重点产业集聚区提升集约开发水平，更加重视加快形成有利于集约高效发展的管理体制与机制，从根本上破解浙江省人口密集、土地、矿产能源资源缺乏、生态系统脆弱、产品市场过剩的约束。二是坚持走绿色生态的新路子。加快建立起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产业体系，持之以恒地加强生态功能区建设，维护好山水林田湖生命共同体；加快改善生态人居环境，以“美丽浙江”为载体创建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区。三是坚持走协调均衡的新路子。纠正长期以来形成的“四大偏颇”，即经济增长偏重出口与投资拉动，相对忽视内需带动；产业发展偏重工业忽视服务业；公共服务偏重城市忽视乡村；政府治理偏重放权、无为而治忽视有效统筹、积极有为。进一步推动投资消费出口、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协调发展，以及政府有效之手和市场决定之手的有机结合、协调均衡。

三、“十三五”规划聚焦：应重点关注的若干问题

（一）再创民营企业发展新优势

民营企业是浙江省经济发展的主体。但近年来，浙江省民企在投资、经济总量的地位有所下降，民企活力有所下降，发展空间受到挤压，领先优势正在逐步缩小。就民营企业自身来看，尚存有民营企业股权结构相对封闭、民营企业家族化管理倾向比较严重以及民营企业创新能力不足导致消化成本压力较难等多方面的不足。但是，浙江省“十三五”的发展仍然必须从战略高度认识民营企业是浙江省的活力源泉和浙江省发展的最大优势，应该在推动国企改革、引进央企、吸引浙商回归、民外合璧中坚持强化民企发展优势这一根本目标，必须从大力改善本地发展环境、降低发展成本、创造集聚条件、激励创新活力等方面支持民营企业再创发展新优势。

因此，“十三五”时期，浙江省在再创民营企业发展新优势问题上，一是要大力改善民营企业发展环境，形成政府真正珍视企业家这一最宝贵财富和全社会尊重、推崇企业家精神的良好氛围。强化保护企业家及其企业的合法权益，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扩大民企在基础设施、社会事业等领域发展空间。二是要加快培育高素质企业家梯队。具体实践中，要帮助老一代企业家拓展对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的适应力，提高国际化经营能力，帮助民营企业做好“传、帮、带”的交接规划，推动家族企业社会化。同时，做好新生代企业家的培育工作，把新生代企业家的教育培训纳入到人才工作的整体规划，全面提升新生代企业家群体的综合素质。三是加大民营企业创新能力建设支持力

度。积极支持民企“走出去”收购国内外先进技术、人才、品牌等战略资源，建立研究开发机构和企业研究院。探索设立专门的战略并购基金，支持浙江省优势民企在重点产业核心技术上主动开展与央企、国内大企业、世界 500 强的战略合作。更大力度支持科技人员创业，引进国内外创业型人才来浙创业，培育一大批科技型中小企业。四是加快培育一批本土跨国公司、高新技术上市公司。集中力量、择优支持一批规模较大、经济效益好、带动能力强、产品具有竞争优势的民营龙头骨干企业，重点加强要素、平台、人才、资本市场、科技创新和品牌建设等方面的全方位支持。建议在中心城市、都市区构筑若干浙商总部经济平台，集聚本土民企总部。支持龙头骨干企业在全世界主要市场设立各类营销网络、创立国际知名品牌、创设国际合作研发机构、建立全球生产基地。在民营龙头骨干企业中培育一批扎根本土、全球化经营的跨国公司。

（二）构建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新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制造业先行一直是浙江省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引擎。现阶段，随着浙江省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升，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产业融合的趋势日趋凸显。2013 年，浙江省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已达到 46.1%，服务业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47.2%，并连续十年快于 GDP 增速一个百分点左右，也快于同期工业增速，服务业明显已经成为经济平稳增长的稳定器和新引擎。但是，就浙江省实际而言，必须充分认识到先进制造业仍将是经济发展的主支柱，不能否定制造业的主体地位。先进制造业是浙江省长期积累的参与国际分工比较优势所在，也是产业结构优化的重点、抢占发展机遇的重点。目前，浙江省制造业的发展，需要借助现代信息技术的力量，提升传统加工制造业装备智能化水平。同时，也必须认识到，制造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其产品市场竞争力的提升更多地要靠服务业来支撑，价值链的分配越来越倾向于研发、工业设计、物流、营销、品牌管理、知识产权管理、产品维护等生产性服务环节，而服务业发展也日益依赖高度发达的制造业。

因此，“十三五”时期，浙江省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是实现构建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一是做好“补链”文章，优先发展科技服务、创业金融、电子商务、信息软件、现代物流、工业设计、职业教育、人力资源服务等若干关键性的生产性服务业。二是做好融合文章，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重点是从企业、价值链、行业层面做到“三个推动”：推动有条件的制造企业向服务型制造升级，实现从单一制造商向集成商、服务商发展；推动价值链升级，从加工制造等环节加快向研发设计、品牌网络、供应链等环节延伸；推动传统消费品制造产业向时尚产业转变。三是做好升级文章，推动制造

业结构升级，从劳动密集传统产业为主逐渐转向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智能制造装备、节能环保、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通用航空、海洋工程装备等新兴产业。四是做好育新文章，抢先发展基础条件好、市场空间大的新兴服务业，把浙江省有基础、有独特资源条件的旅游休闲、健康养生、文化、教育培训等产业作为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内容。

（三）抢占信息经济“制高点”

加快信息化是继工业化、城市化之后推动发展转型的最重要趋势之一，是当前阶段我国一项重大国家战略，能否紧紧住抓住我国信息经济发展的重大机遇，成为浙江省实现转型升级的关键。对于浙江省而言，信息经济正处在由小做大做强的关键临界点，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具体来说，“天时”是指当前信息经济正处在“爆发式”发展的重要时期。截至2013年底，中国网民规模突破六亿，手机用户超过12亿，网络购物用户达到三亿户，全国信息消费整体规模达到2.2万亿元，电子商务交易规模突破十万亿元等，我国已是名副其实的“网络大国”。在“地利”方面，浙江省电子商务和软件、智能制造等信息产业发达，企业家资源丰富、重商文化浓厚，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电商交易平台、世界最大的电商交易数据库、世界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而“人和”，是指浙江省上下都形成了加快发展信息经济的共识。

在具体实践中，“十三五”时期浙江省抢占信息经济“制高点”的关键是夯实信息基础设施，推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先行。加快积极推进宽带浙江战略，启动浙江省“信息高速公路”计划，把浙江省打造成全国乃至全球信息基础设施最为先进的地区之一。同时，还要重视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统筹布局，将信息基础设施纳入产业发展、城乡建设和土地利用规划，既做到率先在城乡普及各类网络基础设施，又做到布局合理，避免重复建设。同时，浙江省还要紧紧围绕“七大中心、一个示范区”的发展定位，加快打造我国信息经济发展的先行区，推进信息化与浙江省经济发展关键领域四大方面深度融合。一是大力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的深度融合，制造与服务并重，软件与硬件并举，加快“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国家示范区”建设。二是大力推进信息化和新型城市化深度融合，以城市化建设需求带动产业发展，以信息经济发展提升城市智慧化程度。三是大力推进信息化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加快发展电子商务、物联网、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互联网金融、智慧物流、服务外包等优势信息服务业；促进信息技术融入传统服务业，培育新业态。四是大力推进信息生产和信息消费的深度融合。加强基于互联网的新兴媒体和内容服务建设；拓宽电子商务发展空间，建设跨境电子商务平台，鼓励电子商务

“走出去”。

（四）调整优化浙江省空间布局

近年来，浙江省在推进空间结构的优化调整方面已取得了较好成效，但是空间布局仍然面临生产、生活、生态三大空间功能布局不够清晰、分工不够合理、县域经济为重心的分散型布局逐渐显露局限性以及中心城市集聚辐射能力偏弱、不足以带动区域发展等多方面问题。为此，“十三五”时期浙江省空间发展结构应该围绕服务转型发展这一主线，着眼于推动空间布局与经济社会发展转型阶段要求相适应，尽快培育层次分明、功能协调的空间发展结构。

在具体实践中，进一步优化全省的空间布局，一是探索编制空间布局“顶层规划”，统筹安排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秩序。进一步做好规划的顶层设计，进行统筹谋篇布局，以规划为先导构建浙江省科学合理的空间开发结构。同时，进一步探索编制和实施省域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在市县域层面，积极探索“多规合一”，逐步建立从总体到局部、自上而下有机统一的空间规划体系。二是主动实施都市区和“小县大城”空间结构优化战略。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浙江省应当重点实施的空间发展战略，要大力推动杭州、宁波、温州和金华—义乌等四大都市区的建设，同时也要注重培育一批规模相对较小的都市区，比如台州都市区、绍兴都市区、嘉兴都市区等。在都市区内，加快推进城际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等交通网络建设，切实提高都市区内通勤便利化水平。边远山区和海岛，需要实施“小县大城”战略，集中力量推进人口、产业、公共服务等向县城集中，增强县城集聚能力，提高区域发展和保护的协调性。三是把中心城市和中心镇培育作为重中之重。调整优化全省空间布局，首要任务是提升中心城市功能，花大力气优化中心城市发展环境，使之成为高端要素、高端产业的集聚高地。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和总部经济，进一步提升中心城市产业层级，确立其在区域产业链中的高端地位。同时，加快中心镇建设作为完善城镇化体系的重中之重来抓。按照人口集中、产业集聚和土地集约的要求，建设各具特色的现代小城市和风情小镇。

（五）加大创新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投入

创新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积累越来越成为区域竞争的关键力量。改革开放以来，相比浙江省在有形物质资产上的投入而言，创新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积累明显不足，名校和知名科研院所数量较少，跟广东、江苏等省份还存在较大差距。为此，“十三五”时期乃至更长一段时期，浙江省应当把创新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投入问题放在突出地位。具体实践中，一是在创新平台载体建设上聚焦重点、加大力度。集中力量创建一批高水平

的高新园区，优先支持企业研究院、产业重点实验室、企业技术中心、工程研究中心等平台建设。同时，以研发、中试、科技中介、创业孵化等配套服务平台建设为重点，择优扶持建设一批专业、高水平的科技孵化器。二是把对创新人才的投入作为优先战略。引入一批特色高等工程院校、大学研究生院和大学科技园。探索谋划建设若干国际大学校区，作为有效嫁接国外知名高校的重要平台。重点鼓励行业龙头企业、行业协会与院校合作创办一批类似阿里巴巴商学院的专业化学院。更加灵活地运用税收政策，扩大政策覆盖面，除领军人才外，有针对性瞄准企业中高管、高级技术人才，甚至可以覆盖一般技术人员。要进一步创新股权激励、职务发明的相关政策，进一步激发高校、科研机构科技人员的创新活力。三是推动形成创新平台建设、人才开发要与产业发展协同的效应。围绕重点产业的培育，将产业协同创新作为投入的重点方向，将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各种创新资源有效整合在一起。学校、学科、专业课程的设置和发展，以及相应的人才政策，也要与产业发展和市场需求紧密结合，有所侧重。

（六）“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构建高能级开放平台

“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实施睦邻外交战略的重要举措，也是我国拓展发展战略空间的重要途径。浙江省作为我国前沿开放阵地和经济外向度最高的省市之一，需要在“十三五”时期重点对接好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积极主动发挥地理优势。应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快推进宁波—舟山港一体化与国际化能级提升。在硬件上，加快新一代集装箱泊位群以及长江经济带为主腹地的海铁联运集疏运体系建设。软件上，加快宁波航运交易所建设，推进宁波保险创新综合实验区建设和宁波与舟山大宗商品交易所整合建设与升级等多方面工作。同时，加快实现宁波—舟山港航管理局的统一管理，推动“两关”“两检”等整合方案研究，构筑新型口岸监管体系。

第二，强化甬舟向心力建设，不断提高海洋经济示范区发展水平。进一步加快健全宁波、舟山政府层面交流合作机制，加快两市在合作项目的建设用地与投融资安排、税费与GDP考核分成等领域的方案研究，明确宁波港集团、宁波航运交易所等优先参与舟山港域港航项目投资、建设、运营的办法。积极深化浙沪合作，加快洋山区域开发，重点加快小洋山北侧区域合作围垦步伐，争取将其纳入上海自贸区功能范围。继续支持舟山自由贸易港区方案完善与争取，规划建设舟山国际旅游目的地。

第三，充分发挥义乌“一带一路”战略纽带作用。深化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联动发展。加快金甬铁路建设，使义乌更好地成为宁波—舟山港等辐射内陆、中亚的战略纽带。

增强义新欧班列影响力，积极完善义乌与中亚、欧洲间国际铁路货运专列服务，加快研究开通到宁波、杭州、鹰潭等地支线。进一步提升义乌在浙江省乃至全国开放合作中的战略定位，包括支持义乌争取四省九方经济协作区中心城市定位、国家铁路集装箱物流中心建设、金融创新与国际结算业务试点，支持义乌参与边境与境外专业市场网络建设、参与新疆丝路桥头堡建设等。

第四，积极引导支持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把境外园区建设与浙江省经济“腾笼换鸟”结合起来，支持以合作区模式实现境外产业梯度转移，为省内重点发展总部经济、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腾出空间。在支持制造企业“走出去”的同时，同步支持浙江省金融、信息、物流、贸易、科研、培训等企业“走出去”，以帮助解决好合作区及企业的“融资难、融入难、融合难”问题。同时，政府要主动加强与境外园区所在地政府的交流合作，加强政府对境外园区、境外公共服务平台等的布局谋划，创新拓展一批境外港口泊位与临港合作区、跨境电子商务合作区等。

第五，大力支持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按照多层次、多方式和全球化的思路，构建中小网商、专业化跨境电商和传统外贸企业积极参与，第三方跨境电商平台和自建平台同步推进，境内外电商服务企业互动发展，卖出去和买进来有机结合，多种模式并存的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格局，建构完善的跨境电商服务体系，完善跨境电子商务进出口报关、检验检疫、收结汇、支付服务、税收等相关管理机制。

（七）支持地方金融业发展壮大

浙江省民间资本充裕，但地方金融业却活而不强，地方金融机构实力偏弱，这与浙江省经济大省的地位严重不符。浙江省必须将地方金融产业作为“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的战略性主导产业，把握好国家金融改革和发展的方向，率先建立起有利于转型升级的金融环境，加快发展壮大地方金融业。

第一，要做大做强地方金融机构。加快浙商银行、杭州银行、浙商证券等有条件的地方金融企业在境内外上市，培育全国性大银行、大投行。积极发展面向小微企业的普惠制新型金融组织，依托温州金改、丽水农村金改契机，率先发展民营银行、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一批新型金融组织。进一步加快股份制改造，引入战略投资者，组建战略联盟和开展兼并重组。条件成熟时，可将省信用联社改组为省农业商业合作银行集团，以资本为纽带控股各县级农信社（农商行）。

第二，重点打造全国重要的股权投资基金中心。继续围绕“民间财富管理中心”目标，集中优势政策资源和环境资源，吸引和集聚全国股权投资机构，助推新兴产业发展

和企业改制上市。出资设立一批股权投资母基金，发展出一批专业的产业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鼓励国有企业参与设立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在杭州都市区以及嘉兴等地布局建设若干股权投资基金集聚区。顺应国家已将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试点扩大至全国的趋势要求，更加重视股权交易中心的发展，抢占先机。

第三，培育发展特色金融产业。浙江省紧邻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可以考虑将若干基础好、前景广、与产业转型紧密结合的特色金融领域作为重点扶持和培育的方向，培育发展互联网金融、科技金融、航运金融、供应链金融等特色金融产业。

（八）积极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浙江省一直是农业转移人口大省，规模大、跨度大、多元化、省外流入人口多、新生代人口数量大、居家迁移程度高以及低学历状况严重等特点十分明显。而在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具体实践中，浙江省也还存在本地政府或居民在认可或接纳农业转移人口方面存在分歧，尚不能全面地分析和把握农业转移人口给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利与弊。在农村产权问题上，农民土地财产权利尚不能实现合理换算与有效保障，宅基地的有偿退出与保障房之间也不能达成顺利挂钩。在转入地的承受能力方面，流入地的财政、土地、生态环境等各方面的承受力建设也还有待进一步进行体制机制创新和要素资源保障。因此，“十三五”时期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既要积极，也要有序，要围绕“人的城市化”这一核心目标，按照逐步放开和人群、领域、空间、时间“四个有序”的基本原则展开。

第一，针对农业转移人口存在土地权益“进城不落户”的顾虑，鼓励各地以城乡体制改革为突破口，推进农村“三权”制度改革，实现农民财产权利的市场化与城乡要素的平等交换。加快土地确权、赋权进程，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和土地财产处置权，推动城镇户籍准入与土地权利分离。在完善进城落户农民承包地流转和宅基地有偿退出机制的基础上，优先推进宅基地的确权颁证工作，推动建设全国统一的土地流转市场，允许农民携“指标”进城入户。建立并完善农业转移人口享受城镇保障性住房与农村宅基地退出挂钩的机制。

第二，完善实施差别化落户政策。深化完善“居住证+积分制”管理制度，实现转移人口“积分制”与“入户地”选择之间的挂钩。放开建制镇尤其是中心镇和小城市的落户限制，有序放宽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按照“先本地本省、后外地外省”的导向，因地制宜指导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鼓励就地就近市民化。根据产业发展的空间布局，

围绕重点产业集聚区，按照“企业+个人+社区”的联合评价机制，吸引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优先落户，享受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

第三，设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合理评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教育、公共卫生、低保、养老金补贴等成本支出，建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的成本分担机制。加大省级财政统筹力度，改变主要以户籍人口为依据的资金经费划拨方式，加大以常住人口划拨经费系数比例，提高省级财政统筹和转移支付力度。围绕“人的城市化”这一基本要求，构建和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的动态评估体系，形成“客观成本+主观效用”相结合的系统评估原则。

第四，构建并完善城镇建设用地、财政转移支付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的机制。改革现有财政分配关系，按照常住人口确定各级财政分成，探索建立农业转移人口专项资金转移支付制度，在科学核算的基础上，实现各项公共服务的经费“费随人转”。积极向国家争取在吸纳跨省农业转移人口的市县区，提高城镇公共服务支出中中央分担比例，确保财权与事权的相互匹配。同时，探索建立城镇建设用地与吸纳农业转移人口数量挂钩的机制，采用跨区域核算的模式，做到“增减挂钩”，确保省域范围内以及省际之间的占补平衡。

（九）主动理性地应对人口老龄化

截至 2013 年底，浙江 60 岁以上户籍人口占户籍总人口的 18.63%，80 岁以上高龄老人超过 140 万，已是全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省份之一。在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形势下，一方面面对全社会进一步增加养老投入提出新要求，要求改变过去重城市、轻农村，重治疗、轻护理的养老资源结构。另一方面，劳动力的老化也将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全省经济增速。为此“十三五”时期，浙江省应在高效化解养老负担和提高增长潜力的结合点上精准发力。

第一，构建养老服务体系，满足老年人的特定需求。加大政府引导和社会参与力度，实现养老服务业的有序高效发展。进一步完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改造无障碍环境，成立互助型、集中型居家养老服务组织来提高老年人居家养老的便捷性，鼓励社会力量举办养老服务专业机构。推动医疗与养老机构合办老年医院，鼓励二者建立双向转诊、远程医疗和长期驻点服务关系。加大养老护理投入，建立老年医学中心和老年病专科。完善立法并修订配套法规，明确赡养人的精神慰藉义务。建立社区老年人活动组织，鼓励社工和志愿者协助老年人开展文体娱乐活动。进一步提升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养老服务水平，适度向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地区倾斜财政性养老支出。盘活农村资产，鼓

励宅基地置换养老，丰富农村养老的实现形式。

第二，改革养老金体系，提高养老资产的积累和投资效率。逐步整合按照身份不同设计的社保制度，探索为全民提供基本年金，然后按照不同职业和资金来源建立补充养老保险或职业年金制度，并争取职业年金的个税递延政策。探索建立适合浙江省省情的养老金投资运营模式。在制度先行、安全第一、获取收益的原则下推动养老资产的多元投资和专业投资。借鉴国外先进的养老金投资运营模式，推动养老金投资一些安全性高、能够产生一定收益的实体经济，发挥养老资产投资在我省社会经济建设中的引领作用。

第三，促进人力资源的供求平衡。推动有差别和选择自由的退休制度，充分利用老年人力资源。延迟退休是应对老龄化的常规途径，但是鉴于临近退休的劳动者更新技能的能力普遍不足，单纯提高退休年龄可能给部分劳动力带来就业困难和失业风险。加强技能培训，提高适龄人口的劳动参与水平。通过推进城乡户籍改革和农民工市民化，提高浙江省就业吸引力。同时通过发展职业教育和培训，促使大学生、城市待业人群、农业转移人口提高劳动力市场竞争力。推动产业转型，减少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用工需求。利用信息化改造传统工业，提高生产过程的智能化和自动化水平。同时引导浙江劳动密集型企业将制造环节向省外转移或外包。

（十）加快转变地方政府治理方式

现阶段，地方政府治理普遍面临治理理念上“重管制、轻协调”，治理重点上“重经济、轻社会”，治理方式上“重审批、轻监管”，以及治理模式上“重程序、轻效率”等方面的问题。为此，“十三五”时期，浙江省需率先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建设，营造发展新优势。

第一，积极转变职能，把增强公共服务能力放到更加突出位置。重点增强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基础教育、基本医疗等有效提供，增加相应的财政支持规模和比重，同时切实把干净空气、干净水、干净土壤、较高森林覆盖率等纳入公共服务提供范畴。加强公共服务科学配置，包括按照城乡一体化要求向基层倾斜、向所有常住居民公平覆盖；支持社会资本、非盈利组织积极有序设立和运营医院、学校、养老、文化等机构，不断丰富公共服务供给形式和层次。推动从以GDP为主导的政绩考核体系转向以公共服务为取向的政绩考核体系。

第二，继续简化事前审批，科学增强事中事后监管服务能力。一要不断深入推进优化“四张清单一张网”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瘦身政府权力清单、企业投资项目负面清单、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清单，优化政府责任清单，完善政务服务网，赋予市场主体

更多自由权。二要加强放权与监管模式创新有机同步，进一步研究和划清部门职责边界，明确公共服务事项，完善各级政府、相关部门的责任目录清单，加快建立以事中事后为主体的现代化政府监管服务体系。三要加强社会组织培育与政府充分授权，充分发挥其对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支持支撑作用，加快官办行业协会、商会、学会、联谊会等改革，加快民间社会组织的规范性建设，形成激励约束机制，同时结合充分授权，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

第三，减少政府管理层级与环节，不断提高行政效率。以行政管理横向扁平化入手，开展大部门制改革整体谋划，适当减少一级、二级部门数量，支持通过部门内设业务处室的跨部门优化来避免大部门制度改革不彻底、改革次数越多行政流程越长、权责越分散的诟病。同时，深化“省管县”体制改革，对设区市所辖周边县（市），可选择性进行县（市）改区行政区划调整，以扩大区域中心城市发展空间，其他县（市）则与设区市分离，直接由省政府管理。

第四，注重发挥智库作用，有效提升政府科学决策能力。加快培育浙江省新型智库，提升科学决策水平。建议制定出台《重大政府决策专家咨询论证办法》，完善各类智库参与决策的机制。实施外脑智库计划，进一步发挥专家学者的咨询作用，推动政府决策采购智力服务。围绕服务战略规划和重大政策的制定、政府运作效率的评估、人才培养和储备，让各类智库真正参与到决策咨询中来。在有效整合的基础上将智库当作智力型公共服务机构采取特殊的税收、绩效分配政策强化智库能力建设，吸引专业人才进入智库。建立智库与党政人才“旋转门”机制，加强政府部门与研究机构人员交流，优先引进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员补充到研究人员队伍中来；推进研究人员到政府部门或市县挂职锻炼，提高研究人员结合实际的研究水平。改善各研究机构工作条件，积极采取干部培训、外出考察、交流挂职等措施，提高调研工作人员研究能力和服务调研的水平。建立吸纳国际化人才进入政府咨询机构的渠道，增强智库实力和影响力。采取鼓励政策大力培育高校、社会机构发展民间专业性智库。依法支持全国、境外优秀智库在浙江省开展活动，设立分支机构或区域性总部，提高智库良性竞合水平；健全吸纳国际化人才进入智库，不断提升智库国际化视野与合作能力。进一步完善智库治理机制，增强体制机制灵活性、研究方向独立性、咨询成果评价包容性，不断提高决策咨询成果含金量。完善激励机制，制订奖励办法，鼓励专家积极开展决策研究与咨询活动，对创新性强、切合实际、已被采纳或部分采纳的决策研究与咨询成果，经评审给予精神和物质双重奖励。

（下转第 38 页）

加快大数据发展是大势所趋

武 锋

摘要：随着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数据已日益成为土地、资本、技术之后的又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并将必然是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争夺的重要资源。谁掌握数据的主动权和主导权，谁就能赢得未来。目前，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纷纷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措施以促进大数据应用与发展。本文将通过研究国外发达地区大数据发展的实践，分析我国大数据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与挑战，并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推动我国大数据快速、健康发展的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大数据 开放共享 趋势

作者简介：武锋，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

前 言

随着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数据的数量、规模不断扩大，数据已日益成为土地、资本、技术之后的又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并将必然是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争夺的重要资源。谁掌握数据的主动权和主导权，谁就能赢得未来。奥巴马政府将数据定义为“未来的新石油”，认为一个国家拥有数据的规模、活性及解释运用的能力将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数据的占有和控制将成为继陆权、海权、空权之外的另一个国家核心权力。在此情况下，一个全新的概念——大数据

(Big Data)开始风靡全球。可以预见,新一轮的国际竞争尤其是大国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大数据增强对世界局势的掌控力和主导权。目前,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相继出台了相关的战略规划和配套法规以促进大数据应用与发展,致力于利用大数据来进一步增强自身的综合竞争力。

近年来,我国数据生成能力空前提升,数据呈现井喷式的爆发性增长,大数据应用已经渗透到各个行业和领域。在此背景下,我国也充分认识到大数据的重要性,相关部门先后颁布了《关于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若干意见》《关于促进大数据发展的行动纲要》等重要文件,希望通过发展大数据,来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经济发展质量乃至国家综合实力。本文将通过研究国外发达地区大数据发展的实践,分析我国大数据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与挑战,并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推动我国大数据快速、健康发展的合理化建议。

一、大数据的概念与内涵

(一) 定义

“大数据”的概念早已有之,1980 年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便在《第三次浪潮》一书中将大数据赞颂为“第三次浪潮的华彩乐章”。但是直到近几年,“大数据”才与“云计算”“物联网”一道,成为互联网信息技术行业的流行词汇。2008 年,在谷歌成立 10 周年之际,著名的《自然》杂志出版了一期专刊,专门讨论未来的大数据处理相关的一系列技术问题和挑战,其中就提出了“Big Data”(大数据)的概念。2011 年 5 月,在“云计算相遇大数据”为主题的 EMC World 2011 会议中,易安信(EMC)也抛出了 Big Data 概念。所以,很多人认为,2011 年是大数据元年。

此后,诸多专家、机构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对大数据的理解。当然,由于大数据本身具有较强的抽象性,目前国际上尚没有一个统一公认的定义。维基百科认为大数据是超过当前现有的数据库系统或数据库管理工具处理能力,处理时间超过客户能容忍时间的大规模复杂数据集。全球排名第一的企业数据集成软件商 Informatica 认为大数据包括海量数据和复杂数据类型,其规模超过传统数据库系统进行管理和处理的能力。亚马逊网络服务(AWS)、大数据科学家 JohnRauser 提到一个简单的定义:大数据就是任何超过了一台计算机处理能力的庞大数据量。百度搜索的定义为:“大数据”是一个体量特别大,数据类别特别大的数据集,并且这样的数据集无法用传统数据库工具对其内容进行抓取、管理和处理。互联网周刊的定义为:“大数据”的概念远不止大量的数据(TB)和处理大量数据的技术,或者所谓的“4 个 V”之类的简单概念,而是涵盖了人们在大规模

数据的基础上可以做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在小规模数据的基础上是无法实现的。换句话说，大数据让我们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通过对海量数据进行分析，获得有巨大价值的产品和服务，或深刻的洞见，最终形成变革之力。

综合上述不同的定义，我们认为，大数据至少应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数量巨大，二是无法使用传统工具处理。因此，大数据最重要的是如何使用。它强调的不仅是数据的规模，更强调从海量数据中快速获得有价值信息和知识的能力。

（二）特征

一般认为，大数据主要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典型特征：规模性（Volume）、多样性（Varity）、高速性（Velocity）和价值性（Value），即所谓的“4V”。

1. 规模性。大数据的特征首先就体现为“数量大”，存储单位从过去的 GB（千兆字节）到 TB（1024GB），直至 PB（1024TB）、EB（1024PB）。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数据开始爆发性增长。社交网络（微博、推特、脸书）、移动网络、各种智能终端等，都成为数据的来源。淘宝网近四亿的会员每天产生的商品交易数据约 20TB；脸书约 10 亿的用户每天产生的日志数据超过 300TB。迫切需要智能的算法、强大的数据处理平台和新的数据处理技术来统计、分析、预测和实时处理如此大规模的数据。

2. 多样性。广泛的数据来源，决定了大数据形式的多样性。大数据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结构化数据，如财务系统数据、信息管理系统数据、医疗系统数据等，其特点是数据间因果关系强；二是非结构化的数据，如视频、图片、音频等，其特点是数据间没有因果关系；三是半结构化数据，如 HTML 文档、邮件、网页等，其特点是数据间的因果关系弱。

3. 高速性。与以往的档案、广播、报纸等传统数据载体不同，大数据的交换和传播是通过互联网、云计算等方式实现的，远比传统媒介的信息交换和传播速度快捷。大数据与海量数据的重要区别，除了大数据的数据规模更大以外，大数据对处理数据的响应速度有更严格的要求。实时分析而非批量分析，数据输入、处理与丢弃立刻见效，几乎无延迟。数据的增长速度和处理速度是大数据高速性的重要体现。

4. 价值性。这也是大数据的核心特征。现实世界所产生的数据中，有价值的数据所占比例很小。相比于传统的小数据，大数据最大的价值在于通过从大量不相关的各种类型的数据中，挖掘出对未来趋势与模式预测分析有价值的信息，并通过机器学习方法、人工智能方法或数据挖掘方法深度分析，发现新规律和新知识，并运用于农业、金融、医疗等各个领域，从而最终达到改善社会治理、提高生产效率、推进科学研究的效果。

二、发达国家大数据的发展及经验启示

（一）现状

随着网络和信息技术的不断普及，人类产生的数据量正在呈指数级增长，大约每两年翻一番，而且这个速度将在 2020 年之前会继续保持下去。这意味着人类在最近两年产生的数据量相当于之前产生的全部数据量。有关资料显示，2011 年，全球数据规模为 1.8ZB（1024EB），可以填满 575 亿个 32GB 的 iPad，这些 iPad 可以在我国修建两座长城。到 2020 年，全球数据将达到 40ZB，如果把它们全部存入蓝光光盘，这些光盘和 424 艘尼米兹号航母重量相当。

在此情况下，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都认识到了大数据的重要作用。2012 年 7 月，联合国在纽约发布了一本关于大数据政务的白皮书《大数据促发展：挑战与机遇》，总结了各国政府如何利用大数据响应社会需求，指导经济运行，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并建议成员国建立“脉搏实验室”（Pulse Labs），挖掘大数据的潜在价值。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也纷纷将开发利用大数据作为夺取新一轮竞争制高点的重要抓手，并制定实施了各自的大数据发展战略。2012 年 1 月，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把“大数据、大影响”作为重要议题，宣称数据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经济资产类别，就像货币或黄金一样。

1. 美国。2010 年，美国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PCAST）向奥巴马和国会提交的《规划数字化的未来：美国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给总统和国会的报告》指出，大数据技术具有重要战略价值，而联邦政府对其研发投资不足，建议联邦政府“制定一个应对‘大数据’的战略”。此后，奥巴马政府着手采取了一系列主题为“我的大数据”（My Data Initiatives）的倡议和措施，分别为 2010 年发起的《“蓝纽扣”计划》、2012 年发起的《“绿纽扣”计划》、2012 年发起的《“我的学生数据”计划》和 2014 年发起《“创建副本”计划》，旨在促进美国人可以更安全地获取他们的个人数据，从而更好地处理他们私人领域的申请活动和服务。2012 年 3 月，美国投资两亿美元启动了“大数据研究和发展”计划，该计划涉及国防部、能源部等六个联邦政府部门，用以大力推进大数据的收集、访问、组织和开发利用等相关技术的发展，进而大幅提高从海量复杂的数据中提炼信息和获取知识的能力与水平。政府对大数据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更加重视，2014 年 5 月，美国发布的白皮书《大数据：抓住机遇，守护价值》提出：大数据正在改变世界。但是它并没有改变美国人对于保护个人隐私、确保公平或是防止歧视的坚定信仰。

2. 欧盟。欧盟于 2011 年 12 月公开颁布了《开放数据战略》。它以开放数据为核心，以创新、增长和透明治理为引擎，将重点加强在数据处理技术、数据门户网站和科研数

据基础设施三方面的投入，旨在欧洲企业与市民能自由获取欧盟公共管理部门的所有信息，建立一个汇集不同成员国以及欧洲机构数据的“泛欧门户”。目前，欧盟正在研究制定数据价值链战略计划，以实现数据的最大价值，尤其是所谓的“大数据”，重点是通过一个以数据为核心的连贯性欧盟生态体系，让数据价值链的不同阶段产生价值。数据价值链战略计划包括开放数据、云计算、高性能计算和科学知识开放获取这四大战略，遵循的主要原则是：高质量数据的广泛获得性，包括公共资助数据的免费获得；作为数字化单一市场的一部分，欧盟内数据的自由流动；寻求个人潜在隐私问题与其数据再利用潜力之间的适当平衡，同时赋予公民以其希望的形式使用自己数据的权利。

3. 日本。2012年6月，日本IT战略本部发布电子政务开放数据战略草案，迈出了政府数据公开的关键性一步。为了确保国民方便地获得行政信息，政府将利用信息公开方式标准化技术实现统计信息、测量信息、灾害信息等公共信息，在紧急情况时可以较少的网络流量向手机用户提供信息，并尽快在网络上实现行政信息全部公开并可被重复使用。2012年7月，日本总务省ICT（信息、通信、技术）基本战略委员会发布的《面向2020年的ICT综合战略》（草案）提出，“提升日本竞争力，大数据应用不可或缺”，战略将重点关注“大数据应用”。2013年6月，安倍内阁正式公布了新IT战略——《创建最尖端IT国家宣言》，全面阐述了2013年—2020年期间以发展开放公共数据和大数据为核心的日本新IT国家战略，提出要把日本建设成为一个具有“世界最高水准的广泛运用信息产业技术的社会”。

（二）启示

1. 注重顶层设计。为充分抓住大数据带来的新发展机遇，美、日等发达国家无不从国家层面来制定大数据战略规划，提出国家实施大数据战略的明确目标，并用于引领带动本国大数据的快速发展。如美国的《我的大数据》《大数据研究和发展》等，日本《面向2020年的ICT综合战略》《创建最尖端IT国家宣言》等。另一方面，美、日等国政府除了做好大数据项目的统筹规划以外，还会提供充足的资金以支撑提升国家数据能力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促进面向大数据创新应用技术的开发，并保证政府部门数据存储需求和数据安全需求。

2. 注重数据开放。为保证大数据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都实行了开放数据的政策。如美国的《我的大数据》分别从退伍军人健康记录、纳税信息、电力能源使用和学生助学信息四个方面进行信息公开，使得美国人可以更安全地获取他们的个人数据，用来更好地处理他们私人领域的申请活动和服务。《欧盟开放数据战

略》旨在欧洲企业与市民能自由获取欧盟公共管理部门的所有信息，建立一个汇集不同成员国以及欧洲机构数据的“泛欧门户”。日本 IT 战略本部于 2014 年 6 月发布电子政务开放数据战略草案；并于 2013 年 7 月由日本三菱综合研究所牵头成立了“开放数据流通推进联盟”，旨在由产官学联合，促进日本公共数据的开放应用。

3. 注重隐私保护。随着大数据飞速增长，隐私问题也日益呈现在世人的面前。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强力推动大数据的同时，也充分考虑了隐私的保护。随着远程控制技术与云端储存技术在个人电脑与文件管理领域普及，美国政府正在通过发展大数据战略来完善隐私法以保证法律跟上技术发展的脚步。现今美国最高法院正从第三方数据的访问权限、数据和元数据的安全、商业数据服务的政府使用、内部威胁和持续性评估这四个方面着手来完善隐私法。欧盟通过“迎接大数据时代”的推广，呼吁成员国积极推动大数据业务，并就“数据所有权”和数据提供责任作出新规定、制定数据标准等。

4. 注重社会参与。由国家出资推进政府与各科研单位、高校、企业的合作，组合社会各界多元力量共同参与大数据战略，是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重要经验。如美国《大数据研究和发展计划》就是以美国各级政府为主导，依托高校和科研机构，鼓励联邦政府机构和各州政府以及高校、非政府组织和企业等各种力量广泛参与，并通过多种形式进行充分的合作。日本为促进本国大数据的快速发展，成立了由三菱综合研究所牵头、东京大学等机构广泛参与的“开放数据流通推进联盟”。

三、大数据发展的趋势

虽然大数据目前仍处在发展的起步阶段，尚存在着诸多的困难与挑战，但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大数据未来的发展前景非常可观。

（一）数据将呈现指数级增长

近年来，随着社交网络、移动互联、电子商务、互联网和云计算的兴起，音频、视频、图像、日志等各类数据正在以指数级增长。据有关资料显示，2011 年，全球数据规模为 1.8ZB，可以填满 575 亿个 32GB 的 iPad，这些 iPad 可以在我国修建两座长城。到 2020 年，全球数据将达到 40ZB，如果把它们全部存入蓝光光盘，这些光盘和 424 艘尼米兹号航母重量相当。美国互联网数据中心则指出，互联网上的数据每年将增长 50%，每两年便将翻一番，目前世界上 90% 以上的数据是最近几年才产生的。

（二）数据将成为最有价值的资源

在大数据时代，数据成为继土地、劳动、资本之后的新要素，构成企业未来发展的

核心竞争力。《华尔街日报》在一份题为《大数据，大影响》的报告中宣传，数据已经成为一种新的资产类别，就像货币或黄金一样。IBM 执行总裁罗睿兰认为，“数据将成为一切行业当中决定胜负的根本因素，最终数据将成为人类至关重要的自然资源。”随着大数据应用的不断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大数据将成为机构和企业的重点资产和争夺的焦点，谷歌、苹果、亚马逊、阿里巴巴、腾讯等互联网巨头正在运用大数据力量获得商业上更大的成功，并且将会继续通过大数据来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三）大数据和传统行业智能融合

通过对大数据收集、整理、分析、挖掘，我们不仅可以发现城市治理难题，掌握经济运行趋势，还能够驱动精确设计和精确生产模式，引领服务业的精确化和增值化，创造互动的创意产业新形态。麦当劳、肯德基以及苹果公司等旗舰专卖店的位置都是建立在数据分析基础之上的精准选址。百度、阿里、腾讯等通过对海量数据的掌握和分析，为用户提供更加专业化和个性化的服务。在智慧城市建设不断深入的情况下，大数据必将在智慧城市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由城市数字化到智慧城市，关键是要实现对数字信息的智慧处理，其核心是引入了大数据处理技术，大数据将成为智慧城市的智慧引擎。智慧金融、智慧安防、智慧医疗、智慧教育、智慧交通、智慧城管等，无不是大数据和传统产业融合的重要领域。

（四）数据将越来越开放

大数据是人类共同资源、共同财富，数据开放共享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随着各国政府和企业对开放数据带来的社会效益和商业价值认识的不断提升，全球必将很快掀起一股数据开放的热潮。事实上，大数据的发展需要全世界、全人类的共同协作，变私有大数据为公共大数据，最终实现私有、企业自有、行业自有的全球性大数据整合，才不至形成一个个毫无价值的“数据孤岛”。大数据越关联越有价值，越开放越有价值。尤其是公共事业和互联网企业的数据开放数据将越来越多。目前，美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都在政府和公共事业上的数据做出了表率。我国政府也将一方面带头力促数据公开共享，另一方面，还通过推动建设各类大数据服务交易平台，为数据使用者提供丰富的数据来源和数据的应用。

（五）大数据安全将日受重视

大数据在经济社会中应用日益广泛的同时，大数据的安全也必将受到更多的重视。大数据时代，在我们用数据挖掘和数据分析等大数据技术获取有价值信息的同时，“黑

客”也可以利用这些大数据技术最大限度地收集更多有用信息，对其感兴趣的目标发起更加“精准的”攻击。近年来，个人隐私、企业商业信息甚至是国家机密泄露事件时有发生。对此，美欧等发达国家纷纷制定完善了保护信息安全、防止隐私泄露等相关法律法规。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其他国家也会迅速跟进，以更好地保障本国政府、企业乃至居民的数据安全。

（六）大数据人才将备受欢迎

随着大数据的不断发展及其应用的日益广泛，包括大数据分析师、数据管理专家、大数据算法工程师、数据产品经理等在内的具有丰富经验的数据分析人员将成为全社会稀缺的资源和各机构争夺的人才。据著名国际咨询公司 Gartner 预测，2015 年全球大数据人才需求将达到 440 万人，而人才市场仅能够满足需求的 1/3。麦肯锡公司则预测美国到 2018 年需要深度数据分析人才 44 万~49 万人，缺口为 14 万~19 万人。有鉴于此，美国通过国家科学基金会，鼓励研究性大学设立跨学科的学位项目，为培养下一代数据科学家和工程师做准备，并设立培训基金支持对大学生进行相关技术培训，召集各个学科的研究人员共同探讨大数据如何改变教育和学习等。英国、澳大利亚、法国等国家也类似地对大数据人才的培养做出专项部署。IBM 等企业也开始全面推进与高校在大数据领域的合作，力图培养企业发展需要的既懂业务知识又具分析技能的复合型数据人才。

四、我国大数据发展现状、问题与挑战

近年来，由于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大数据在我国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当然，作为一个相对新鲜的事物，我国的大数据发展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一）现状

经过多年信息化建设和互联网发展，我国已经成为数据大国。互联网已经成为生产、生活的重要技术平台，随着信息技术的日益普及和“互联网+”融合态势的加快，海量数据不断快速聚集，据国际有关机构统计，我国的数据总量将以年均 50% 的速度增长，预计到 2020 年将占全球的 21%。在新形势下，国务院于 2015 年 6 月 24 日印发了《关于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充分运用大数据先进的理念、技术和资源，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推进减政放权和政府职能转变，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同年 8 月 31 日，颁布了《关于促进大数据发展的行动纲要》，提出“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快大数据部署，深化大数据应用，已成为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和推动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需要和必然选择。”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也加快了推动大数据发展的步伐。其中，广东、上海、重庆、贵州、武汉等省市在全国率先制定颁布了推动大数据发展的效果政策文件。早在 2012 年 11 月，广东便发布《广东省实施大数据战略工作方案》，提出“为保证大数据战略有效实施，广东省将建设政务数据中心，并为高等院校和企业等成立大数据研究机构提供支持”。2013 年 7 月，上海发布《上海推进大数据研究与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3—2015 年）》，提出“突破大数据关键技术，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联合的发展机制，形成需求牵引、创新应用的发展模式，发展数据产业，服务智慧城市”，拟成立“上海大数据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建设“上海市数据科学重点实验室”、数据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以大数据技术创新及产业应用为目标、以联盟为纽带促进形成若干引领大数据产业技术创新的企业联合实体。2014 年 2 月，贵州印发《关于加快大数据产业发展应用若干政策的意见》《贵州省大数据产业发展应用规划纲要（2014—2020 年）》，提出了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的目标是推动贵州省大数据产业稳步快速发展，到 2020 年大数据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达到 4500 亿元。大数据产业体系基本健全，业务形态较为齐备，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安全保障能力明显提高。产业载体建设顺利推进，聚集一批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骨干企业。数据中心布局合理，政府数据资源实现有效整合，大数据开放与管理机制初步建立，应用水平明显提高，以大数据引领和支撑贵州省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能力显著增强。此外，重庆、武汉等其他省市也纷纷颁布了各自的大数据行动计划。

（二）问题与挑战

在我国积极发展大数据的同时，还存在着若干制约我国从数据大国向数据强国转变的因素，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需求不明确。数据是大数据产业发展的基础，具有商业价值的数据和商业分析真正能够帮助企业提升业务，创造出新的价值。很多企业业务部门不了解大数据，也不了解大数据的应用场景和价值，因此难以提出大数据的准确需求。而大数据部门又是非盈利部门，企业决策层担心投入太多的成本，导致了很多企业在搭建大数据部门时犹豫不决，或者很多企业都处于观望尝试的态度，从根本上影响了企业在大数据方向的发展，也阻碍了企业积累和挖掘自身的数据资产，甚至由于数据没有应用场景，删除很多有价值的历史数据，导致企业数据资产流失。

2. 共享不充分。由于缺少统一规划和统一的标准，我国政府部门与数据企业在建设信息化系统的过程中形成了众多的“信息孤岛”。在很多企业中尤其是大型的企业，数据常常散落在不同部门，而且这些数据存在不同的数据仓库中，不同部门的数据技术也有

可能不一样，这导致企业内部自己的数据都没法打通。如果不打通这些数据，大数据的价值则非常难挖掘。我国的大数据市场还不成熟，市场上存在的仅是孤立、不流动、没有整合的数据，客户很难找到完整的、具有商业价值的数据因而不得不从多个数据企业采购数据，这样不但效率低，而且费用高。

3. 安全保障低。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如何保证用户的信息安全日益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在大数据时代，要求将所有数据存储在同一个地方，这使得保护数据会变得更加简单，但与此同时，在线数据越多越集中，黑客也越容易获得关于人的信息，从而更可能实施犯罪。日前一些知名网站密码泄露、系统漏洞导致用户资料被盗等安全事件已经警醒我们，要加强大数据网络安全建设。同时，随着数据的不断增加，对数据存储的物理安全性，从而对数据的多副本与容灾机制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目前，我国多数政府部门和传统企业的数据安全令人担忧。

4. 人才队伍少。大数据在我国是新生事物，国内高校开展大数据技术人才培养的时间不长，技术市场上掌握大数据处理和应用开发技术的人才很少。大数据的发展速度很快，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企业都需要一支懂技术、善管理、有经验的大数据建设专业队伍，包括大数据开发工程师、大数据分析师、大数据架构师、大数据后台开发工程师、大数据算法工程师等。因此，目前我国大数据市场上的技术人才储备与大数据处理和应用需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缺口，而且这一缺口将在未来几年可能持续存在。

5. 隐私保护差。在大数据时代，信息公开和数据共享是必然的趋势，但与此同时，随着数据的指数性增长，隐私泄露事件时有发生。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的隐私权保护法律，因而无法保证国家大数据战略进行过程中数据的隐私安全。为促进大数据的健康有序发展，我们必须尽快研究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对大数据战略中每一个项目的活动周期中产生的数据进行隐私监管，确保数据隐私不被侵犯。

五、发展我国大数据的对策建议

在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我国的具体国情及国内外大数据发展的趋势，建议我国发展大数据采取如下对策。

（一）推动数据开放

政府拥有大量有价值的数据，应该着眼于民生福祉，带头推动政府数据的开放共享。要加快建立政府数据开放平台，推动各级政府和公共服务机构优先开放高价值数据资源。加强政府与民间协作，推动各类优质数据资源的开放共享。积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引导更多非公共数据向社会开放，鼓励基于开放数据开展应用创新，通过数据资源的开放利用，促进大数据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并惠及更多民众。

（二）健全法律法规

借鉴美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加快制定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有关信息公开、数据安全、网络安全、隐私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规范国家重要数据的存储、备份和迁移，保障数据安全、可靠。在尊重知识产权的前提下，规范数据隐私保护的范围、方式和程序，有效避免信息公开与隐私保护方面的冲突，对相关数据去除敏感信息后实现开放和共享。

（三）完善标准规范

尽快制定并试行对数据开放原则和机制规范、数据分级标准、数据发展及使用的责任与权益等大数据发展应用过程中必需的相关标准规范。制定数据编码、处理、共享、交换标准，出台大数据技术、协议、标准等规范；建立数据资产访问、连接和共享机制，搭建数据资产交易平台，形成数据流转的层次化体系结构；研究数据资产的所有权、使用权以及价值评估体系，通过市场化模式保障数据资产流转的可行性。

（四）保障信息安全

妥善处理发展创新和安全规范的关系，探索完善安全管理规范措施，切实保障数据安全。建立大数据安全评估体系，做好大数据应用安全评测和风险评估，提高大数据平台信息安全监测、预警和应对能力。加强测试工具研发，开展大数据平台可靠性及安全性评测服务，引导大数据安全可控和有序发展。推动数据保护、个人隐私、数据权益和合理利用等方面的地方立法工作，加快出台实施细则，对重要数据的保存、备份、迁移等进行规范管理。

（五）加强人才培养

落实各项人才政策，创建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良好环境，加快从美、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引进既懂业务知识又具分析技能的复合型数据人才。扶持高等院校大数据相关专业的专业的发展，推进大学课程改革，开设一系列符合现在和未来社会需求的数据技术的相关课程，培养数据存储、数据挖掘、数据可视化等方面的专门人才。鼓励高校和企业通过建立联合实验室、研发中心等形式，联合培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大数据专业人才。充分发挥以岗位培训和继续教育为重点，加大社会化培训力度，提高在职人员大数据应

用技能，进一步加强对机关公务员、事业单位、大中型企业工作人员的大数据知识的培训与考核。

（六）支持技术创新

加大财政对大数据关键技术研发创新的引导和扶持力度，构建自主的大数据技术体系。加强大数据共性基础技术研发。重点研发大数据存储管理、分析挖掘、可视化、数据安全等关键技术和产品，提前布局自然语言处理、语义理解和机器学习等关键技术。支持国内创新型企业，开发专业化的数据处理分析技术和工具，提供特色化的数据服务。支持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大数据开放实验室，推动多学科交叉融合，开展大数据分析关键算法、关键技术研究 and 大数据专业人才培养，并加强实践应用。

参考文献：

1. 李健、王丽萍、刘瑞：《美国的大数据研发计划及对我国的启示》，《中国科技资源导刊》2013 年第 1 期。
2. 美国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规划数字化的未来：美国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给总统和国会的报告》，2010 年。
3. 王喜文译：《日本政府启动新 ICT 战略研究》，中国经济网，2012 年 6 月 1 日，http://intl.ce.cn/specials/zxgjzh/201206/01/t20120601_23371639.shtml。
4. 安倍内阁：《日本：用大数据创建最尖端 IT 国家》，数据智慧网，2014 年 2 月 12 日，<http://www.datakm.com/trade-news/117.html>。

责任编辑：沈家文、方虹

“中国经济年会（2015—2016）”专题

关于“十三五”经济发展战略问题

宁吉喆

总的来看，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确定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也是中国发展和建设的大目标。“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这五年发展得怎么样，不仅直接决定了中国能否顺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而且关系到中国能否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为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打好基础。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十三五”规划的建议》，明确了下一个五年中国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要求、基本理念、重大举措，特别是创新性地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国家发展改革委认真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按照国务院的要求组织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十三五”规划纲要》。《“十三五”规划建议》和《规划纲要》都体现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体现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面重点就《“十三五”规划建议》中的经济发展战略问题谈几点认识。

第一，今后五年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出，在提高发展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到2020年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按可比价格比2010年翻一番。实现这个目标，“十三五”期间经济年均增速至少要达到6.5%。虽然和以往的增速相比，这个速度在中国是一个中高速，但在世界上无疑是一个高速。中国实现这一目标是有条件、有信心的。

一是和平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中国仍然处在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只要我们敏锐抓住新的机遇，有效应对风险和挑战，就能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二是从经济潜在增长率看，这一增速也符合中国的发展潜力。三是中国仍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重要阶段，生产要素无论是劳动力还是资本都比较充裕，物质基础也比较完备，人力资本和创新资源的优势正在显现，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会释放新的红利。四是中国人口总量仍然是世界第一，2014 年末达到 13.7 亿，市场潜力巨大，消费升级是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源。实现 GDP 和人均收入两个翻番目标，可以说是收入倍增。

第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发展是《“十三五”规划建议》最重要的理念，也是最重要的战略。要推动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向中高端水平迈进，就需要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也需要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投入。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一是要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发挥个人的创新积极性，加快培育创新性的领军企业、领军人物，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健康发展。二是瞄准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前沿，紧扣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在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三是加强技术和知识产权交易平台建设，加快形成有利于创新发展的市场环境、产权制度、投融资体制、分配制度、人才培养引进使用机制。

第三，实施制造强国和产业转型升级战略。创新创业施展才华的主要领域还是在产业，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一是着力构建现代产业新体系。2014 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 36%，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 30%，制造业规模为世界第一。要通过实施“中国制造 2025”和“互联网+”等战略与行动，强化工业发展基础能力，构建智能制造新型制造体系，推进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二是有保有压。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发挥产业政策导向和促进竞争功能，培育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时，更加注重运用市场机制、经济手段、法治办法化解过剩产能，加大政策引导力度，完善企业退出机制。三是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2015 年前三季度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 51.4%。要加快服务业的开放改革，开展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行动，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第四，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城镇化是中国发展的重要引擎，目前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超过 5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还不到 40%，蕴含城乡协调发展的巨大机遇。“十三五”时期，实施新型城镇化有三个重点。一是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实施居住证制度，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等方面的配套政策，加快让更多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享受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二是促进城乡公共资源均

衡配置。健全农村基础设施投入长效机制，把社会事业发展重点放在农村和接纳农业转移人口较多的城镇，促进城乡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统筹，形成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三是有序发展城市群、城市带，有效发挥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各自的作用。

第五，实施区域协调协同发展战略。中国区域发展很不平衡，省市区之间人均 GDP 差距最大的仍然达到四倍，市县之间、乡村之间的差距更大，需要大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拓宽发展空间，增强发展后劲。一方面，统筹推进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即过去我们讲的“四大板块”区域战略，特别是加大对老少边穷地区的支持力度，增强发展的协调性；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建设跟国内区域开放开发相联系，还有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即现在我们讲的区域发展新“三大战略”。要培育壮大一些重点经济区，形成纵向的、横向的经济带，拓展中国经济发展空间。中国是世界上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发展空间、潜力和回旋余地巨大。

第六，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国人均资源相对不足，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较大，可持续发展是我们长期坚持的战略，今后要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坚持绿色富国、绿色惠民，着力改善生态环境。一是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的理念，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自然岸线格局。二是强化约束性指标管理，节能减排指标在中国属于约束性指标。要加快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健全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制度，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减少各类污染排放。三是推动建设低碳循环发展产业体系，环保虽然是要花钱的，但也会催生新的产业、巨大的产业，要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

第七，实施互利共赢的发展战略。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大战略。中国经济融合全球，必须丰富对外开放的内涵，创新开放的方式，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一是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支持沿海地区全面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和竞争，培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先进制造基地和经济区。培育出口竞争优势，实行积极的进口政策。还要完善境内外投资布局，进一步扩大开放领域，放宽准入限制，积极有效引进境外资金和先进技术，同时支持有条件的企业扩大对外投资，推动装备、技术、标准、服务走出去，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物流链。二是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坚持内外统筹，破立结合，完善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三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完善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推进同有关国家和地区多领域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加强能源资源和金融等多领域合作，打造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的全面开放新格局。四是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加

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提高中国在治理体系中的制度性话语权，积极承担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

特别要说明的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实施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战略，都离不开全面深化改革的保障作用。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根本上也要靠改革。“十三五”期间，经济体制改革是重点，要破除一切不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构建发展新体制，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制度保障和持续动力。

（作者为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责任编辑：李 蕊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加快建设国际一流航空企业

——大型客机项目的创新实践

金壮龙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必须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构建产业新体系，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充分发挥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支持 16 个重大科技专项的实施，加快形成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性产品、战略性产业，在“十三五”取得一批丰硕成果。

伴随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发展趋势，综合国力竞争、科技竞争日趋激烈。各国都把创新作为应对科技革命和全球化竞争的国家战略。实践表明，真正的核心技术、关键技术是买不来的，必须依靠自主创新，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掌握一批核心技术，拥有一批自主知识产权，才能大幅度提高国家竞争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坚持以企业创新为主线。企业创新能力是企业提升竞争力、保持

竞争优势的关键。我认为，企业提升创新能力的重点是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体制创新。

中国企业创新发展态势越来越好。一是涌现出一批具有较高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企业。部分行业领军企业达到国际同类先进企业水平，如中国中车集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华为等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型企业迅速崛起。二是以企业为主体承担的一批重大工程取得了重大进展。国家 16 个科技重大专项实施以来，以企业为主体，坚持自主创新，取得了重大突破，成效显著。如载人航天工程（神舟号飞船）、探月工程（嫦娥号）、载人深潜（蛟龙号）等重大项目带动了一批核心关键技术的突破，高速铁路、青藏铁路、三峡工程等重大工程促进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三是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越来越凸显。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初步构建。

与此同时，对标发达国家，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还有较大差距，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一是企业创新能力依然较为薄弱。许多领域缺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依赖进口，受制于人。“中国制造”缺乏“中国设计”“中国创造”的核心竞争优势。二是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亟待加强。高水平人才，特别是能够在关键领域突破关键技术的科技领军人才，相对不足。持续调动科技人员创新热情和创造活力的体制机制有待健全。三是企业创新的主体意识还需强化。企业作为责任主体，在创新思维激发、创新文化培育、创新机制形成、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主动性还不够。四是政府政策引导还需加强。要加快形成政府激励自主创新的政策体系，包括科技投入政策、税收优惠政策、金融服务政策、政府采购政策、知识产权政策、创新人才政策等方面。

发展中国自己的大飞机是国家意志、民族梦想和人民期盼，组建中国商飞公司是中央站在历史和全局的高度，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中国商飞公司是大型飞机重大专项中大型客机项目的实施主体，也是统筹干线飞机和支线飞机发展、实现中国民用飞机产业化的主要载体。公司自 2008 年 5 月 11 日成立以来，牢记使命，攻坚克难，始终把大飞机事业扛在肩上，全身心投入到大飞机事业中。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创新、创业、创造”发展理念，把创新贯穿到大飞机研制全过程。坚持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边规划、边建设、边研制、边引才、边探索，全力推进 ARJ21 新支线飞机、C919 大型客机和中俄远程宽体客机项目研制，加快建设国际一流航空企业新进程，积极探索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新路子，奋力开创民用航空产业创新发展新模式。

第一，创新公司治理结构。公司作为承载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的中央大型企业，在股东构成上率先突破了由国资委单一股东构成模式，开创了由中央与地方、相关行业旗舰

企业共同投资的多元组织模式，建立了主要由外部董事构成的董事会科学决策制度，形成了具有中国商飞特色的科学决策机制，着力构建高效的运行体系和有效的监督体系。公司按照“主业突出、结构清晰、精干高效”的原则，实行“统一经营，两级管理”的母子公司体制，努力发展成为治理结构完善、战略管控有力、资源配置高效、体制机制灵活、基础管理扎实的民机主制造商。设立了股东会、董事会、经营班子，国资委向公司派出监事会，形成了“权责明确、监督健全、有效制衡、协调运行”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和机制。

第二，创新企业管理体系。牢固树立“全球、全程、全员”三大理念和“质量、适航、安全”三大意识，实行“计划、技术、质量、适航、经费、人员”六维管理。创新项目管理体系，推进项目组织变革，建立多型号并举的项目管理体系。适应多品种发展，提升系统管理能力。实施企业资源计划（ERP）管理，推进管理流程和信息化深度融合，打造“以客户为中心，围绕产品实现过程，坚持自主创新，整合全球资源，协同高效运行，持续为利益相关方创造价值”的中国商飞公司（COMAC）管理体系。

第三，创新技术创新体系。以大型客机项目为引领，构建了“以中国商飞公司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政产学研用相结合”的民机技术创新体系。建立了多专业融合、多团队协同、多技术集成的协同科研平台，打造国家大型民用飞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平台。国内 36 所高等院校参与技术攻关和课题研究，有效形成了成果快速转化机制。通过大型客机项目研制，带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群体性突破。C919 大型客机突破了 100 多项关键技术，ARJ21 新支线飞机突破了 130 多项关键技术。

第四，创新产业发展模式。确定了“中国设计、系统集成、全球招标、逐步提升国产化”发展原则，坚持“自主研发、国际合作、国际标准”技术路线，坚持“主制造商—供应商”发展模式，坚持“小核心、大协作”，举全国之力，聚全球之智，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最大限度地聚集和利用国内外资源，着力构建“以中国商飞公司为核心，联合中航工业，辐射全国，面向全球”的中国民机产业体系。加强与国内外供应商、航空公司、金融机构、高校、科研院所等，开展广泛、多元、深远的合作，形成协同研制、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战略联盟，带动中国民机产业发展。目前，国内有 22 个省市、200 多家企业、36 所高校、16 家国际供应商参与了大型客机项目。促成了航电、飞控、电源、燃油和起落架等机载系统的 16 家合资企业，通过技术转移、扩散、溢出，提升中国民用飞机产业配套能级。

第五，其他重点创新。一是凝聚创新人才，打造民机人才高地。大力实施人才强企战略，坚持“依靠人才发展项目，依托项目培养人才”的人才理念，推进“百人计划”

“领军人才工程”“人才集聚工程”和“青年英才工程”。实施面向 70 后、80 后科技骨干和管理骨干的“商飞之星”人才培养行动计划，与通用电气公司合作实施“全球民用航空人才培养计划”。长期聘用海外人才和外国专家 128 人，中央“千人计划”40 人，引进培养飞行员 22 名、试飞工程师 41 名。打造了一支信念坚定、甘于奉献、勇于攻关、敢打硬仗、具有国际视野的民机人才队伍。二是培育创新文化，打造大飞机精神。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和航空报国精神，弘扬“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上海城市精神，认真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培育了“长期奋斗、长期攻关、长期吃苦、长期奉献”的大飞机创业精神。坚持“安、专、迷”，安下心来，专心致志，迷恋大飞机事业。三是研制创新产品，打造自主品牌。坚持“自主研制、国际合作、国际标准”技术路线，全力推进型号研制。ARJ21 新支线飞机于 2002 年立项研制，2008 年成功首飞，2014 年 12 月 30 日获得中国民用航空局型号合格证，2015 年 11 月 29 日正式交付成都航空公司，是中国航线上首次拥有自己的喷气式支线客机。标志着中国走完了喷气式支线客机设计、试制、试验、试飞、取证、生产、交付全过程，具备了喷气式支线客机的研制能力和适航审定能力，为 C919 大型客机和中俄远程宽体客机项目研制打下了坚实基础。C919 大型客机于 2008 年开始研制，2015 年 11 月 2 日实现总装下线，累计订单 514 架。标志着项目研制取得重大进展，在中国民用航空工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未来新型客机项目研制同样取得了重要进展。

大飞机事业是一项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探索性的工程，研制一款国际标准的民用飞机，风险大、任务重、周期长、挑战多，不会一帆风顺，不可能一蹴而就，任重而道远。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型客机项目 and 公司建设发展的重要批示精神，坚持“长期奋斗、长期攻关、长期吃苦、长期奉献”，为进一步提升中国装备制造能力，使自己的大飞机早日翱翔蓝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再作新贡献！

（作者为中国商飞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责任编辑：李 蕊

绿色经济与绿色发展测度

李晓西

绿色发展是人类共同的追求。2015 年 9 月 25 日于纽约，“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正式通过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此议程包括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和 169 项具体指标，围绕社会、经济与环境三大维度，以促进各国转向可持续发展道路。在 17 项发展目标中，与绿色相关的领域包括水、环境卫生、能源、工业、城市、气候、海洋资源、森林、荒漠等。2015 年 11 月 30 日—12 月 11 日，第 21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巴黎举行。本次大会正式通过《巴黎气候协定》，标志人类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努力也即将开启新的征程。会议内容包括：控制目标、检测机制、透明协议、气候资金和自主贡献。习近平主席 11 月 30 日在巴黎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的重要讲话，提出了中国的控制目标。此前，即 2014 年 11 月 12 日，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共同发表《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首次明确了 2020 年后中美的减排目标和时间表，促使这次会议取得了很大的共识。以前，美国拒绝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不愿承担那么多的义务。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绿色发展。2015 年 3 月 2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了绿色化。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就是绿色经济的升级版，体现绿色发展的战略性、紧迫性、实践性。2015 年 4 月 2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文件共 35 条，其中第 10 条提出发展绿色产业，主要是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包括核电、风电、太阳能、有机农业、生态农业、旅游等等。中国为什么发展绿色产业，简要讲，就是中国资源的数量约束与质量约束并存，能源短缺与能耗过高并存，生态环境恶化与治理污染困难并存。经济发展的升级转型，关键是要绿色发展。

绿色经济是机遇，是动能。我们看到，高端现代服务型企业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方向；高新技术产业仍是经济发展支柱；新能源、清洁能源企业将得到大力发展；符合“两化”的低碳型企业将逐渐发展壮大；绿色经济将为以现代农业为主的企业提供新的活力；绿色金融将逐渐兴起；绿色市场的形成将使各地区各城市获得更多投资；绿色发展有助于企业产品突破绿色壁垒参与国际竞争；绿色经济将使各地人民收入水平、生活环境有大的提高！

国际社会在衡量绿色经济方面有了大量成果。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的包容性

财富指数，涉及到设备的很多环保问题；经合组织（OECD）的美好生活指数，涉及到生活、健康、环境；真实进步指数要扣除环境红利；世行“财富核算与生态系统服务评价”，把自然转化为资本来核算；UNEP 的绿色经济指标使用指导，有可操作的文件；OECD 绿色增长指标，指标比较全面；欧洲环境署的 EA 绿色指标，设计了各方面的环境；国际咨询公司开发了全球绿色经济指数，有领导力、政策、清洁技术、可持续发展、旅游业等等；UNEP 还有全球环境展望；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合作的环境绩效指数，专门考虑空气质量、生物多样性、水资源等等；世界经济论坛开发了全球竞争力指数，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包括绿色生物群落、农业用水、二氧化碳排放等等；国际资源小组的生态足迹，衡量在地域空间上有多大生物承载力，耗费了多少资源。为在联合国制定后 2015 规划中提供建议，我也主持完成了《2014 年人类绿色发展指数》，用 12 个基础指标，测度了全球 131 个国家的绿色发展程度。同时有中英文版发布，这项工作得到联合国专家的好评。

如何判断中国各省市的绿色发展？自 2010 年以来，我组织了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和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联合编著《中国绿色发展指数报告——区域比较》，已连续发布了六年，共完成六本中文报告和两本英文报告。此报告研究的初衷是希望在研究及总结国内外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等相关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增长和发展的现实建立起一套绿色发展的监测指标体系和指数测算体系，用以测度中国绿色发展的现状和各地区绿色转型的进展情况。课题组通过研究比对国内外相关理论及指标，在国内 30 余名相关领域资深专家学者的指导和共同修订下，形成了当前中国省际绿色发展指数和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指数两套体系，其中省级指标 60 项，城市指标 44 项。两套指标体系分别从经济增长绿化度、资源环境承载潜力和政府政策支持度三个方面，全面评估中国 30 个省（区、市）及 100 个城市的绿色发展水平。在客观反映定量指标的同时，报告又通过“城市绿色发展公众满意度调查”的形式，向各地公众发起本地绿色发展成效的主观评价定性调查，实现了综合评价系统性与针对性、科学性与可行性的较好平衡，并通过编制各地区“绿色发展体检表”的形式进行分析展示。

2010 年报告荣获第二届“中国软科学奖”；2011 年报告在人民大会堂成功发布，被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多家新闻媒体深度报道，入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 2011 年度“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并由德国斯伯林格（Springer）公司推出英文版；2012 年报告入选“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再次由 Springer 出版社发行英文版。我们将继续这项研究，为中国的绿色发展做出科研人员的贡献。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名誉院长、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李蕊

“十三五”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霍建国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了到 2020 年中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国民经济总量和人均国民收入两项指标要比 2010 年翻一番，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从静态增长的统计测算，要想圆满完成这一任务，“十三五”期间我国的国民经济增幅至少要保证在 6.5% 以上。之所以说任务艰巨，是因为对“十三五”来讲不仅是量的增长问题，我们还面临着众多其它任务需要如期完成，例如我们要彻底解决 7000 万人口的脱贫问题，实现建设美丽中国的美好愿景，兼顾好绿色发展和环境治理的关系等；更为艰巨的是：“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仍将处于十分艰难的阶段，中国的人口红利已接近尾声，我们要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下大力气持续提升劳动者素质，全面提高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在当前国际经济形势日趋复杂，中国经济持续面临下行压力的情况下，要想完成“十三五”的艰巨任务，一是要靠打开国门搞建设新的发展理念，二是要靠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只要我们能按党中央要求把握好新的理念和行动指南，保持政策定力就可以实现“十三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奋斗目标。

一、以打开国门搞建设的新理念赢得“十三五”发展的主动

当前全球经济已进入到金融危机后的调整和修复期，美国经济已呈现复苏迹象，内生驱动明显；欧洲、日本虽不及美国，但主要经济指标亦有所好转，虽制约经济增长的深层次矛盾仍未彻底解决，增长的稳定性还较差，但总体复苏向好的趋势短期内基本不会改变。新兴经济体虽遇到了周期性和结构性矛盾制约，经济增长进入困难阶段，但新兴经济体的潜在增长力和经济增长动能没有变，相信经过适当的调整后仍将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对“十三五”的国内外发展环境再次做出了科学的判断：我国经济发展仍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这是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作出的重要判断，它将有助于我们科学地研判形势、把握发展机遇、坚定发展信心。

党中央强调“十三五”期间要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这既是对“十三五”各方面工

作的原则要求，又是对“十三五”扩大对外开放工作的具体要求。其中涉及到众多的开放内容，需要我们深入地领会和贯彻，包括如何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安排、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加快完善对外开放的战略布局以及如何形成对外开放的新体制。中央明确提出“十三五”期间要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这是对深化对外开放体制改革提出的时间表，在实践中需要我们坚决贯彻落实。

总之，“十三五”规划对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涉及到众多的工作和改革内容。可以肯定，未来五年我国面临的国内外挑战将进一步升级，“十三五”时期对外我们不仅面临着扩大市场开放的压力，还面临着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挑战；对内我们不仅面临着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困难，还将面临着结构性失业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众多改革开放任务需要我们抓紧完成，真可谓时间紧、任务重。我们已没有退路，也别无选择。我们必须坚决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做出积极的调整。我们要只争朝夕，在“十三五”的前两年力争有所突破，这样才可以为“十三五”全面完成各项任务奠定良好的基础。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力争以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的主动，赢得国际经济竞争的主动，赢得“十三五”决胜阶段发展的主动权。

二、要科学把握好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一是新型城镇化建设将带动新的需求。中国的城镇化建设在过去高增长年代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中国已初步解决了交通障碍和大规模住房建设问题，这些良好的基础为我们下一步发展提供了坚强的保证。特别是高铁和高速公路的发展，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地理格局，便捷了人流、物流的通行，大大提高了社会效益。但城市内的公共服务设施、社区服务水平仍有待进一步提升，包括城市居民急需的文化体育设施。在未来的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一方面要完成大都市建设精细化过程，如城市管网建设和棚户区改造，解决配套设施不完善、特别是如何加强社区内部建设配置问题，社区生活服务配套体系等；而中小城镇面临着城市功能扩张，需不断加强商业中心、文化中心的建设，并丰富其内容。城镇化的发展一方面将形成新的投资驱动，另一面将带动居民消费水平的整体提升。随着政府职能转变，政府将进一步加强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资力度，这些都将形成大量新的投资和需求，并将支撑经济的高速增长。二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将形成新的驱动效应。目前国内已初步形成了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区域以及原有的珠江城市群和长江中下游城市群。在“十三五”时期，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力度将进一步加快。据不完全统计，经国务院批准的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已达 20 个左右，这些区域的协同发展将形成不同的增长极，未来的发展模式将打破各城市趋同化的特征，将通过探索新的城

市功能定位，形成相互间的差异性发展，发挥优势互补的作用，全面提高城市的功能和发展环境，使消费者从中受益。这些发展项目都将进一步促进投资并提升服务水平。有些政府主导的公益性投资将有所扩大，包括城际间的交通和商品物流环境将进一步得到改善。三是智能制造和智能家居消费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十三五”将是我国工业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工业 2025 和智能制造已被列入“十三五”发展的专项规划加以推动。机器人制造和生产的自动化将不断升级。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三网融合将有所突破，家庭智能化改造升级将成为新一轮的消费大潮。电视、电脑和家电的一体化，视频和射频技术的普及和应用，移动业务发展水平的提高，5G 技术的普及和应用，在大数据和云计算逐步普及的背景下，家庭生活和消费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其对居民消费的拉动和刺激作用将远远超越移动互联网和手机曾发挥的巨大作用。人们的消费水平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文化、体育、育幼、养老、旅游等服务领域全面提升，餐饮娱乐生活服务将更加便捷，这些自动化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将彻底改变人们的生活，同时也将开辟出新的消费领域。随着消费的升级，各种新型的消费产品将面临开发和突破，制造业面临着不断开发新型消费产品的挑战，如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新消费需求将是制造业面临的艰难任务。最终我们会感觉到不是消费制约了经济发展，而是供给滞后影响了经济的发展，所以加强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不断创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发展环境，将是“十三五”发展的重要内容。

三、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安排将促进国内外资源有效流动

“十三五”我国将面临市场开放和适应新的贸易规则的双重挑战，在市场开放方面，关键是要突破服务业的扩大开放。我们已经同香港和澳门签署了服务业开放的协定，应抓紧各项开放措施的落地、实施，促进国内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提升。同时我们要加快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开放要求，还要抓紧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加快金融、保险和证券业的对外开放等要求。对外开放的关键是要加快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产品清单的管理模式。“十三五”的前两年我们必须在上述开放方面有所突破，才能激发新的市场活力，全面带动服务业升级发展。随着中韩、中澳自贸区的启动，估计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和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明年有望取得重大进展，届时中国将形成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新格局。要求政府有关部门尽快适应市场开放后的事中、事后监管工作，不断提高对开放型经济的监管水平，形成适应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管理模式。我们相信这种开放对内将激活各类企业的发展积极性，促进国内投资和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有利于外国投资者扩大对华投资、繁荣经济发展；对外随着我国市场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我们将

获得更多国家的对等开放安排，这有利于我国企业加快在境外投资和贸易，不断形成更多的有竞争力的中国跨国公司。打开国门搞建设有利于各种资源的有效流动，促进各种生产要素的升级，有利于中国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逐步在国际社会发挥中国的引领和主导作用。中国的跨国公司不仅可以在国际市场上通过竞争做大做强，为中国赢得荣誉和骄傲，同时还可以把海外经营获得的利润输送回国，从而扩大中国的国民收入，为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多做贡献，这不仅可以扩大中国经济总量和竞争力，同时将大大提升中国的影响力，是中国经济崛起的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四、中国经济新的增长动能启动需要一定的外部环境

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原有的增长动能加速衰退，新的增长动能没有完全到位的状态。目前的关键是要调动一切资源全力支持新的增长动能加快发展。如果“十三五”期间新的增长动能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并发挥在支撑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届时我们将摆脱经济增长的被动局面，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新的增长动能的启动需要一个更好的外部环境，这一环境的核心就是公平、法制的营商环境和有利于资源自由流动的发展环境。为此，关键要把握好以下几点：一是用新的经济发展理念来统领经济工作。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正在被人们不断地消化吸收，并加以贯彻落实，这是一种科学的发展理念，只要全国上下特别是政府主管部门都能按照这一理念贯彻执行，中国经济的发展一定会产生新的奇迹，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将会大幅提升。二是继续坚持转变政府职能，减少行政审批，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不断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方面，努力构建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加快形成全国统一的、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这将更加有利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深入发展，进一步激活各类所有制的发展动能，最终形成国企、民营、外资三股力量共同发展的局面。中国经济有可能会再次进入一个新的快速增长阶段，从目前的中低速走向中高速增长，全面完成“十三五”规划所提出的各项任务，为实现中国梦奠定坚实基础。

（作者为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艾 冰

· 新 书 推 介 ·

勾勒发展中的丝路蓝图

——评《中国丝绸之路城市群叙事》

孔 铎

先秦时代,《禹贡》《穆天子传》等典籍在中原大地流行,隐约在历史中窥见一条中原通向西北地区甚至更远地区的商贸路线。公元前 2 世纪张骞出使西域,一条连接东西方的商道正式进入历史舞台。1877 年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将这条沟通东西方的商路称为“丝绸之路”。时光荏苒,这条创造了古代商贸与文化交流奇迹的路线几经兴衰,进入近现代以来沿线开发热情依旧不减。2013 年 9 月 7 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此后“丝绸之路”概念同“海上丝绸之路”成为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合作共赢外交新理念的具体表现,以及应对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等新趋势的重要落脚点。当下,以国内地区为研究对象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多以经济学、管理学为研究方法,对社会、文化、历史因素考量稍浅。而在文化历史研究中,传统的历史学、地理学、艺术学研究和新近的文化遗产、文化产业研究,则有努力将文化与历史有效地整合入现实经济社会发展之中的趋势。

为系统研究国内“丝绸之路”沿线城市的历史与现状、社会与环境等要素,《中国丝绸之路城市群叙事》以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自主提出的“文化城市群”为指导,历史上国内“丝绸之路”沿线的主要城市为考察对象,城市的文化资源、生态结构及其当代发展路径为研究对象,在“丝绸之路”沿线城市形态与演变的历史背景中揭示出文化的地方经验与独特作用,力图生动、客观、全面地展示沿线城市的历史演变。该书每章以具地方性与象征性的人文意象开始,如南阳的佛沟遗址、长安的八百秦腔、于阗的玉雕、阿克苏的摩崖等,继而通过多种学科视角对城市的发展演变兴衰进行了全方位阐释。

一是地理学视角。该书在列举特色人文意象之后即从地形地貌、气候条件等方面给读者展现出每座城市的特殊环境,如南秀北雄依山傍水的天水,湟水流域西海锁钥的西宁,由雪山三面围绕成为“湿岛”的伊宁,“陕甘咽喉”“秦陇锁钥”的会宁等。二是考古

学与城市建设史视野。该书着力展示“丝绸之路”的商贸、文化交流效应和边疆开发建设的军事戍守、农垦活动，如何在沿线城市演变的历史中综合产生特殊经济社会影响，如西凉国国王李暠对酒泉的开发，朱元璋十四子朱模为巩固边疆对兰州城的重塑再造，左宗棠亲笔提名的固原归儒书院等。三是城市大历史之下形成的特殊风俗与传统。书中展示了在数千年商业往来与人口流动的过程中，中华文化是怎样逐渐生根发芽，异质性的文化观念和行为方式又是怎样在各个城市的孕育下逐渐开花结果，形成独特历史文化记忆。如清纪昀在《乌鲁木齐杂诗》中吟咏的屯垦活动，哈密“惟以本地出产甚微，故仅为关内外运输货物经山之路”的特色以及本地高度的民族多样性和混血特征，唐宋时期重镇平凉的回族先民聚居活动，敦煌由单纯军事要塞向综合性古代城市的转变，始于隋唐、鼎盛于明代的临夏茶马互市，南阳汉代画像石中的胡汉交流等。四是审美与文化研究视角。该书将文学家、艺术家与其作品放入“丝绸之路”城市的历史长河中，叙述了经典文学艺术作品在当地生成的鲜活过程与历史效应。如，以爱情为主线，展现各时期社会生活趣味的青海河湟花儿；继承融合了疏勒乐、龟兹乐、于阗乐传统，源于喀什噶尔的维吾尔族民间古典音乐《十二木卡姆》；印度文化、西域文化、中原文化共同孕育成的敦煌壁画艺术；吸收了印度、萨珊波斯、中国、粟特等地艺术特色的于阗画派等。令读者意识到，“丝绸之路”城市所遗留的历史文脉不仅限于有形文化遗产，这一由古代城市文明和当代自发的地方性传承实践所构建的活态文化空间，拥有丰富的多样性文化资产、广受认同的文化意象、兼容并包又平等互惠的思想意识，理应成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开发中西部地区综合活动不可绕过的前提与基石。

该书力图综合把握自然地理、人文社会、历史文脉、民族结构、审美意识及其之间的有机联系，除参照现代各种专业历史文化书籍和资料汇编外，还注意在可行的范围内参照各类史料发掘线索，如地方志《甘州府志》、游记外传《西域闻见录》等文献，以及《外交官夫人的回忆》《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其今昔状况及俄国臣民的地位》等西人记录，力图展示“丝绸之路”城市群的地方历史。写作的过程对作者的综合把握能力构成了相当的考验，加之个别区域和城市历史资料较少，成书不免仓促，但仍可看作为远去的驼铃和即将到来的繁荣争得一份应有的骄傲与自信。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博士）

责任编辑：李蕊

· 权威观点 ·

国际权威机构观点综述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2016 年 2 月以来，国际机构对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形势进行了分析和判断。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对世界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

（一）2016 年全球经济增速可能不会超过 2015 年

2016 年 2 月 18 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中期经济展望预计，2016 年和 2017 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为 3.0% 和 3.3%，比 2015 年 11 月的预测均下调 0.3 个百分点，并认为 2016 年全球经济增速可能不会超过 2015 年。2016 年美国经济增长预计增长 2.0%，比之前预期下调 0.5 个百分点；德国经济增长预期为 1.3%，下调 0.5 个百分点；法国和意大利经济分别增长 1.2% 和 1.0%，分别下调 0.1 个和 0.4 个百分点。低油价对欧元区经济活动的积极影响小于预期，但极低的利率和欧元疲软尚未能促使投资持续增强。受大宗商品出口下跌影响，预测巴西 2016 年经济下降 4.0%，比之前预期下调 2.8 个百分点，成为此次预测中经济表现欠佳的国家。印度 2016 年经济增长预期为 7.4%，上调 0.1 个百分点，成为此次预测中增速最高的国家。

OECD 认为，金融不稳定的风险巨大，最近全球股票和债券价格下跌，新兴市场很容易受到外汇大幅波动的冲击，影响国内资本流动。且当前国际贸易和投资非常疲弱，低需求导致低通胀以及就业和薪资增长不足。OECD 呼吁各国政府动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全方位的政策来刺激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和降低金融风险，建议有财政扩张空间的国家提高基础设施项目的公共投资。

（二）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增加

2016 年 2 月 18 日，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公布了每季一次的 2016 年—2017 年的宏观展

望报告，称全球经济增长前景因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油价暴跌以及一些新兴市场的融资紧缩而遭受重创。2015 年 11 月以来，全球经济增长的风险在增加。

2016 年二十国集团（G20）国家经济增长预期能达到 2015 年的 2.6%，2017 年经济增长率可能稍微超过 2.6%。同时，各国通货膨胀率因货币贬值出现上升，而可以采取的旨在限制经济增长放缓的可用政策空间已经有限。在欧洲和日本，政府债务增长继续限制政府推出财政政策，虽然多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效果已经在接受检验。日本央行在 2016 年 1 月 29 日紧跟欧洲央行的步伐也实行负利率，这被解读成安倍首相的“三箭”程序成功刺激日本经济的机会已经不多。穆迪表示，日本央行的负利率不会成为日本达到 2% 通胀率的灵丹妙药。欧元区无法减少债务意味着破坏性的杠杆负担将继续重创欧元区经济增长。

穆迪还下调了沙特、俄罗斯、巴西和南非的经济增长预测。油价走低和遏制政府债务的财政紧缩对沙特和俄罗斯造成打击，而巴西商业信心已经达到创纪录的低点。此外，资本外流反映出市场对南非政府的信心缺乏，这将打击南非的经济增长。2016 年，巴西和俄罗斯经济增长率将再次下降 3% 和 2.5%，南非经济增长率将下降到零，而沙特经济增长率将下降至 1.5% 左右，创下几十年来的新低。

（三）全球经济复苏“脱轨”风险加剧

2016 年 2 月 24 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全球前景和政策挑战》报告，警告全球经济复苏“脱轨”风险加剧，呼吁各国采取全面措施促进增长并降低风险。经济复苏疲软及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全球经济更容易受到负面冲击，而且在资产价格下挫的背景下，全球经济增长有可能进一步放缓。IMF 将在 2016 年 4 月公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再次调低全球经济增速预期。此前，IMF 在 2016 年 1 月预计 2016 年—2017 年全球经济将分别增长 3.4% 和 3.6%，低于 2015 年 10 月的预测值。

金融市场动荡已导致发达经济体金融条件收紧，如果动荡持续，将进一步拖累经济增长；受发达经济体金融条件收紧影响，新兴经济体面临资本外流、货币贬值和金融环境进一步收紧等压力上升；油价下跌不仅威胁石油出口国经济，还进一步压低了通胀预期，同时低油价对石油进口国经济的刺激不如预期，这也有可能对全球经济带来负面影响。

IMF 呼吁 G20 国家继续推进结构性改革，采取可能的政策工具组合来刺激需求和供给。在低通胀的背景下，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仍需要继续采取宽松货币政策，但同时应该降低对货币政策的过度依赖，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为降低经济和金融市场脆弱性，各国应加强监管，解决企业和银行业面临的风险与脆弱性。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可以帮助应对外部冲击，必要时暂时的汇率市场干预可以防止市场无序波动。IMF 还呼吁加强全

球金融安全网络，以应对大宗商品出口国及脆弱性增强的新兴经济体潜在风险。

（四）花旗调降 2016 年全球经济增长率预估至 2.5%

2016 年 2 月 24 日，花旗经济分析师将 2016 年全球经济增长率预估从 2.7% 调降为 2.5%。分析师指出，由于中国增长数据可能“误测”，且新兴经济体恶化程度或较预期严重，全球经济增长率恐有低于 2% 的风险。同时，全球经济增长前景进一步恶化，除了之前就相当疲弱的新兴市场，发达经济体也普遍退步。预计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将出台更多宽松政策，但“怀疑这只能提供有限的刺激”。英国将就是否续留欧盟举行公投，是“全球近期面临的重大额外风险”。若英国决定“脱欧”，则将对英国和欧盟经济造成伤害。

（五）日本政府下调全球经济形势评估

2016 年 2 月 25 日，日本政府发布当月月度经济报告，称全球经济“可见疲软迹象，但整体上在温和复苏”。报告针对日本国内经济指出，“海外经济不确定性加剧”是今后的担忧因素，并表示新兴市场国家和资源出口国经济减速将给日本经济造成下行压力；就经济现状称，“虽然近期局部也呈现弱势，但仍保持温和复苏的主基调”。对日本经济，报告维持了到上月为止的评估。

有关全球经济，上月的报告中仅指出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呈现疲弱态势，而 2 月报告中做出了修改。关于此前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美国，报告指出，美元走高导致制造业盈利环境恶化，企业部门的一部分存在较弱迹象。同时，下调了对美国与欧元区的评估。

（六）全球经济面临七大风险

2016 年 3 月 2 日，美国知名经济学家、纽约大学教授鲁里埃尔·鲁比尼在 Project - Syndicate 网站撰文，表示全球经济并不是回到 2008 年，也不会回到另一场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但他警告称，最近一连串的金融市场动荡可能仍比 2009 年后任何一次市场波动严重。这是因为，相较最近几年中加剧全球动荡的单一因素——欧元区危机、美联储“削减恐慌”、希腊退欧或者中国经济硬着陆来说，目前全球至少存在七大尾部风险。

第一，外界对中国经济硬着陆存在担忧，这可能对股市产生影响，人民币也存在贬值风险。鲁比尼表示，虽然中国经济更可能波动不稳而不是硬着陆，但由于经济增长持续放缓和资本持续外流，投资者的担忧尚未平息。第二，新兴市场陷入严重困境，它们面临全球范围内的不利因素——中国经济放缓、大宗商品超级周期结束、美联储退出零利率。许多新兴市场宏观经济失衡，比如经常账户和财政双赤字、通胀上升、经济增长放缓。大部分新兴经济体还未实施结构性改革以刺激潜在增长。第三，美联储 2015 年 12 月加息的做法可能是个错误。现在，经济增长疲软、通胀率较低（因为油价进一步下挫）

以及金融环境趋紧（美元走强、股市调整、信用利差增大）都威胁着美国的经济增长和通胀预期。第四，许多地缘政治风险不断升温、一触即发。最近的不确定因素可能是中东地区各大力量之间的长期冷战，尤其是逊尼派的沙特和什叶派的伊朗。第五，油价下跌引发了美国及全球股市下跌，还导致信用利差扩大。由于中国、新兴市场以及美国经济放缓，油价下跌可能更多反映出全球需求疲软，而非供应增加。油价疲弱也冲击了美国能源生产商，它们在美国股市中占有相当大的份额，还可能给能源净出口国的主权债、国有企业以及能源公司带来信用损失和潜在违约风险。第六，全球银行面临收益下降的挑战。影响因素主要有，监管机构自 2008 年以来制定了新的规则，金融技术的兴起威胁到业已受到挑战的商业模式，央行越来越多地使用负利率政策，不良资产信贷损失上升，以及欧洲越来越倾向于让银行债权人在危机发生时“自救”，而不是通过无限制的国家援助资金进行救助。第七，欧盟和欧元区可能成为 2016 年全球金融风暴的中心。欧洲的银行面临挑战，难民危机可能导致申根协定终结，加上其他因素可能导致德国默克尔政府下台。此外，英国退欧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由于希腊政府及其债权人重返冲突边缘，希腊退欧的风险可能重燃。左翼及右翼民粹主义在整个欧洲的力量不断增强。因此，欧盟解体的风险越来越大。更糟糕的是，欧洲的邻居也不安定，战争不仅在中东肆虐，还在乌克兰蔓延。尽管欧洲在乌克兰危机中多次斡旋，但俄罗斯在欧洲边界（从波罗的海到巴尔干半岛）的行动仍变得更加激进。

鲁比尼总结说，过去尾部风险更多的是偶然情况，经济增长恐慌最终证明也只是恐慌。政策反应强烈有效，能使风险规避持续的时间短，能让资产价格恢复到以前的高点（如果不是让它们更高的话）。而现在，全球却存在这七大尾部风险源头。与过去不同，这些风险中的一些可能会反复爆发，从而使风险资产在今年剩余的时间里表现很差，也将使全球经济继续疲弱。

二、对中国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

（一）IMF 赞赏中国经济调控措施

2016 年 2 月 23 日，IMF 总裁拉加德在迪拜表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积极和健康的，她赞赏中国对宏观经济的有效调控。

拉加德当天出席一个国际论坛发表讲话，在谈及中国经济时，表示不相信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会发生经济硬着陆，因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很大程度上是主观推动和健康的。中国政府着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大规模粗放型生产转向高附加值生产，从投资拉动转向消费驱动，减少对重型制造业和出口的依赖，是一种巨大转变。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也是中国的一种调控方法，中国政府正在积极有效地完善这一机制。

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模式对矿石等原材料的进口产生一些冲击，但对石油进口的影响不大，而且实际需求在增加。

（二）中国面临沉重的结构性改革任务

2016 年 2 月 26 日，IMF 总裁拉加德表示，中国面临沉重的结构性改革任务，预计 2016 年中国经济增长 6.3%。中国资本外流给全球经济带来风险，虽然基本面因素令紧张情绪加剧，但市场反应过度。IMF 强烈建议中国把增长目标设在 6%~6.5%。

（三）穆迪下调中国评级展望

2016 年 3 月 2 日，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将中国政府信用评级展望从稳定调整为负面，凸显出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面临的挑战。穆迪调整评级展望的理由是，中国政府债务不断增加且外汇储备持续减少。但穆迪确认了中国长期债务 Aa3 评级，理由是中国的财政实力和外汇储备依然强劲。但如果发现中国放慢了旨在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和政府财政稳健的改革步伐，可能下调中国评级。

2015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 6.9%，为 25 年来最慢增速，证实了持续数年的经济放缓正在更猛烈地冲击中国经济，而且没有多少改善迹象。中国政府债务正在大幅增加。据估计，到 2015 年末，中国政府债务占 GDP 的比重已从 2012 年的 32.5% 上升至 40.6%，预计到 2017 年将进一步升至 43.0%。

穆迪还表示，将中国评级展望调整为负面是因为资本外流导致中国的外汇储备持续减少，资本外流凸显了中国的政策、汇率和经济增长风险。在过去 18 个月中，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大幅下滑，2016 年 1 月已降至 3.2 万亿美元，比 2014 年 6 月创出的高点减少 7620 亿美元。中国政府实施经济改革的能力也存在不确定性，而这些改革旨在解决中国经济的失衡问题。

（四）中国经济增长前景趋稳

2016 年 3 月 8 日，OECD 发布 2016 年 1 月先行指标显示，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将在未来出现降温，而中国经济增长前景趋稳。OECD 先行指标在 1 月下降至 99.6，低于上年 12 月的 99.7；中国先行指标在 1 月下降至 97.6，低于上年 12 月的 97.7。在其主要监测地区中，34 个发达成员国显示出“经济放缓的迹象”，但中国经济出现企稳的初步迹象。

责任编辑：李蕊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一、世界经济

表 1 世界经济增长率(上年=100)

单位:%				
	2014 年	2015 年 预测值	2016 年 预测值	2017 年 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6 年 1 月)				
世 界	3.4	3.1	3.4	3.6
发达国家	1.8	1.9	2.1	2.1
美 国	2.2	2.5	2.6	2.6
欧元区	0.9	1.5	1.7	1.7
日 本	0.0	0.6	1.0	0.3
发展中国家	4.6	4.0	4.3	4.7
印 度	7.3	7.3	7.5	7.5
俄罗斯	0.6	-3.7	-1.0	1.0
巴 西	0.1	-3.8	-3.5	0.0
世界银行(2016 年 1 月)				
世 界	2.6	2.4	2.9	3.1
发达国家	1.7	1.6	2.1	2.1
发展中国家	4.9	4.3	4.8	5.3
英国共识公司(2016 年 3 月)				
世 界	2.8	2.5	2.5	2.9
美 国	2.4	2.4	2.1	2.4
欧元区	0.9	1.5	1.5	1.6
日 本	-0.1	0.4	0.7	0.6
印 度	7.3	7.5	7.6	7.7

注: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世界及分类数据按照购买力平价方法进行汇总,世界银行和英国共识公司按汇率法进行汇总。2. 印度数据指财政年度。2014 年度数据为印度官方大幅上修后数据,而 2015 年及 2016 年数据系参照官方修订后数据的预测结果。3. 各经济体 2014 年数据已据其官方发布结果作了调整。

表 2 世界贸易量增长率(上年=100)

单位:%				
	2014 年	2015 年 预测值	2016 年 预测值	2017 年 预测值
世 界	3.4	2.6	3.4	4.1
进口				
发达国家	3.4	4.0	3.7	4.1
发展中国家	3.7	0.4	3.4	4.3
出口				
发达国家	3.4	3.1	3.4	
发展中国家	2.9	3.9	4.8	

注:包括货物和服务。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16 年 1 月预测,其中出口数据为 2015 年 10 月份预测。

表 3 消费者价格涨跌率(上年=100)

单位:%				
	2014 年	2015 年 预测值	2016 年 预测值	2017 年 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6 年 1 月)				
发达国家	1.4	1.4	0.3	1.2
发展中国家	5.9	5.1	5.6	5.1
英国共识公司(2016 年 3 月)				
世 界	2.6	2.1	2.5	2.8
美 国	1.6	0.1	1.3	2.2
欧元区	0.4	0.0	0.3	1.4
日 本	2.7	0.8	0.0	1.6
印 度	6.0	5.0	5.3	5.3

注:1. 印度来源于英国共识公司的数据指财政年度。2. 各经济体 2014 年数据已据其官方发布结果作了调整。

表 4 消费者价格同比上涨率

单位:%

年份	月份	世 界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2015 年		1.9	0.9	4.3
	1 月	1.7	0.8	3.8
	2 月	1.9	0.9	4.1
	3 月	2.0	1.0	4.2
	4 月	1.8	0.8	4.3
	5 月	1.9	0.9	4.3
	6 月	1.9	0.9	4.3
	7 月	1.9	0.9	4.1
	8 月	1.9	0.9	4.3
	9 月	1.8	0.7	4.3
	10 月	1.9	0.9	4.3
	11 月	2.1	1.0	4.6
	12 月	2.2	1.1	4.8
2016 年				
	1 月	2.4	1.2	5.1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表 5 工业生产

年份	月份	工业生产指数 同比增长率(%)			JP 摩根全球制造业 采购经理人指数		
		世界	发达 国家	发展中 国家	全球 PMI	产出 指数	新订单 指数
2015 年							
	2 月	2.5	1.4	4.1	51.8	53.2	52.2
	3 月	2.5	1.5	4.1	51.5	53.1	51.9
	4 月	1.9	1.1	4.1	50.8	51.6	50.8
	5 月	1.9	0.7	3.7	51.1	51.7	51.2
	6 月	2.5	1.3	4.5	50.9	51.2	51.2
	7 月	2.5	0.8	3.7	50.8	51.3	51.0
	8 月	2.5	1.4	4.2	50.4	50.6	51.0
	9 月	1.9	1.0	3.2	50.4	50.5	50.9
	10 月	2.5	1.1	3.8	51.1	51.6	51.7
	11 月	1.9	0.6	3.3	51.0	52.2	51.2
	12 月	1.2	-0.8	3.3	50.7	51.5	50.8
2016 年							
	1 月	1.9	0.5	3.6	50.9	51.5	51.4
	2 月				50.0	50.2	50.4

注:1. 工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率为经季节调整的数据。2. 采购经理人指数超过 50 预示着经济扩张期。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美国供应管理协会。

二、美国经济

表 6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2014 年		2.4	2.7	-0.6
	1 季度	-0.9	1.3	0.0
	2 季度	4.6	3.8	1.2
	3 季度	4.3	3.5	1.8
2015 年	4 季度	2.1	4.3	-1.4
		2.4	3.1	0.7
	1 季度	0.6	1.8	-0.1
	2 季度	3.9	3.6	2.6
	3 季度	2.0	3.0	1.8
	4 季度	1.4	2.4	0.1

表 7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4 年		5.3	3.4	3.8
	1 季度	6.0	-6.7	2.8
	2 季度	5.6	9.8	9.6
	3 季度	7.9	1.8	-0.8
2015 年	4 季度	2.5	5.4	10.3
		4.0	1.1	4.9
	1 季度	3.3	-6.0	7.1
	2 季度	5.2	5.1	3.0
	3 季度	3.7	0.7	2.3
	4 季度	0.4	-2.0	-0.7

注:季度数据按季节因素调整、折年率计算(表 6、表 7)。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表 6、表 7)。

表 8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2014 年		2.4	2.7	-0.6
	1 季度	1.7	2.0	-1.8
	2 季度	2.6	2.6	-1.0
	3 季度	2.9	3.0	0.0
2015 年	4 季度	2.5	3.2	0.4
		2.4	3.1	0.7
	1 季度	2.9	3.3	0.4
	2 季度	2.7	3.3	0.7
	3 季度	2.1	3.1	0.7
	4 季度	2.0	2.7	1.1

表 9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表 11 进出口贸易											
单位:%					单位:亿美元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年份	出口额		环比增长 (%)	同比增长 (%)	进口额		环比增长 (%)	同比增长 (%)	出口额减进口额
2014 年		5.3	3.4		3.8		2015 年	22236.2			-5.1	27633.7			-3.1	-5397.6
	1 季度	4.4	3.1		2.9		1 月	1890.0	-3.1	-2.0		2326.0	-3.3	0.1	-436.0	
	2 季度	5.1	4.3		3.9		2 月	1858.7	-1.7	-1.9		2244.2	-3.5	-3.4	-385.5	
	3 季度	6.1	3.7		3.1		3 月	1867.4	0.5	-4.1		2389.2	6.5	0.4	-521.8	
	4 季度	5.5	2.4		5.4		4 月	1884.1	0.9	-3.4		2317.9	-3.0	-3.1	-433.8	
2015 年		4.0	1.1		4.9		5 月	1870.7	-0.7	-5.2		2305.2	-0.5	-3.7	-434.6	
	1 季度	4.8	2.6		6.5		6 月	1869.1	-0.1	-4.4		2331.8	1.2	-2.0	-462.7	
	2 季度	4.7	1.5		4.8		7 月	1872.0	0.2	-4.9		2309.1	-1.0	-3.1	-437.1	
	3 季度	3.6	1.2		5.6		8 月	1828.1	-2.3	-7.3		2333.5	1.1	-2.2	-505.4	
	4 季度	3.1	-0.6		2.9		9 月	1852.9	1.4	-5.0		2296.1	-1.6	-3.6	-443.2	
注:季度数据按季节因素调整(表 8、表 9)。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表 8、表 9)。																
表 10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失业率	非农雇员人数环比增加(万人)											
		环比折年率	同比													
2015 年		0.6		5.3	290.7											
	2 月			5.5	26.5											
	3 月	-1.1	0.6	5.5	8.4											
	4 月			5.4	25.1											
	5 月			5.5	27.3											
	6 月	3.5	0.8	5.3	22.8											
	7 月			5.3	27.7											
	8 月			5.1	15.0											
	9 月	2.1	0.6	5.1	14.9											
	10 月			5.0	29.5											
	11 月			5.0	28.0											
	12 月	-3.0	0.3	5.0	27.1											
2016 年																
	1 月			4.9	17.2											
	2 月			4.9	24.2											
注:除年度数据以外,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该月份所在季度的增长率。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																

年份	出口额	环比增长 (%)	同比增长 (%)	进口额	环比增长 (%)	同比增长 (%)	出口额减进口额
2015 年	22236.2	-5.1		27633.7	-3.1		-5397.6
1 月	1890.0	-3.1	-2.0	2326.0	-3.3	0.1	-436.0
2 月	1858.7	-1.7	-1.9	2244.2	-3.5	-3.4	-385.5
3 月	1867.4	0.5	-4.1	2389.2	6.5	0.4	-521.8
4 月	1884.1	0.9	-3.4	2317.9	-3.0	-3.1	-433.8
5 月	1870.7	-0.7	-5.2	2305.2	-0.5	-3.7	-434.6
6 月	1869.1	-0.1	-4.4	2331.8	1.2	-2.0	-462.7
7 月	1872.0	0.2	-4.9	2309.1	-1.0	-3.1	-437.1
8 月	1828.1	-2.3	-7.3	2333.5	1.1	-2.2	-505.4
9 月	1852.9	1.4	-5.0	2296.1	-1.6	-3.6	-443.2
10 月	1831.5	-1.2	-7.4	2286.3	-0.4	-4.9	-454.8
11 月	1809.0	-1.2	-7.8	2244.7	-1.8	-5.0	-435.7
12 月	1802.8	-0.3	-7.5	2249.8	0.2	-6.5	-447.0
2016 年							
1 月	1764.6	-2.1	-6.6	2221.3	-1.3	-4.5	-456.8
注:包括货物和服务贸易。因季节调整,各月合计数据不等于全年总计数据。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普查局。							
表 12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亿美元							
年份	季度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4 年		1066.1		3165.5		-2099.4	
	1 季度	-1034.7		577.7		-1612.3	
	2 季度	653.2		771.3		-118.2	
	3 季度	955.9		969.7		-13.7	
	4 季度	491.7		846.8		-355.1	
2015 年		3798.9		2999.7		799.2	
	1 季度	1983.2		774.9		1208.3	
	2 季度	893.9		855.5		38.4	
	3 季度	417.0		689.7		-272.7	
	4 季度	504.8		679.6		-174.8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三、欧元区经济

表 13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2014 年		0.9	0.7	0.9
	1 季度	0.2	0.0	0.2
	2 季度	0.1	0.2	0.2
	3 季度	0.3	0.4	0.3
	4 季度	0.4	0.5	0.2
2015 年		1.6	1.7	1.3
	1 季度	0.6	0.5	0.5
	2 季度	0.4	0.3	0.3
	3 季度	0.3	0.5	0.3
	4 季度	0.3	0.2	0.6

表 14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4 年		1.3	4.1	4.5
	1 季度	0.4	0.8	1.2
	2 季度	-0.5	1.0	1.1
	3 季度	0.4	1.6	1.5
	4 季度	0.6	1.2	1.2
2015 年		2.7	5.0	5.7
	1 季度	1.4	1.4	2.1
	2 季度	0.1	1.7	1.0
	3 季度	0.4	0.2	1.2
	4 季度	1.3	0.2	0.9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13、表 14)。

表 15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就业人数环比增加(万人)	失业率
		环比	同比		
2015 年		0.5		181.2	10.9
	1 月				11.3
	2 月				11.2
	3 月	-1.8	0.4	30.5	11.2
	4 月				11.1
	5 月				11.0
	6 月	1.1	0.7	57.3	11.0
	7 月				10.8
	8 月				10.7
	9 月	-0.5	0.6	46.2	10.6
	10 月				10.6
	11 月				10.5
	12 月	1.9	0.4	47.2	10.4
2016 年	1 月				10.3

注:除年度数据以外,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该月份所在季度增长率;就业人数为该月份所在季度的环比变化。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统计月报、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 16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私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2014 年		0.9	0.7	0.9
	1 季度	1.1	0.6	0.7
	2 季度	0.7	0.6	0.8
	3 季度	0.8	0.8	0.9
	4 季度	0.9	1.1	1.0
2015 年		1.6	1.7	1.3
	1 季度	1.3	1.6	1.1
	2 季度	1.6	1.7	1.2
	3 季度	1.6	1.8	1.2
	4 季度	1.6	1.5	1.6

表 17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4 年		1.3	4.1	4.5
	1 季度	2.5	3.7	4.2
	2 季度	1.2	3.4	4.2
	3 季度	0.7	4.6	4.4
	4 季度	0.9	4.7	5.1
2015 年		2.7	5.0	5.7
	1 季度	2.0	5.3	6.0
	2 季度	2.6	6.0	5.8
	3 季度	2.5	4.6	5.5
	4 季度	3.4	3.6	5.2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16、表 17)。

表 18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欧元

年份	出口额	环比增长	同比增长	进口额	环比增长	同比增长	出口额减进口额
月份		(%)	(%)		(%)	(%)	
2015 年	20406		5.4	17932		2.3	2475
	1 月	1654	-1.4	1446	-0.5	5.3	208
	2 月	1722	4.1	1490	3.0	1.1	232
	3 月	1726	0.2	1551	4.1	9.8	175
	4 月	1714	-0.7	1519	-2.0	5.6	195
	5 月	1705	-0.5	1493	-1.7	0.1	212
	6 月	1719	0.8	1526	2.2	6.8	194
	7 月	1730	0.6	1504	-1.4	0.5	226
	8 月	1666	-3.7	1473	-2.1	2.6	194
	9 月	1677	0.7	1481	0.6	-0.7	196
	10 月	1681	0.2	1487	0.4	-0.6	195
	11 月	1704	1.3	1481	-0.4	4.2	223
	12 月	1707	0.2	1482	0.0	3.4	225
2016 年							
	1 月	1674	-1.9	1462	-1.3	1.3	212

注:欧元区绝对数指欧元区现有范围,即 19 个成员国。贸易额不包括欧元区各成员国相互之间的贸易额,为经季节调整后的数据。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 19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亿欧元				
年度	月度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5 年		1718.0	1437.0	236.0
	1 月	77.0	136.0	-59.0
	2 月	331.0	348.0	-17.0
	3 月	234.0	-214.0	448.0
	4 月	287.0	163.0	124.0
	5 月	132.0	311.0	-179.0
	6 月	161.0	172.0	-11.0
	7 月	-72.0	230.0	-302.0
	8 月	-28.0	3.0	-32.0
	9 月	597.0	298.0	299.0
	10 月	426.0	405.0	21.0
	11 月	-450.0	-490.0	-4.0
12 月	23.0	75.0	-52.0	
2016 年	1 月	-81.0	75.0	-157.0

注:欧元区绝对数指欧元区现有范围,即 19 个成员国。欧元区外国直接投资额不包括欧元区各成员国相互之间的直接投资额。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统计月报。

四、日本经济

表 20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民间最终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消费支出
2014 年		0.0	-0.9	0.1
	1 季度	1.2	2.3	-0.2
	2 季度	-2.0	-5.0	-0.2
	3 季度	-0.6	0.0	0.3
	4 季度	0.6	0.6	0.3
2015 年		0.4	-1.2	1.1
	1 季度	1.0	0.2	0.2
	2 季度	-0.3	-0.8	0.5
	3 季度	0.3	0.4	0.2
	4 季度	-0.4	-0.8	0.5

表 21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 口	进 口
2014 年		1.3	8.3	7.2
	1 季度	2.7	6.0	6.1
	2 季度	-4.7	0.1	-4.3
	3 季度	-0.9	1.5	0.6
	4 季度	0.1	3.2	1.1
2015 年		0.0	2.7	0.2
	1 季度	1.4	2.1	1.9
	2 季度	0.3	-4.6	-2.6
	3 季度	0.2	2.6	1.3
	4 季度	0.1	-0.9	-1.4

表 22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民间最终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消费支出
2014 年		0.0	-0.9	0.1
	1 季度	2.7	3.9	0.6
	2 季度	-0.3	-2.5	-0.3
	3 季度	-1.5	-2.7	-0.2
	4 季度	-1.0	-2.1	0.3
2015 年		0.4	-1.2	1.1
	1 季度	-1.0	-4.2	0.6
	2 季度	0.7	0.1	1.3
	3 季度	1.7	0.4	1.2
	4 季度	0.5	-1.1	1.4

表 23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 口	进 口
2014 年		1.3	8.3	7.2
	1 季度	9.1	9.1	14.8
	2 季度	0.6	5.5	5.9
	3 季度	-2.1	7.5	5.0
	4 季度	-3.1	11.2	3.5
2015 年		0.0	2.7	0.2
	1 季度	-3.9	7.1	-0.7
	2 季度	0.6	1.8	0.7
	3 季度	2.1	3.0	1.5
	4 季度	1.9	-0.8	-0.7

资料来源:日本内阁府(表 20~表 23)。

表 24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度	月份	劳动生产率 同比增长率	新增就业与申请 就业人数之比	失业率
2015 年		-1.4	1.80	3.4
	2 月	-2.2	1.70	3.5
	3 月	-3.2	1.74	3.4
	4 月	-2.5	1.77	3.3
	5 月	-2.1	1.78	3.3
	6 月	1.6	1.79	3.4
	7 月	-1.1	1.82	3.3
	8 月	-2.6	1.84	3.4
	9 月	-2.2	1.83	3.4
	10 月	0.6	1.86	3.1
	11 月	0.4	1.90	3.3
	12 月	-2.6	1.90	3.3
2016 年	1 月	-3.6	2.07	3.2
	2 月		1.92	3.3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和日本央行统计月报。

表 25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日元

年份	出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进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出口额 减进 口额
月份							
2015 年	756322		3.5	784676		-8.7	-28353
2 月	62490	-7.1	2.4	69275	-2.1	-3.6	-6785
3 月	64783	3.7	8.5	65705	-5.2	-14.5	-922
4 月	63555	-1.9	8.0	66186	0.7	-4.2	-2631
5 月	61402	-3.4	2.4	63538	-4.0	-8.7	-2136
6 月	64052	4.3	9.5	66558	4.8	-2.9	-2505
7 月	63561	-0.8	7.6	66620	0.1	-3.2	-3058
8 月	62967	-0.9	3.1	65875	-1.1	-3.1	-2909
9 月	61885	-1.7	0.6	64500	-2.1	-11.1	-2616
10 月	61895	0.0	-2.1	63472	-1.6	-13.4	-1577
11 月	62363	0.8	-3.3	62006	-2.3	-10.2	357
12 月	59782	-4.1	-8.0	59460	-4.1	-18.0	322
2016 年							
1 月	59955	0.3	-12.9	59223	-0.4	-18.0	732
2 月	58540	-2.4	-4.0	56880	-4.0	-14.2	1661

注:月度贸易额为季节调整后数据。

资料来源:日本财务省。

表 26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亿日元

年份	月份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5 年		-510	159884	-160394
	1 月	-650	12385	-13035
	2 月	1163	13941	-12778
	3 月	2968	10774	-7806
	4 月	-748	9968	-10716
	5 月	1067	23576	-22509
	6 月	-684	6344	-7028
	7 月	-4479	12516	-16995
	8 月	-931	13598	-14529
	9 月	-1933	12313	-14246
	10 月	844	16619	-15775
	11 月	1344	13503	-12159
	12 月	1529	14349	-12820
2016 年				
	1 月	-483	10225	-10708

资料来源:日本财务省。

五、其他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

表 27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加拿大	英国	南非	巴西	印度	俄罗斯
2014 年		2.5	2.9	1.5	0.1	7.3	0.6
	1 季度	0.5	2.8	1.9	3.2	6.7	0.6
	2 季度	3.7	3.0	1.3	-0.9	7.5	0.7
	3 季度	2.1	2.8	1.6	-1.1	8.3	0.9
	4 季度	3.4	2.8	1.4	-0.7	6.6	0.4
2015 年		1.2	2.2	1.3	-3.8	7.5	-3.7
	1 季度	-0.9	2.6	2.2	-2.0	7.5	-2.2
	2 季度	-0.4	2.4	1.3	-2.9	7.6	-4.6
	3 季度	2.4	2.1	1.0	-4.5	7.7	-4.1
	4 季度	0.8	1.9	0.6	-5.9	7.3	-3.8

注:印度年度 GDP 增长率为财年增长率。

表 28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韩国	墨西哥	中国 香港	中国 台湾	马来 西亚	印度尼 西亚
2014 年		3.3	2.1	2.6	3.8	6.0	5.0
	1 季度	3.9	2.3	2.7	3.7	6.3	5.1
	2 季度	3.4	1.8	2.1	4.2	6.5	5.0
	3 季度	3.3	2.3	3.1	4.3	5.6	4.9
	4 季度	2.7	2.6	2.5	3.6	5.7	5.0
2015 年		2.6	2.5	2.4	0.7	5.0	4.8
	1 季度	2.5	2.5	2.4	4.0	5.6	4.7
	2 季度	2.2	2.3	2.9	0.6	4.9	4.7
	3 季度	2.7	2.8	2.2	-0.8	4.7	4.7
	4 季度	3.1	2.5	1.9	-0.5	4.5	5.0

资料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

表 29 劳动力市场失业率

单位:%

年份	月份	加拿大	英国	巴西	俄罗斯	南非
2015 年		6.9	5.4	6.8	5.6	25.4
	2 月	0.3	0.3	-0.3	-9.3	4.8
	3 月	-0.7	1.4	4.0	-3.3	2.5
	4 月	-3.1	1.1	-2.3	-7.9	3.0
	5 月	-3.8	1.5	-1.8	-8.9	2.5
	6 月	-3.1	1.5	-0.7	-5.1	4.2
	7 月	-0.8	0.6	5.2	-7.9	4.3
	8 月	1.8	1.6	-0.4	-9.1	6.3
	9 月	-2.4	1.4	1.3	-10.5	3.7
	10 月	-3.0	1.7	-2.3	-11.4	9.9
	11 月	-2.0	0.9	-1.2	-13.0	-3.4
	12 月	-2.2	-0.1	0.5	-11.4	-1.3
2016 年						
	1 月		0.2	-2.5	-11.3	-1.5
	2 月					

表 30 劳动力市场失业率

单位:%

年份	月份	韩国	墨西哥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马来西亚
2015 年		3.6	4.4	3.3	3.8	3.1
	2 月	-5.0	2.0		2.7	5.2
	3 月	0.1	1.9	-1.5	6.7	6.9
	4 月	-2.6	1.6		1.3	4.0
	5 月	-3.0	-0.9		-3.5	4.5
	6 月	1.6	1.3	-1.2	-1.2	4.3
	7 月	-3.4	1.0		-2.8	6.1
	8 月	0.2	1.2		-5.9	2.3
	9 月	3.0	1.8	-2.1	-5.6	5.1
	10 月	2.1	0.4		-6.3	4.2
	11 月	-0.2	0.2		-4.8	1.9
	12 月	-2.1	0.0	-1.1	-5.8	2.7
2016 年						
	1 月	-2.2	1.1		-6.0	3.3
	2 月	2.4			-3.6	

注:1.英国和中国香港月度数据为截至当月的 3 个月移动平均失业率。2.加拿大、英国、韩国和中国香港为经季节因素调整后的失业率。

资料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

表 31 进出口贸易							表 34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加 拿 大			英 国			年份 月份	韩 国			墨西哥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5 年	4084.8	4192.5	-107.7	4596.6	6258.3	-1661.7	2015 年	5267.6	4365.0	902.6	3807.7	4052.8	-245.1
1 月	348.3	332.0	16.3	346.7	510.3	-163.6	2 月	414.8	400.0	14.8	297.2	298.7	-1.6
2 月	318.3	323.1	-4.7	346.6	526.6	-180.0	3 月	468.2	384.9	83.4	341.3	345.1	-3.7
3 月	359.2	377.1	-17.9	419.0	544.9	-126.0	4 月	462.2	378.6	83.6	329.5	338.9	-9.3
4 月	338.9	367.5	-28.7	386.1	498.0	-111.9	5 月	423.3	360.4	62.9	313.4	331.8	-18.4
5 月	338.5	366.1	-27.5	397.6	505.6	-108.0	6 月	465.6	366.0	99.6	338.4	354.7	-16.3
6 月	369.9	374.3	-4.4	401.4	546.1	-144.7	7 月	457.0	386.5	70.5	328.0	359.6	-31.6
7 月	339.0	349.9	-10.9	379.9	546.3	-166.3	8 月	391.1	347.7	43.4	310.5	338.3	-27.8
8 月	335.8	348.7	-13.0	363.4	472.3	-108.9	9 月	434.3	345.4	89.0	322.4	336.6	-14.2
9 月	344.7	348.0	-3.2	393.2	534.5	-141.3	10 月	433.5	367.6	65.9	341.6	356.0	-14.4
10 月	335.6	353.2	-17.7	380.1	574.0	-193.9	11 月	442.9	340.5	102.4	310.3	325.9	-15.7
11 月	322.3	334.2	-11.9	377.9	432.2	-54.3	12 月	423.8	354.6	69.2	309.6	318.9	-9.3
12 月	334.2	318.5	15.7	405.0	467.5	-62.6	2016 年	365.8	314.1	51.8	245.4	279.8	-34.4
2016 年							1 月	364.1	290.2	73.9	290.3	197.5	92.8
1 月	305.0	292.9	12.2	314.4	451.5	-137.1	表 35 进出口贸易						
注:加拿大和英国数据经过季节因素调整。							单位:亿美元						
表 32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南 非			巴 西			年份 月份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5 年	81.5	85.7	-4.1	1911.3	1788.0	123.4	2015 年	5106.0	5594.3	-488.3	2804.8	2289.2	515.6
2 月	67.2	73.7	-6.5	120.9	156.1	-35.2	2 月	327.8	380.1	-52.2	198.6	153.0	45.6
3 月	76.5	75.3	1.2	169.8	172.6	-2.8	3 月	416.2	470.8	-54.6	252.7	212.1	40.7
4 月	69.8	71.8	-2.0	151.6	153.2	-1.6	4 月	401.4	457.1	-55.8	234.9	187.4	47.5
5 月	73.8	70.1	3.7	167.7	146.3	21.4	5 月	408.5	444.4	-35.9	256.3	202.1	54.2
6 月	73.0	68.7	4.4	196.3	157.4	38.8	6 月	407.4	465.6	-58.2	230.7	208.8	21.9
7 月	74.3	75.6	-1.3	185.3	167.6	17.7	7 月	453.2	475.9	-22.8	235.5	199.1	36.3
8 月	67.5	75.5	-8.0	154.9	133.1	21.8	8 月	426.6	456.0	-29.4	239.3	199.6	39.7
9 月	67.0	68.4	-1.4	161.5	137.6	23.9	9 月	453.5	492.6	-39.1	225.4	173.1	52.3
10 月	63.1	79.5	-16.4	160.5	146.3	14.2	10 月	450.1	485.9	-35.8	239.4	178.1	61.3
11 月	66.0	65.8	0.2	138.1	131.7	6.4	11 月	454.6	480.9	-26.4	221.3	193.8	27.5
12 月	58.8	53.7	5.0	167.8	109.9	57.9	12 月	468.8	500.8	-32.0	220.6	178.9	41.7
2016 年							2016 年	406.4	425.0	-18.6	222.0	186.9	35.1
1 月	43.7	54.6	-10.9	112.5	107.6	4.9	2 月				177.8	136.3	41.5
2 月				133.5	107.4	26.1	表 36 进出口贸易						
表 33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印 度			俄罗斯			年份 月份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5 年	2666.6	3717.7	-1051.1	3403.5	1940.9	1462.6	2015 年	199.9	176.0	23.9	1503.4	1427.3	76.1
2 月	218.7	282.8	-64.1	293.0	154.9	138.1	2 月	148.0	135.3	12.7	121.7	115.1	6.6
3 月	238.9	357.0	-118.2	326.3	171.7	154.6	3 月	180.6	159.3	21.3	136.3	126.1	10.3
4 月	220.9	329.7	-108.8	305.5	162.8	142.7	4 月	166.1	147.2	18.9	130.8	126.3	4.6
5 月	222.6	326.9	-104.3	305.8	154.0	151.8	5 月	167.8	152.5	15.3	126.9	116.1	10.8
6 月	222.9	331.2	-108.3	300.1	163.2	136.9	6 月	171.9	150.5	21.3	135.1	129.8	5.3
7 月	231.4	359.5	-128.1	276.6	168.6	107.9	7 月	166.3	160.1	6.2	114.7	100.8	13.9
8 月	212.7	337.4	-124.8	253.1	163.5	89.6	8 月	163.8	138.8	25.0	127.3	124.0	3.3
9 月	218.4	323.2	-104.8	263.7	168.9	94.8	9 月	162.7	140.3	22.5	125.9	115.6	10.3
10 月	213.5	311.2	-97.7	272.4	171.7	100.6	10 月	177.6	149.1	28.5	121.2	111.1	10.1
11 月	200.0	298.0	-98.0	255.3	164.2	91.1	11 月	157.0	133.2	23.8	111.1	115.2	-4.1
12 月	223.0	339.6	-116.6	284.2	174.4	109.8	12 月	159.5	140.3	19.3	119.2	120.8	-1.6
2016 年							1 月	177.5	152.5	25.0	133.6	126.1	7.4
1 月	210.8	287.1	-76.4	176.3	97.3	78.9	2016 年	142.3	129.9	12.4	104.8	104.7	0.1
2 月	207.4	272.8	-65.4				1 月				113.0	101.6	11.4
							2 月						

资料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网站(表 27~表 36)。

六、三大经济体指标对比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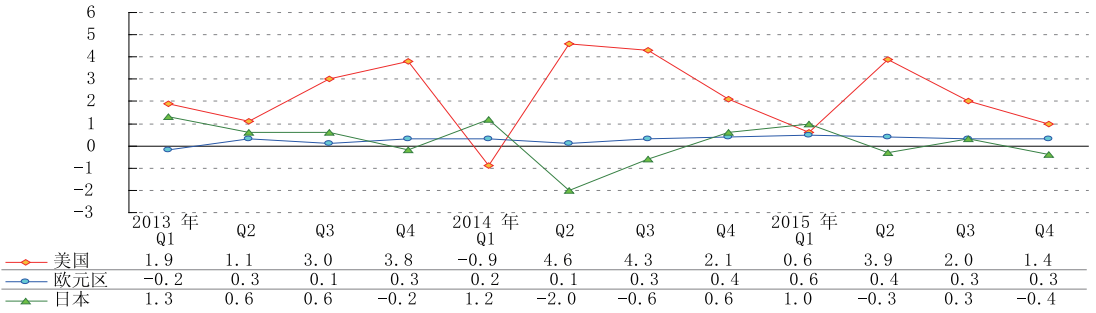


图 1 三大经济体 GDP 环比增长率 (%)

注：美国为环比折年率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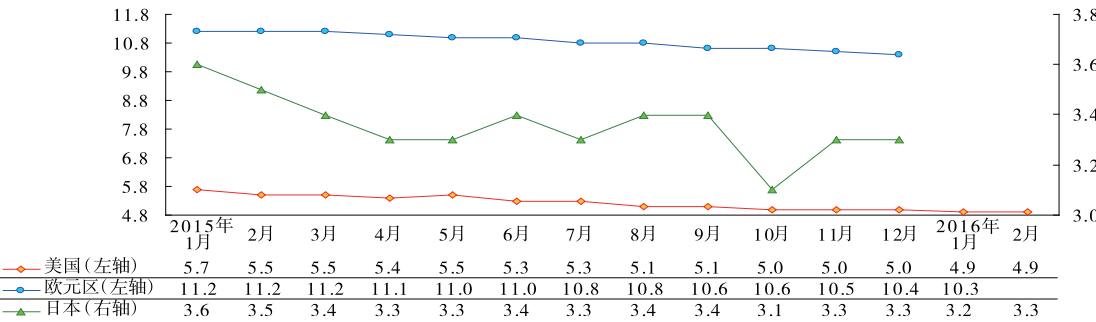


图 2 三大经济体失业率变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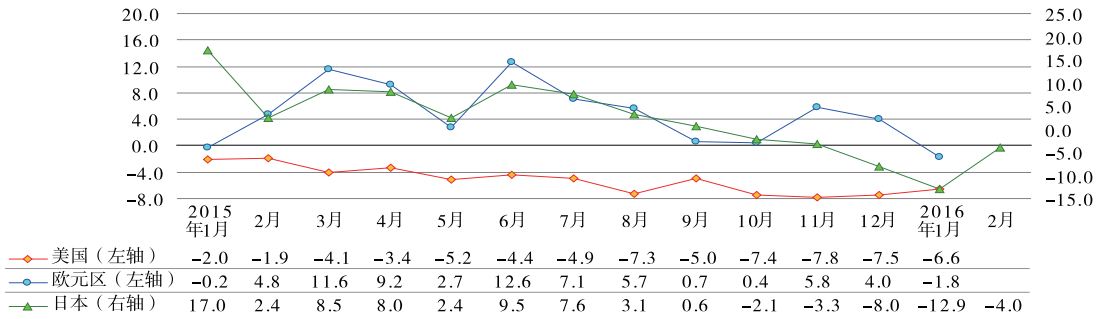


图 3 三大经济体出口额同比增长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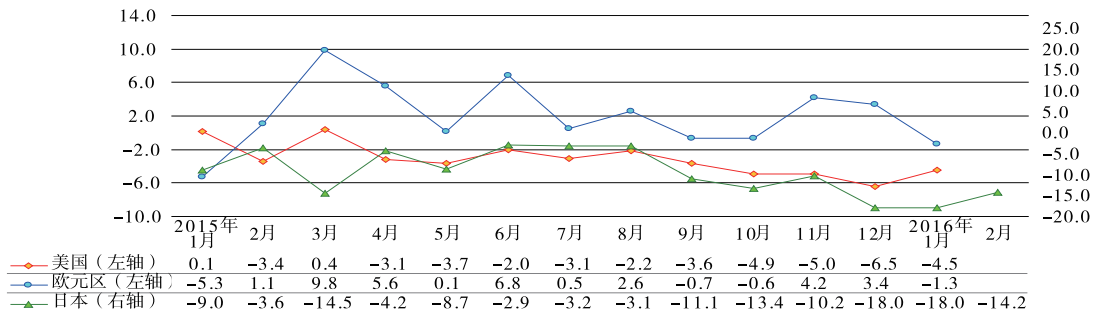


图 4 三大经济体进口额同比增长率 (%)

数据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图 1~图 4)。

责任编辑：陈璇璇

ABSTRACTS

(1)The achievements during the “12th Five—Year” and the outlook during the “13th Five—Year” of industries and communications industry *Miao Wei*

During the “12th Five – Year” period, China’s industries and communications industry have attained great achievements, with rising comprehensive strength and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he structure and quality. During the “13th Five – Year” period, industries and communications industry are still facing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as well as a series of new risks and challenges. The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inistry will firmly establish the concepts of innovation, coordination, green, openness and sharing, stick to the strategies of manufacturing power and network power, promote the supply side structural reform, further implement the strategy of Made in China by 2025, foster and expand the high – en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ccelera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e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facilitat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military and civilian industries and transformational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industry, constantly optimize the industrial spatial layout, accelerate the fostering of advantageous enterprise clusters, drive pragmatic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nd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cooperation, and achieve steady growth of industries and communications industry towards the medium – high levels.

(2)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real estate issues *Huang Zhiling*

Due to the heterogeneity of real estate goods, the large real estate market is less likely to be exposed of systematic risks, or systematic collapse in the real sense. The subprime crisis is not due to the changes in internal mechanisms of real estate market, but American peculiar fiscal and monetary policies and financial system. The nationwide collapse is less likely to occur in China real estate market, however the possibility of local collapse still remains; therefore sufficient attention should be given to the real estate dysfunctional risks, the secondary risks triggered by the endogeneity of “land finance”, and the risks associated with over – leverag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real estate industry requires strengthening the fundamentals as well as removing chronic diseases, especially strengthening the long – term mechanism to ensure the core residential function of real estate, and building a multi – level demand – based housing security system.

(3)Three drivers of green development *Xia Guang*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regarded the green development as one of the five development concepts for the “13th Five – Year”. Green development is a development process characterized by conserving resources and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representing value orientation that

guides Chinese development.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economy is the main part of green development, containing two connotations of “the economy requir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the economy benefits from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two extensions of “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n the existing economic system” and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green industry”. To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economy needs three driving forces: the first one is the driving force in terms of tigh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second one is the pulling power in terms of incentive and guida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economy, and the last one is the actions to enhance the innovative capability of green economy.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hree constitutes the aggregate driving fo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economy.

(4) Analysis and countermeasures research on what affects the international price of crude oil

He Xiaowei and Guo Hong

By analyzing the crude oil's supply and demand, storage and trade, financial markets, dollar index, other commodity prices as well as their interactions, this paper shows the key factors affecting the crude oil price and the trends of price. It draws a qualitative conclusion that crude oil price is influenced by the supply and demand and preliminarily predicts that the crude oil price has been on – going at the flat bottom of the “U” curve from 2014 for three to five years or so. Via carrying out Cointegration test and Granger causality test for the crude oil's price, reserves, production, consumption, trade and other factors, it finds that the long – term supply and demand determine prices, and a variety of factors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It puts forward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including establishing storage step by step, increasing scale for strategic petroleum reserve, reducing risk of supply disruptions, advancing construction for strategic petroleum reserve base, reducing pressure of economic downturn,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basic research, and building monitoring and early warning system for crude oil price, in order to have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n the crude oil price volatility and better carry out the strategic petroleum reservation.

(5) Focus review of global financial market

Chen Chao

In 2015,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global economic slowdown, the US has experienced a mild economic recovery and gradually exit from Quantitative Easing (QE). Because of the increasing production of crude oil, depressed demand and stronger US Dollar, the international price of crude oil has experienced a steady decline and emerging economies are facing large capital outflow. Among others, China broke the deposit interest rate ceiling to further improve the interest rate marketization mechanism. In the meantime, the reform of central parity rate of RMB also motivated the exchange rate marketization which releases the economic vitality while strengthening the short – run expectation of RMB's depreciation. The huge fluctuations of China's stock market in 2015 was greatly influenced by the considerable deviation between market price and inner value, the deleveraging as well as the volatility of external markets. In Europe, further QE was adopted to promote investment, consumption and employment to eventually achiev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flation targets. However, Swiss Franc's decoupling with the Euro and interest rate cuts were meant to cope with European QE's influence and encourage capital outflow. Therefore, changes and interactions of policies and environment in global markets mentioned above brought about the volatility of global financial market.

(6)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a's securities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djustment of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 investment strategies

Xu Changchun

According to data issued by the U.S. Treasury Department, China's securities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mainly concentrated on Treasury bonds, accounting for nearly 60% of total China's securities investment in the US. Among them, the China's investment in US Treasury bonds mainly focused on long-term nominal bonds, amounting to 88% of China's holdings of US's Treasury bonds. In general, in the past China was a risk-averse investor, aiming to maintain asset value through securities investment. Given the interest rates' downward trend of US's Treasury bonds, China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investment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les of diversification, aim to hedge and add value to assets, support national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adjust the regional and field distribution of foreign reserves to increase investment in the global quality assets.

(7) Innovation to lead transformation, reform to spur transformation

Huang Yo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to the new normal, designing properly the basic idea for the new round of five years planning is the key step to ensur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Based on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practice in the past 30 years of Zhejiang Province, this paper combines with the new trends of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political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 evolution, focuses on innovation and reform, closely stick to the main line of accelerating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establishes new targets for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strengthens new power for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finds new path for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This paper in-depth explains 10 issues to be focused on during the 13th Five-Year period including recreating new advantages for private enterprises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ng new platform of "two wheel drive" for advanced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nd modern service industries, and puts forward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8) Speeding up the development of big data is the trend of the times

Wu Feng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s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including cloud computing, the Internet of goods and the mobile Internet, data have gradually been another important production input after land, capital and technology, and will be certainly a kind of important resources all nations and regions will compete for. The future is owned by whoever controls or owns data. At present, developed nations and regions such as US, EU and Japan have taken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big data. By studying the development practice of big data in developed countries, this paper firstly looks at the current status and challenges of big data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n put forth some rational suggestions in terms of how to rapidly and soundly promote big data development in China

Editor: Huang Yongfu

《全球化》杂志征稿启事

《全球化》杂志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管/主办，是集研究性、学术性、政策性、应用性于一体，以国际国内重大战略问题研究为导向的经济类理论期刊。刊物依托“中国智库”平台优势，秉承“同享人类智慧，共谋全球发展”的核心理念，本着兼容并蓄、百花齐放的原则，着力打造“全球经济思想库”，构建一个智库交流的平台，成为广大读者观察国际问题的重要窗口和共享思想盛宴的便捷之门。刊物重点关注国际经济、宏观经济、产业发展、区域发展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提高经济形势分析预测的科学性、及时性和权威性；积极推动中国经济对外开放进程，关注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与发展中的趋势与问题，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政策和资讯服务，同时为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提供引领和支持。刊物力争具有全球视野，服务宏观决策，推动企业发展，集聚各类人才，成为政府、科研院所、企业从事国际经济研究、把握中国经济动向的重要理论刊物。

稿件要求如下：

1. 篇幅一般为 8000~12000 字，附有 300~400 字的摘要，3~5 个关键词，标题、摘要、关键词的英文翻译附在文后。
2. 来稿请注明作者的姓名、工作单位、职务、职称、研究方向和通讯地址、邮编、联系电话、电子邮箱。来稿如属基金项目成果，请按有关规定标注项目正式名称和编号。请将来稿（电子版论文）以 word 格式发送到编辑部投稿邮箱。

本刊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永定门内大街 5 号 235 室（邮编：100050）

投稿邮箱：qqh@cciee.org.cn；qqhtgx@126.com

联系电话：010-83362182/83362183

欢迎订阅 《全球化》 杂志

《全球化》杂志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管/主办，是集研究性、学术性、政策性、应用性于一体，以国际经济、宏观经济、企业国际化经营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类理论月刊（国内统一刊号：CN11－6008/F；国际标准刊号：ISSN2095－0675）。刊物按照曾培炎理事长的办刊宗旨，依托“中国智库”平台优势，秉承“同享人类智慧，共谋全球发展”的核心理念，本着兼容并蓄、百花齐放的原则，着力打造“全球经济思想库”，构建一个智库交流的平台，成为广大读者观察国际问题的重要窗口和共享思想盛宴的便捷之门。刊物致力于探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积极反映国际社会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诉求，研究如何改善全球经济治理，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理论研究，关注宏观经济运行、产业发展、区域发展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提高经济形势分析预测的科学性、及时性和权威性；积极推动中国经济对外开放进程，关注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与发展中的趋势与问题，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政策和资讯服务，同时为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提供引领和支持。刊物力争具有全球视野，服务宏观决策，推动企业发展，集聚各类人才，成为政府、科研院所、企业从事国际经济研究、把握中国经济动向的重要平台。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国内邮发代号：82－572；也可填好“征订单回执”，直接汇款向我部订阅。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永定门内大街5号232室《全球化》编辑部；邮编：100050；电话：010－83362183/83366113。

本刊定价：每期人民币35元，美元20元，港币50元，每月25日出版（国内免费邮寄）。

2016 年《全球化》杂志（月刊）征订单回执

订阅单位			订阅人姓名、 电话	
详细地址 (邮编)				
征订份数		420 元/年（12 期）	总计金额	

中国海外政经研究中心

中国海外政经研究中心是由中国海外控股集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地区安全研究中心共同发起设立的研究机构。中心的主要任务是就与中国海外投资环境有关的问题，包括经济、政治、安全、政策等相关问题进行调研，分析研究，提供调研和分析报告，开展合作交流，召开成果发布会、举办专题论坛，开办讲座、培训等，面向政府、企业和社会。中心发挥智库功能，就有关中国海外投资和海外资产管理等问题，向政府有关部门提供战略性和政策性研究成果和对策性建议，为企业提供投资战略和资产管理等方面的咨询，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和对海外资产进行有效管理。



联系地址：北京市王府井东街 8 号澳门中心四层（邮编 100006）
合作/咨询电话：010-58138101-302 邮箱：perc@zhwkg.com